



林文光
选编

瞿秋白文选

QIUJUBAI WENXUAN

四川
文

瞿秋白文选

QUQIUBAIWENXUAN

林文光 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瞿秋白文选/瞿秋白著.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

社, 2009. 12

(经典纸阅读丛书)

ISBN 978-7-5411-2945-2

I. ①瞿… II. ①瞿… III. ①瞿秋白 (1899~1935)

—文集 IV. ①D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24431 号

QU QIU BAI WEN XUAN

瞿秋白文选

责任编辑 邓永勤 (dengyaxin009@sina. com)

唐 婧 (stacey2916@sina. com)

封面设计 任 熙

版式设计 史小燕

责任印制 龙小龙

责任校对 汪 平 冯 琳等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网 址 www. scwys. 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读者服务 028-86259293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 刷 四川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00 mm×1000 mm 1/16

印 张 13.25

字 数 180 千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2945-2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编者说明

文化的传承发展，有如漫漫长途、蜿蜒江河。穿越时空回头看，平常甚至平庸的时段，其实并不在少数。绝佳风景、巅峰时刻，往往只出现在大转折大激荡处。辉煌如近代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在中国近现代，还是以上世纪初叶为主要时段的新文化大潮前后，巨匠辈出，佳作如林，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经典时刻。本套丛书即意在聚焦这一经典时刻，向今日之读者大众推介近现代史上值得铭记的文化名家的精品佳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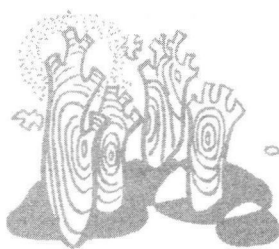
本套丛书选文侧重于文化、艺术、思想层面。出于对历史的尊重，尽量保持原著风貌，参照历来对老版本约定俗成的通行做法，本套丛书也原则上不做文字（包括标点符号）的更改，不以现今语言、语法规范修订之。

谨此说明。

「目 录

《新青年》之新宣言	001
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	006
中国资产阶级的发 展（节选）	015
历史的工具——列宁	022
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	024
心的声音（节选）	030
饿乡纪程——新俄国游记（节选）	040
赤都心史	077
那个城	109
多余的话	111
乱 弹（代序）	135
一种云	138
吉诃德的时代	140
世纪末的悲哀	142
民族的灵魂	144
暴风雨之前	147
财神的神通	149
狗道主义	152
萧伯纳并非西洋唐伯虎	155
最艺术的国家	157

内 外	159
透 底	160
人才易得	162
关于女人	164
真假董吉诃德	166
中国文与中国人	168
“儿 时”	170
画狗罢	172
哑巴文学	174
《鲁迅杂感选集》序	176
关于整理中国文学史的问题	197



《新青年》之新宣言

我将创造成整个儿的世界，
又广大，又簇新；请几万万
终身同居住，免得横受危害，
只希望我自己的自由劳动……
我终看得见奇伟的光辉内
那自由的平民，自由的世界。
那时我才说：唉，“一瞬”，
你真佳妙！且广延，且相继！
我所留的痕迹，必定
几千百年，永久也不磨灭。

——歌德之《浮士德》

《新青年》杂志是中国革命的产儿。中国旧社会崩坏的时候，正是《新青年》的诞辰。于此崩坏的过程中，《新青年》乃不得不成为革新思想的代表，向着千万重层层压迫中国劳动平民的旧文化，开始第一次的总攻击。中国的旧社会旧文化是什么？是宗法社会的文化，装满着一大堆的礼教伦常，固守着无量数的文章词赋；礼教伦常其实是束缚人性的利器，文章词赋也其实是贵族淫昏的粉饰。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的中国革命，不过是宗法式的统一国家及奴才制的满清宫廷败落瓦解之表象而已，至于一切教会式的儒士阶级的思想，经院派的诵咒画符的教育，几乎丝毫没有受伤。如何能见什么自由平等！可是中国的大门上，却已挂着

《〈新青年〉之新宣言》初刊于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五日《新青年》季刊第一期。（一九二三年六月，《新青年》改为季刊出版，为中共中央理论刊物。）

“民国”招牌呢。当时社会思想处于如此畸形的状态之中，独有《新青年》首先大声疾呼，反对孔教，反对伦常，反对男女尊卑的谬论，反对矫揉做作的文言，反对一切宗法社会的思想，才为“革命的中国”露出真面目，为中国的社会思想放出有史以来绝未曾有的奇彩。五四运动以来，更足见中国社会之现实生活确在经历剧烈的变迁过程，确有行向真正革命的趋势，所以《新青年》的精神能波及于全中国，能弥漫于全社会。《新青年》乃不期然而然成为中国真革命思想的先驱。中国现时的旧社会，不但是宗法社会而已，他已落于世界资本主义的虎口，与世界无产阶级同其命运。因此，中国黑暗反动的旧势力，凭借世界帝国主义要永久作威作福，中国资产阶级自然依赖世界资本主义而时时力谋妥协。于是中国的真革命，乃独有劳动阶级方能担负此等伟大使命。中国社会中近年来已有无数事实，足以证明此种现象：即使资产阶级的革命，亦非劳动阶级为之指导，不能成就；何况资产阶级其势必半途而辍，失节自卖，真正的解放中国，终究是劳动阶级的事业；所以《新青年》的职志，要与中国社会思想以正确的指导，要与中国劳动平民以知识的武器。《新青年》乃不得不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

《新青年》自诞生以来，先向宗法社会、军阀制度作战，革命性的表示非常明显。继因社会现实生活的教训，于“革命”的观念，得有更切实的了解，知道非劳动阶级不能革命，所以《新青年》早已成无产阶级的思想机关，不但对于宗法社会的思想进行剧激的争斗，并且对于资产阶级的思想同时攻击。本来要解放中国社会，必须力除种种障碍：那宗法社会的专制主义，笼统的头脑，反对科学，迷信，固然是革命的障碍；而资产阶级的市侩主义，琐屑的对付，谬解科学，“浪漫”，亦是革命的大障碍。因此种种，《新青年》孤军独战，势不均力不敌，军阀的统治，世界帝国主义的统治，如此之残酷，学术思想都在其垄断、购买、威迫、利诱之下，无产阶级的思想机关既不得充分积聚人才能力之可能，又内受军阀的摧残，外受“文明西洋人”的压迫，所以

困顿竭蹶，每月不能如期出世，出世的又不能每期材料丰富。然而凡是中国社会思想的先进代表必定对于《新青年》表无限的同情，必定尽力赞助；《新青年》亦决不畏难而退，决不遇威而屈。现在既能稍稍集合能力，务期不负他的重任，所以在可能的范围内，重行整顿一番，再作一次郑重的宣言。

《新青年》当为社会科学的杂志。《新青年》之有革命性，并不是因为他格外喜欢革命，“爱说激烈话”，而是因为现代社会已有解决社会问题之物质的基础，所以发生社会科学，根据于此科学的客观性，研究考察而知革命之不可免；况且无产阶级在社会关系之中，自然处于革命领袖的地位，所以无产阶级的思想机关，不期然而然突现极鲜明的革命色彩。中国古旧的宗法社会之中，一切思想学术非常幼稚，同时社会演化却已至极复杂的形式，世界帝国主义，突然渗入中国的社会生活，弄得现时一切社会现象繁杂淆乱，初看起来，似乎绝无规律，中国人的简单头脑遇见此种难题尤其莫名其妙，于是只好假清高唱几句“否认科学”的“高调”。独有革命的无产阶级，能勇猛精进，不怕“打开天窗说亮话”，应当竭全力以指导中国社会思想之正当轨道，研究社会科学，当严格的以科学方法研究一切，自哲学以至于文学，作根本上考察，综观社会现象之公律，而求结论。况且无产阶级，不能象垂死的旧社会苟安任运，应当积极斗争，所以特别需要社会科学的根本知识，方能明察现实的社会现象，求得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凡是中国社会之新活力，真为劳动平民自由正义而奋斗的青年，不宜猥猥琐琐泥滞于目前零碎的乱象，或者因此而灰心丧志，或者因此而敷衍涂砌，自以为高洁，或自夸为解决问题的学问，以至于厌恶实际运动。《新青年》对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必定要由浅入深，有系统有规划的应此中国社会思想的急需。“社会现象复杂得很呢，单是几个‘新术语’尚且要细加经纬，然后能令真正虚心诚意的革命青年及劳动平民知道‘社会’是个什么东西！”

《新青年》当研究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状况。研究社会科学，本是为解释现实的社会现状，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分析现实的社会运动；真正的科学，决不是玄虚的理想。中国新思想的幼稚时期已过。现在再也可以不用搬出种种现成的模型，勉强要中国照着他捏。其实“中国式的新乌托邦家”不但不详细他自己所荐举的模型，而且也不明了中国社会，正因不了解社会科学的方法，不能综观实际现象而取客观的公律，所以不是泥于太具体的事实，——说到中国政治，头脑里只有张、曹、吴、孙几个大姓大名，就是力避现实，逃于玄想；说到经济改造，满嘴的消费、生产、分配等类的外国新名词，不会应用于实际。《新青年》现在也要力求避免此等弊病，当尽其所有区区的力量，用社会科学的方法，试解剖中国的政治经济，讨论实际运动。

《新青年》当表现社会思想之渊源，兴起革命情绪的观感。社会科学本是要确定社会意识，兴奋社会情感，以助受压迫被剥削的平民实际运动之进行。所以对于一般的思想及情绪之流动，都不得不加以正确的分析及映照。一切文学艺术思想的流派，本没有抽象的“好”与“坏”，在此中国社会忙于迎新送旧之时，《新青年》应当分析此等流派之渊源，指出社会情绪变动的根由，方能令一般的意识渐渐明晰，不至于终陷于那混沌颠倒等于飞蛾投火的景象。再则，现时中国文学思想，资产阶级的“诗思”，往往有颓废派的倾向，此旧社会的反映，与劳动阶级的心声同时并呈，很可以排比并观，考察此中的动象；亦可以借外国文学相当的各时期之社会的侧影，旁衬出此中的因果。尤其要收集革命的文学作品，与中国麻木不仁的社会以悲壮庄严的兴感。

《新青年》当开广中国社会之世界观，综合分析世界的社会现象。社会科学本无国界；仅因历史的关系，造成相隔离的文化单位，所以觉得各有各国的“国粹”，其实不过是社会的幻觉，泥滞于形式上的差别。中国受文化上的封锁三千多年，如今正是跨入国际舞台的时候，非亟亟开豁世界观不可。况且无产阶级的斗争本来就是国际的，尤其不可以不知道各国劳工革命运动的经

验。因此，《新青年》当注意于社会科学之世界范围中的材料，研究各国无产阶级运动之过去与现在，使中国得有所借鉴。从最反动的日本至赤色的苏维埃俄国，都应当研究。

《新青年》当为改造社会的真理而与各种社会思想的流派辩论。社会科学，因研究者处于所研究的对象之中间，其客观的真理，比自然科学更容易混淆。因此，人既生于社会之中，人的思想就不能没有反映社会中阶级利益的痕迹；于是，社会科学中之各流派，往往各具阶级性，比自然科学中更加显著。《新青年》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机关。无产阶级于现代社会中，对于现存制度自取最对抗的态度；所以他的观察，始终是比较上最客观的。何况《新青年》在世界无产阶级的文字机关中，算是最幼稚的，未必有充分健全的精力，足以为绝对正确的观察。有此两因，都足以令《新青年》不能辞却与各方面的辩论：一则以指出守旧各派纯主观的谬误，一则以求真诚讨论后之更正确的结论。于辩论之中，方能明白何者为无产阶级的科学结论，何者为更正确更切合于事实的理论。总之，为改造社会而求真理。

中国幼稚的无产阶级，仅仅有最小限度的力量，能用到《新青年》上来，令他继续旧时《新青年》之中国“思想革命”的事业，行彻底的坚决斗争，以颠覆一切旧思想，引导实际运动，帮助实际运动，以解放中国，解放全人类，消灭一切精神上物质上的奴隶制度，达最终的目的：共产大同。《新青年》虽然力弱，必定尽力担负此重大责任，谨再郑重宣告于中国社会：

《新青年》曾为中国真革命思想的先驱，

《新青年》今更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

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

东西文化的差异，其实不过是时间上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因为天然条件所限，生产力发达的速度不同，所以应当经过的各种经济阶段的过程虽然一致，而互相比较起来，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于同一时代乃呈先后错落的现象。若详细分析起来，其中因果关系非常复杂，而一切所谓“特性”、“特点”都有经济上的原因，东方和西方之间，亦没有不可思议的屏障。正因人类社会之发展有共同的公律，所以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有相异之处；这却是由于彼此共有同样的主要原因，仅因此等原因之发展程度不同，故有差异的结果，并非因各有各的发展动力，以至于结果不同。此处的异点正足以表示其同点，是时间上的迟速，而非性质上的差别。

西方文化，现已经资本主义而至帝国主义，而东方文化还停滞于宗法社会及封建制度之间，假设使此两种文化各自独立，不相关涉，便可以如此说，以得一确定的概念。然须更进一步，先明了此两种经济制度之不同，两种制度的特性，然后看他们俩各自发展中的动象，以至于因发展而相接触，因相接触而起混合的演化，便能得现代世界政治经济的形势，世界革命的渊源及其趋向。这是研究的方法。至于详尽的说明，不是一篇杂志论文所能了事，况且此处为篇幅所限，只能略略指明，以后再逐期详细讨论。

中国人，甚至于学者，所心爱的东方文化究竟是什么？

第一种元素是宗法社会之“自然经济”。

“中国之‘家庭手工业’，在城市之中，尚有不少保存着呢，

并且是在很老很大的商业城市之中。譬如宁波，有三十万人的居民，前一辈的妇女还是亲手制作衣履，以供夫妇子女之用。当时的青年妇女，若竟向商铺购买此等事物，必定引起大家的注意，——以为怪事。”（见 Nyokching Tsur 博士之《宁波人的企业》，德国蒂宾根一九〇九年版，第五十一页。）农家手工业本是中国宗法社会的经济基础之一。至于农业上之土地制度、义庄制度、族有制度等之宗法社会的色彩，尤其明显。记得二十年前的老太太们，若听见姑娘们要到店裡买鞋，必定骂他们“无耻”，若看见洋手巾、铅笔，都说是有“洋骚气”。此种厌恶西方文化的态度，崇拜东方文化的旧梦，何等高傲，何等自大！其实中国木匠的鲁班祖师，秀才的至圣先师和文昌帝君，都不过是中世纪“行会”、“教会”式的文化。假使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看见中国理发师手臂上刻的花纹，中国字画上“世伯”、“世兄”、“年兄”、“姻侍生”等的题款，必定很高兴，以为社会史上经济史上添了不少陈列馆中的材料。所谓伦常纲纪、阴阳五行同样是宗法社会或行会制度的表征而已，并无特异的文化，更无神圣不可侵犯之处。

第二种元素，是畸形的封建制度之政治形式。

东方其他各国的宗法社会现象，虽然各有特殊形式，与中国不相类；然而性质是一样的，也许色彩的浓淡相异而已，可是此地封建制度的遗迹，却很显露，比中国明显得多，田地制度、劳役制度处处都可以表现此等国家中经济上的封建遗迹。至于中国呢，难道完全脱离了封建制度？中国当初因民族斗争的结果，经济文化屡屡受外族的破毁，并为地理状态所限，经济上的发展至近代尚停滞于宗法社会之“半自然经济”；这是屡进而又屡退的过程（此层意思将来再当详论，此处仅限于总观念），所以政治上虽屡见统一的君主专制政体，其实并非真正的集权政府。不过以宗法社会为基础，承封建制度既经屡起屡仆，“诸侯”的力量薄弱，经济上的凭借极不稳固，资本制度又为技术所限无从发生，那时所谓“资产阶级”仅得极小的一部分商业上的分配权，所以

君主得勉强建成立于一盘散沙之上的“中央政府”，政府之下隶属无数的小经济单位，就是家族、百“姓”。因此，百“姓”之中的“大姓”、“世家”，往往可以形成似贵族非贵族的阶级，而官僚、疆吏、地方官亦能形成似诸侯非诸侯的统治者。封建制度于政治上实未曾死灭，况且“改丁归漕”之法律上的实行不过是一个半世纪以前的事，而“捉差”、“办差”等制，直到清朝末年还是存在，经济上又何尝可以说封建制度完全消灭于秦灭诸侯之后呢？新式社会，若无建设他的相当动力，是不能代旧式社会而兴的。中国独立的文化之中，经四五十世纪的历史，而竟不能求得丝毫类似于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也就无足怪了。辛亥“革命”，为资产阶级透了一口气，可还不是资产阶级的革命，资产阶级的革命不但没有完成，并且着手预备得也还很少。因此，封建制度的余势大盛，中国资产阶级的稚弱，统一君主的败落，各“地方”区域内的经济发展，及外国帝国主义的利用，有此四端可乘，于是军阀割据制度成，而所谓“统一的”中国遂崩坏分裂。中国社会乃逆世界潮流，由“民主革命”反退向封建制度。现代中国的军阀制度所异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者不过两端：一、后者为自其原有的经济基础生长而成，前者乃攫得此种经济基础于外；二、后者根据于采地制度农业经济，而前者根据于雇佣军队投机商的财阀，同样都是资产阶级经济发展的障碍。然军阀制度，由先得政治地位进而行经济侵略，剥削商民，压迫劳动者，不但简直和封建诸侯相似，而且比封建诸侯更可怕。例如四川、云贵、湖南、山西、甘肃、东三省等，几乎全是一军征服之后渐渐依据地势强行逼迫商民，凭借当地的经济势力，实行农奴制度式的劳役征调以剥削劳工民众，于是造成他自己的“政治势力范围”。四川省内现时有各军队之“保商”、“护商”制度，商人怕“匪”，当初请他们“保镖”，现在落得反客为主，每次护商队“临幸”，商人反须贡献一大笔费用，往往超过所有货价百分之五十，颇与俄罗斯开国史上商人请镖师，镖师变成“外国来的王爷”相像；福州“拉夫”办法几乎完全恢复清朝乾隆皇帝下江

南的“捉差”制；京汉铁路，汉阳工厂，自从今年罢工失败后，实行军队强迫工作；其他残杀奸淫，拘禁拷掠，和封建时代的诸侯对待农奴的手段相比，有过之无不及，劳工平民一概是为军阀经营生产交通的牛马。凡此都不过是最显著的实例，其他相类的事情，举不胜举。此等现象，由所谓“自由”贸易（经济学上谓之“简单的商品生产制”）变成小诸侯辖制的商业，由所谓“自由”劳动变成公开的武力强逼的力役，岂非中国社会逆流退向封建制度的铁证！中国“东方文化派”的学者所要保存的，是否此等肮脏东西，人间地狱？

第三种元素是殖民地式的国际地位。

东方诸国，其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发展既落后，及渐与先进（文明）国家相接触，迎受西方文化，——资本主义，遂不得 not 成为此等国家的殖民地；而西方（文明）国家输入资本主义的形式，就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在西欧初发展时正是封建制度的劲敌，然侵略国外弱小民族之际，却往往辅助此等民族内部的封建制度，其实是维持自己的统治权。凡是所谓强国，因其经济上资本主义的要求，可以进而为种种政治上军事上的侵略阴谋，务使殖民地的经济生活适宜他的剥削政策，所以维持殖民地内能代其统治权的各派各阶级的势力，直至完全克服臣属此等弱小民族为止。中国的地位尤其可危，因有所谓“国际均势”，而成为国际的殖民地。各强国得以勾结各经济区域内的事实上的政府（军阀），以至于新生的大资产阶级，间接实行其统治权；其结果，军阀为互相争夺势力范围而时起战祸，列强亦因互争势力范围而阴谋倾轧、赂买、威吓，令中国顾东失西，日陷于绝对臣服的地位。各国各势力范围内的经济发展程度若有异，则其对待中国军阀或中国资产阶级的态度亦就不同。中国的军阀既须有经济上的凭借，每每能令其地方政府渐成资产阶级经济的发展之中心点，所以外国资本之占有此经济区域者，必从而役使之，利用之。同时，若是军阀凭借经济势力的形式太鲁莽，足以障碍资产阶级经济的发展，那时外国资本之较强者，能力贯于几省以上，就想除

此障碍，而与国内的大资产阶级携手。然帝国主义的性质唯在于：一、投货，二、搜括原料，三、投资，四、开发原料；凡此都是救世界的资本主义于危亡所必须的程序，此中仅因其经济侵略力发展的阶段不同，而异其掠夺的方式，异其所维持之阶级，而总观起来，他决不能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充分的发展，因为中国若是经济上真能独立发展，则帝国主义必受挤而颠覆。所以不论他是辅助军阀，或是辅助财阀资产阶级，他必有一相当限度，辅助至此而止，力求合于他自己的目的。此地所谓资产阶级经济的发展，是外国人在中国经营的经济；所谓助国内资产阶级排除障碍，不但此等障碍专是外国经济在此发展的障碍，而且所助的“国内的”资产阶级，亦正是依赖外国资本为生的资产阶级。譬如最近汉口的外国商人，趁京汉工潮的失败，役使湖北地方政府专门封闭工会之与外国企业有关系者，足证军阀的制度始终大有利于外国资本；再则如上海镇守使确实是外国资本家的刽子手，外国资本家的报纸可以一面鼓吹中国资产阶级之所谓“裁兵、理财、制宪”运动，一面协同军阀竭力压迫一切平民之集会、结社自由，甚至于市民（资产阶级）欢迎孙中山的大会都在禁止之列，更不论工会！可见外国资本甚至于与军阀同样采取极公开的野蛮政策。所以不论如何，帝国主义客观上自成为使中国社会退向封建制度的重要原因，同时又以强力纳入资本主义。一九二二年，上海金银业工人罢工，外国老爷竟放出猎狗来噬啮工人，此等现象只有“东方”殖民地上可以发现，自古以来无论天灾战祸弄得人烟断绝，禽兽横行，也只有乌鸦啄白骨，野狗啃死人的惨状，决比不上故意纵犬吞噬、将活人当狐兔一般看待的新奇，真可算是东方文化的特色！

宗法社会的文化早已处于崩坏状态之中，而所谓“东方文化派”的学者还在竭力拥护。或者说，谈文化何必论到此等琐屑屑的“细事”。然而要知道，所谓“文化”是人类之一切“所作”。一、生产力之状态，二、根据于此状态而成就的经济关系，三、就此经济关系而形成的社会政治组织，四、依此经济及社会

政治组织而定的社会心理，反映此种社会心理的各种思想系统，凡此都是人类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空间中之“所作”，这种程序是客观上当有的。“作者”是人而非虚灵，不能离时间空间而独立。所以研究他的“所作”也自然应依此程序。若是研究文化，只知道高尚玄妙的思想，无异乎“竖蜻蜓”之首足倒置的姿势，必定弄得头晕眼暗。“伦常纲纪，孝悌礼教”的思想明明是宗法社会的反映，不必多论；“和平好让”更是因宗法社会中经济发展薄弱，虽争亦必不能多得，祖孙、父子、兄弟、伯叔在同一经济单位之中，求分配的相安，除此更无别法。中国的“天下四海观”，尤其是古旧的封建制度崩坏，而经济发展刚到“简单的商品生产制”，不能前进，加上宗法社会的经济组织，所以大家只觉得要“安居乐业”，各人管各人的家事，各人做各人的生意，用不着集权的国家，如何能有国家观念？只当着其他各国，其他各民族也和中国一样呢。若更说玄妙些，讲到东方人的习静、养心、绝欲、诚意的功夫，尤其可笑。请问：在如此恬静的农村生活里，威严的君主政治下，求不到什么“物”，所以只好养“心”，不会满欲，所以只好绝欲，是不是东方文化的优点？要知道罗马时代也有“天下观”，中世纪教会中也有绝欲主义，又是什么奇珍瑰宝！诚然不错，我们决不否认精神上的力量能回复其影响于物质的基础，社会思想往往较其经济发展落后一步，所谓历史的“惰性律”；然而最根本的动力，始终是物质的生产关系。譬如中国经济发展，较之十年前已经大不相同，然而北京总商会仍旧只有送万民伞的本领，这真是宗法社会封建制度之奴隶性的心理，崇拜君父的滥调。若是此等幼稚的资产阶级能运用现时所有的一些实力，也决不至于如此。虽然，假设中国资产阶级真有极大的工厂，几万万的银行资本，他还肯如此俯就么？那时，恐怕此等敬长上、不争夺的“美德”早已烟销云灭了。而此种物质力的自然发展，决不能以一纸唯心论而打消，决不能以仁爱的空名来限制，其实已经容不得你“预”防，中国的资产阶级还没长成，外国的已经现成。帝国主义无孔不钻的渗入中国的政

治经济生活之中。你爱和平，他却不爱，你讲诚意，他却不讲，你自己老实，他却不老实呢。

中国的文化，宗法社会，已经为帝国主义所攻破；封建制度，已经成帝国主义的武器，殖民地的命运已经注定，现在早已成帝国主义的鱼肉。我们也决不歌颂西方文化，因为文化本无东西之别。文化只是征服天行；若是充分的征服自然界，就是充分的增加人类驾御自然界的能力。此种文化愈高，则社会力愈大，方能自强，方能独立，方能真正得自由发展。帝国主义处处阻滞此种可能；于殖民地上往往最初一期外国人似乎是文化的宣传者，然而只要看一看下列几项“琐事”，就可以知此种的“宣传”的限度了：美国人在中国所设学校都授美国宪法，还不是些自由、平等、法律之类的原则！然而美国人克门私运现银出境犯了法被发觉，反与关卡兵士冲突受误伤致死，美国政府却不惜以改变对华政策为要挟，庇护这一犯法的人。基督教青年会自诩为文化机关，教会了中国学生踢球、打球，等到和美国兵赛球时，赢了他的球就应该吃他的巴掌（北京）。此等税关法例、球场规则，原来是中国人新近学来的，也可以说是极粗浅的社会共同生活的公约，而中国人却无福气实行。至于科学艺术也受限制，住在租界上的人，连看一本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都要捉到巡捕房里去。请问“真正民主共和国”的民主主义在那里？帝国主义不但为经济上政治上的侵略，并且扰害殖民地的法治，竭力阻止殖民地人研究真正的科学，唯恐弱小民族因真得科学文明而强盛。

宗法社会及封建制度的思想不破，则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无法抗拒；所以不去尽帝国主义的一切势力，东方民族之文化的发展永无伸张之日。科学文明是资产阶级的产儿，然而亦就是破毁资产阶级的起点。宗法社会的仁义道德说亦正是宗法社会破产的先声。至仁义道德说之真正的平民化及科学文明之真正的社会化时，就是一切旧社会的末日。此种文化过程，在先进“文明国”每每分为两段；因世界经济的发展其时尚有相当的余地，所以强国得以从容不迫先经所谓“民主主义”，而后重返于极端反对民

主主义的帝国主义，先经科学的文明而后重返于反对科学的市俗主义，非至于旧社会中的新力量勃生、彻底翻腾，演为无产阶级革命之时，此种“循环论证”不能终止。至于殖民地上，此种过程，却有不得不双方并进之势：就是民族的解放运动，普通的民主运动，因厄于帝国主义之故，自然当与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相融合而为一；于思想上即是道德之平民化与科学之社会化两阶段同时并呈，道德与科学本非相消的。只有真正的道德，真正的科学是颠覆东方文化之恶性的利器。此种恶性，宗法社会、封建制度及帝国主义颠覆之后，方能真正保障东方民族之文化的发展。

所谓东方文化的“恶性”决非绝对的，宗法社会的伦理也曾一度为社会中维持生产秩序之用。但是他现在已不能适应经济的发达，所以是东方民族之社会进步的障碍。西方之资产阶级文化，何尝不是当时社会的大动力。但是他既成资产阶级的独裁制，为人类文化进步之巨魔，所以也成了苟延残喘的废物。直至帝国主义沟通了全世界的经济脉络，把这所谓东方西方两文化融铸为一；然亦就此而发生全人类的文化，——世界无产阶级得联合殖民地之受压迫的各民族，以同进于世界革命。此种趋势，此种新革命文化的先驱，正就是杀帝国主义的刽子手。宗法社会的思想代表还正在竭力拥护旧伦理，世界资产阶级也反过来否认新科学。这也难怪，原来他们俩，一在殖民地上，一在强国之中，都已魂游墟墓，看不见前途，所以不得不向后转。世界的资产阶级，既以科学的发明，作为少数人享福之用，他眼看着用了这许多精力，杀人放火的机械制造得如此之精明，始终还是镇不住“乱”，保不住自己的统治地位，所以他的结论是“科学无能”。这刚刚迎合了宗法社会的心理，于是所谓“东方文化派”大得其意。其实那里是什么“科学破产”，不过是宗法社会及资产阶级文明的破产罢了。世界的无产阶级正应当用敌人所怕的武器；殖民地上的劳动平民也应如此。世界的资产阶级及殖民地上的贵族阶级为他们所依附的经济制度（私产制及自给经济）所限，不能再前进，自己不能克“物”，所以不得不教人“克己”。难道受压

迫者便真听了他们“克己”，讲唯心主义么？因此可见，颠覆一切旧社会的武器正是科学。科学只是征服天行的方法。在少数人垄断此种方法之结果的社会里，方法愈妙，富人愈富，于是社会中阶级斗争愈剧烈，国际间战祸愈可惨，因此以为是科学方法本身的罪恶，其实假设大多数人能应用科学，则虽有斗争亦自能保证将来发达进步之可能，只因此等进步已非资产阶级文化的进步，而是无产阶级文化的进步，所以资产阶级要否认。等到私产绝对废除，阶级消灭时，科学愈发明，则体力劳苦的工作愈可减少，全社会的福利愈可增进；物质文明愈发达，经济生活愈集中，则精神文明愈舒畅，文化生活愈自由，为“求生”的时间愈少，则为“求乐”的时间亦愈多了。那时，才有真正的道德可言，不但各民族的文化自由发展，而且各个人的个性亦可以自由发展呢。要达到此种伟大的目的，非世界革命不可，这是“无产阶级的社会科学”的结论，有客观事实可按的。只有世界革命，东方民族方能免殖民地之苦，方能正当的为大多数劳动平民应用科学，以破宗法社会、封建制度的遗迹，方能得真正文化的发展。况且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中，若是东方民族不能以自力先行从事于一切革命运动，断绝一切帝国主义的“辎重队”，使无发展余地，亦必暂限于停滞状态。所以必须以正确的社会科学的方法，自然科学的方法，为劳动平民的利益，而应用之于实际运动；当令西方的无产阶级与东方的弱小民族一致的起来反抗帝国主义，乘现代各地生产力发展之矛盾性，凭客观的政治经济实力以斗争，即此锻炼其主观的阶级意识；逐步前进，颠覆宗法社会、封建制度、世界的资本主义，以完成世界革命的伟业。如此，方是行向新文化的道路。

这一方针固然非常之明确，然而实际运动之时，尤须时时不忘科学的方法、缜密的考察，因时因地而相机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与东方民族革命相应的方法，以及东方民族内部运动之阶段，都必须是极慎重的研究。

中国资产阶级的的发展（节选）

一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之特征

中国的宗法社会遇着帝国主义之政治经济的侵入，而起崩溃，方开始有真正的“资产阶级的的发展”，亦可称“资本主义的发展”。帝国主义开发、剥削殖民地以拓展其资本主义，适以自种世界资本制度彻底崩坏之祸根；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充分发展本非帝国主义所能容忍，然而，他既要投资投货于中国，就不得不破毁中国的宗法社会之束缚，不得不建立相当的资产阶级的关系。

帝国主义的侵略，割占领土，攘夺富源，投货投资，令中国农业破产，农民流离失所，变成兵匪；然而，他即此就令农村之中起阶级的分化，并造成闲空的无产阶级“后备队”——劳动力极低廉的工人，足以应资产阶级的需要。手工业受外货的影响日就衰落，更加增多失业的劳动者；而且亦因外货而国内渐渐形成“商业资本”，商人渐能组织生产，发现“家庭手工业”，如商铺散给小户女工以绒绳、洋线，而令织袜、帽、手套、线袋等类的制度；更进而成就“工场手工业”，如组织手机的小工场等。至于工业之中，外国资本主义最初本当力阻其发达，却因欲行铁路投资，且尤须采取煤铁，非有大规模之机器事业不可，于是借款官营，千方百计自取其管理权，成就中国特有的所谓“官僚资本”，实际上是外国资产阶级的势力。然而机器既已输入，引起

——《中国资产阶级的的发展》初刊于一九二三年七月一日《前锋》第一期，署名屈维它。这里选录的是第一、二、五节。

中国资本发展的自然要求却反因与之竞争，而不得不趋于更集中的倾向，甚至于一瞬而已入最新组合企业的方法，如华商纱厂联合会已具“辛迪加”的雏形。外国资本主义投货时能豢养一种寄生的中国商人阶级，专销外货或代收原料；然而中国工场手工业及工业既有片面的发达，市场之上发现所谓“国货”，亦就造成与外货对抗的形势，与外国资本家对抗的商人阶级。尤其是侨居外国的商人，借外国市场完成他们“资本之初期积累”，能力更超过国内商人，更进而能与外国争投资。固然，外国巨大的财政资本与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之间，无所谓自由的竞争，列强单刀直入径借政治、外交势力掠夺范围，对矿山、铁路的投资无不带政治意味，欲使中国资本之发达径成为帝国主义的发达，至今汇丰银行已能掌握全中国的金融，新银行团更想操纵全国的财政、交通。因此中国虽有自己资本发展的形势，造成稚弱的新式银行资本，然而，一则大工业所须过多非其力所能支，二则政治投机获利常较生产事业为大，于是也来争尝异味，以政治为营业，又因关、盐大抵押品都在外国人之手，始终跳不过他的范围；然而国内经济生活为帝国主义所拓展，内地旧式的放款（信托）事业始终日有发展。

既如此，宗法社会的小农及小手工业经济日益崩坏，而资产阶级的新手工业、工业、商业、信托事业日益发展。然而中国的资产阶级顺此发展便能敌帝国主义吗？不能。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非由自力能渐展开及于“世界”，乃由外铄自“世界”侵渗而入中国；非但不能如英国资本，首先开发，侵入其他国家，并且不能如东欧（俄国）资本之方出世即遇劲敌，乃是受强敌之暴力所开拓：一，对外工商业受协定关税之限制；二，工业中所须之半制原料及机器，中国所无，为大工业国、大农业国所垄断操纵；三，财政权操于列强，一切信托事业为所挟持；四，工业略有进步而农业反有退化之象（即为帝国主义及资本主义之本性），原料食粮更受限制；五，农民手工业者破产甚多，而工厂所能容纳者甚少；国内市场上外国资本主义大生产的商品与中国

资产阶级小生产的商品间之势力悬殊的竞争，还不算在内。有此数因转转相乘，政治的经济的紊乱更迭而起，帝国主义更得乘机扑取，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决无独立之可能，更决无充分之可能。

虽然，有资产阶级的发展，就有无产阶级的形成。因物价昂贵工价低廉在帝国主义之下双方日益增盛，所以无产阶级实行经济斗争；更因列强蛮横卑鄙的政策，军阀强暴残狠的手段，无产阶级的运动在极幼稚的状态中已经逼得直接行向民族斗争、政治斗争。小资产阶级（小农、小商人、小手工业者、知识界）破产异常之速且烈，虽有流入兵队转成反动势力的工具者，而普遍的始终不满于现状（连土匪亦在内）。新生的“婴儿”资产阶级（小工业家及商人之稍能自立的）亦无不本能的反对外国：至于所谓中国的“大资产阶级”、“最近新起的工业家”等，亦迟早必觉着抵制帝国主义的必要。于是，中国的民族运动，得最宜于组织、最易有团结的无产阶级之猛进，当能联合小资产阶级，督促资产阶级而行向民族革命，以至于与世界无产阶级携手，而促成伟大的长期的世界社会革命，彻底颠覆帝国主义。

二 中国的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

中国之反对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固然如上述之大致趋势，已可明了，然因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之途径有特异之点，自然显露种种驳杂的色彩。要明白此中的意义，也就不能不将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作更细些的研究。

大都社会间的变象，受纯粹经济原因的影响的，往往发露得迟缓些；而受政治上近因的影响的，必更急遽。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受外铄的，其第一步，应用近代的汽机技术，却始于军事；李鸿章与彼得大帝所行相同，而所得绝异，此中原因暂不能赘叙；唯军事技术的应用则同由防御外寇而来；在中国又恰与小农破产之过程相遇，于是上则造成军阀，下则造成兵匪。军事技

术为武人附虎翼，小农破产为武人增“炮灰”。这是第一层。对于生产上绝无良果，而适得其反，陡然大增社会之消费。西欧资本主义要发达制造巡洋舰，不知道得花多少年功夫，而中国的资本主义却从巡洋舰开头！此外，外交失败，屡次赔款借债，更是增加平民破产的近因。

因侵入的经济力太强，中国自己的经济力太弱，若要勉强应付，不得不乞灵于所谓“国家”，这与西欧社会党在资产阶级发达已盛时要求“国有”的性质大异，其结果且不能令资产阶级的政府集中资本及生产（因为并无资产阶级国家），当然更不能以此口号而开社会革命之血路（因为本非劳动者所要求），剩得一班士绅阶级，并无经济基础而胡乱借此官营业做无本钱生意，于是发生官僚资本之第一种：此种营业最初大半是路矿。矿则一半供军事，一半供给外国，对于中国自己的生产事业所益有限，而消费却当比拟于先进资本国，因汽机生产成本须大；路则最初亦含有“媚外的”军事性质，虽增加国家收入，而一时并不是适应中国国民经济的自己需要的。西欧资本发达后，方要求煤、铁、铁路，以至于进而求其集中国有，还不知要经多少周折；而中国却为着外人起见，先开发路矿，再来勾通内地，并且逼得非官办不可。（辛亥革命虽闹“民有”铁路，至今中国私人资本家该得起几里铁路！）固然落后的资本国，间或也有这等办法，然实按其当地经济情形，始终比中国此种悬隔状态好几倍。次则，最初一期所谓兴办实业，实在非可怜的小商人阶级所能担任，因此私人公司也往往先归那处于治者地位的士绅阶级，以官为业的官僚阶级，以及少数巨商，大半仍是官商合办等类的把戏；处处惯于借政权作弊，绝不能发生资产阶级最初期所当有的纯粹商品经济，就是不能全靠真正的经济力量来“自由竞争”。于是有官僚资本之第二种。当然流毒至于现在，不但不能十分组织生产，增加生产力，并且惯于与旧治者阶级妥协。这是第二层。

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既然是适应外国帝国主义而非适应中国经济生活，所以先有国内的新式交通事业的发达，以便外货输

人，原料输出；内地一切运输事业随之而兴，尤其是轮船火车兴旺；交通资本先工业资本而发展。这是第三层。交通部在别国不过是国务机关之一，处于资产阶级国家之下，全国资本家的经济力笼罩得住这小小官署。在中国他却会变成所谓一“系”——交通系；可是这不过举例而说，其实这系乃是官僚资本与交通资本的复合幻化，且其灵魂还是包办国债制度呢。

这三层是中国资本主义出世时的特异之处，大足以定他终身的运命。本来中国旧时的所谓“一统江山”，并非政治经济程度已到的集权政府。其时，各区（省）处处自为风气，因为各有各的经济生活，所以若有武人占据，便可随时互相隔离；然而苟有力量征服“海内”，统治全局亦较容易，不用多养兵力，这亦因为各地方经济力弱，只须削除地方的武力，便告成功。因此，凡一统皇帝勘平“群寇”之后，反当解甲兵、“与民休息”。否则全国生活经济必重行骚乱，“长久”治安反不能保。宋的府兵，清的绿营驻防，人数都非常之少：一则恐怕地方将官割据为叛，二则“天下”的财力也实不能担负许多。既无必要又无可能。如今既有湘军、淮军，在洪、杨“屠杀”十数省之后，又要加以“新军”，要用西洋军事技术，如何得了！全国因此雇佣军队的增多征调，各省游民已混流交汇；各省武官渐渐自立门户，其所凭藉之武器军队大非昔比，决不能再低头做“戈什哈”；各地土匪更是暗中滋长，他们的兵器也能精益求精，这可不言而喻。既如此，军阀割据的祸根早已伏下，他们正在想乘机攫取地方政权。再则，各地方士绅巨商，藉购军械、借外债、办“洋务”而自肥，渐渐觉着自己的力量；不但此种畸形发展表面上增加地方“实力”，使能剜肉补疮支持新增的兵饷；而且巨商及官僚的资产阶级，也学会了借谘议局或新式督抚和清廷捣乱，其实欲自获“利权”，却往往利用武人反而自缚。三则，交通事业过量的开发，骤然勾通国内的茅塞，毁坏对外的“长城”，真的资产阶级也未免更受外力的大触动而开始发展；国外的富商要求国家富强而资助革命党，国内的商人初步发展便很觉着外货的侵占；各省

经济生活虽日在勾通，而畛域尚未能全泯，资产阶级受此交通先时开发的影响而偏向商业发展，组织生产的能力尚非常之小；于是因他们反对专制而久伏的动机骤发，既发而力又太小，不足管理国家，不得不随地“请”个武人“保护安宁秩序”。当时此种资产阶级发展的程度，本不能发生什么民主共和的运动。所以大多数资产阶级反对满清的动机，发于间接的恨帝国主义者多，而起于要求民权者少。辛亥革命为反抗满清及列强之双方的民族主义革命，当初是一部分失志的官僚资产阶级，利用此民族主义的国内平民及国外侨商，起而反抗在朝的官僚资产阶级。其结果，平民受欺，侨商被摈；而袁世凯等更利用此自私的新官僚资产阶级，遂成军阀统治。当初是反对铁路“官”有，反对大借款，反对帝国主义；其结果，铁路及借款运动仍旧失败，反而断送关、盐管理权于外人，国债增加几十倍，帝国主义的势力反因此而大增。

辛亥革命之所以成其为“辛亥革命”，中国之所以成其为“中华民国”，真是历史的必然！

三 资产阶级的革命与无产阶级的胜利

中国实业要求发展而抗帝国主义，即必须有政治的独立；如今再一察能争此“独立”的社会力量，此等力量亦正养成于资产阶级发展之中。

军阀、财阀（官僚资本）勾结帝国主义，扰乱经济，为资产阶级的发展之直接障碍，当然不能为中国争独立解放。资产阶级之中，大商阶级依赖外国资本，每每易于妥协，或者想一个军阀来统一太平，以应其经济需要，或者竟想利用外国势力驱逐军阀；海外侨商则受外国直接压迫，比较的革命些；至于小商人虽然能力太小，却因所谓“国货”的发展，反对帝国主义的情绪很普遍；新兴的工业阶级亦必被逼而不得不反抗。劳动阶级之中，农民处于半自然经济的社会里，虽然日渐破产，困苦颠连，而自

已不见仇敌，始终有郁勃不平的倾向；无产阶级因商业交通偏颇的发展，运输工人居多，其中一部分仅是苦力搬运夫，没有受大工业的组织训练；手工业小工业居多，工业中的无产阶级很少很幼稚，大半不脱宗法社会思想的遗毒；然而始终有一部分：铁路工人、矿山工人、纺织工人、海员等，直接与官僚军阀冲突，感觉帝国主义压迫最甚，而亦最易组织。此中凡能反抗帝国主义的势力，自然倾向于联合，起而颠覆帝国主义。

中国之资产阶级的的发展，导源于帝国主义的侵入，亦就不得不成为帝国主义的对抗力。这些对抗力之中，劳动阶级固然因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种种特性而尚弱，现在只有民族主义的觉悟；然而资产阶级之弱更甚于劳动阶级。外国资本的侵略却正在日益加紧，自然而然促成反对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劳动阶级的革命运动之第一步，在中国现时经济状况之下，便表示于民族主义运动之中；然而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运动，更非有劳动阶级的革命行动不能成功。此“最后之市场”——中国，若能奋起，世界帝国主义必然受非常之打击，而世界社会革命乃不得不爆发。



历史的工具——列宁

列宁不是英雄，不是伟人，而只是二十世纪世界无产阶级的工具、向来对于历史上的伟人，大家都竭力崇拜，以为他们有什么了不得的天才，神一般的奇智，能够斡旋天地，变更历史的趋向。其实每一个伟人不过是某一时代，某一地域里的历史工具。历史的演化有客观的社会关系，做他的原动力，伟人不过在有意无意之间执行一部分的历史使命罢了。我们假使崇拜这种历史使命，我们方崇拜他这个人。

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到二十世纪已经进了帝国主义阶段。欧洲大战是一个历史的必然，英、德、法、美的资产阶级，逼于客观的经济需要，不论他们口里说的是什人道正义、国际和平，始终免不了互相杀戮，争夺殖民地，却拿无产阶级及农民来做炮灰。无产阶级受资本主义的剥削，日益集中于城市，日益脱离私产之束缚，日益感觉阶级斗争之必要，日益了解国际团结阶级组织之急需，要有这么一个人，来做国际无产阶级的组织者，来做劳动者对资本家下总攻击的指挥者。整个儿世界帝国主义系统，到欧战之后，已经不能不开始破坏，世界的无产阶级也不能不以强烈的手段攻破这一个铁网而开始自己的建设事业。世界经济的发展和资本集中的程度已经到了社会革命的关头，于是无产阶级不期然而然挑着资产阶级最脆弱最愚蠢的俄国，挑着农民阶级最受压迫最想革命的俄国而发难。然而俄国的十月革命实在是世界革命的开始，所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潮流都集中于俄国，组成了共产国际，开始远大的革命计划。这种环境遂使俄国无产

阶级的先锋——列宁，做成世界社会革命的总指挥者、总组织者。不但如此，帝国主义的成立，全赖征服侵略殖民地的弱小民族——“东方病夫”。帝国主义的崩坏，当然与各殖民地的国民运动的兴起同时实现。所以中国、印度、土耳其等的国民革命自然然是世界社会革命的一部分，而且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于是列宁的“东方革命政策”更使欧美各国无产阶级与亚非各洲的平民之间，找着了一个联合战线的方法；列宁不但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指挥者，并且是一切平民受压迫者的革命运动之组织者。

列宁的伟大不仅在于他的共产主义理想，而在于他能明悉社会进化的趋向，振作自己的革命意志，指示出运用客观的环境以达人类的伟大目的之方法。所以他是全世界受压迫的平民的一个很好的工具。假使没有列宁，世界的帝国主义仍旧是在崩坏，国际的无产阶级仍旧要行社会革命，东方各国的平民仍旧是进行国民运动；不过若是没有列宁，革命的正当方略，在斗争的过程里，或者还要受更多的苦痛，费更多的经验，方才能找着。如今我们有了列宁，全世界的平民便能自觉地、有组织地、有系统地进行革命的伟业。列宁现在死了，在他身后留着伟大的俄国共产党，伟大的共产国际——革命平民的严密组织，照旧地进行他们的事业。他们固然现时感着丧失了一个好工具的痛苦，纪念他，哀悼他，感谢他，然而并不因此而停止他们的革命事业；因为组织已经成立，这列宁的精神并没有死。

这样看来，我们可以更进一步说，列宁不但是历史的工具，而且是革命组织的象征，他是革命组织里的要件。

我们平民曾经用列宁，当他是革命斗争的好工具。我们平民永久崇拜列宁，因为他是革命的象征。

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

哲学的思潮往往是时代的人生观变易之际的产物。譬如法国革命前的百科全书派、启蒙学派，或是欧战前后的复古思潮，都是社会制度根本动摇时的影响。然而每一时代新旧交替之际，各派思想的争辩都含有阶级的背景。中国五四运动前后，有胡适之的实验主义出现，实在不是偶然的。中国宗法社会因受国际资本主义的侵蚀而动摇，要求一种新的宇宙观、新的人生观，才能适应中国所处的新环境，实验主义的哲学，刚刚能用他的积极方面来满足这种需要。这固然是中国“第三阶级”发展时的思想革命。可是实验主义的本身，在欧美思想界里所处的地位是否是革命的呢？这却是一个疑问。

实验主义（唯用主义）首先便否认理论的真实性的，而只看重实用方面，“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可是这一个原则，却亦没有抽象的价值。他的应用亦是因时因地而异其性质的。他应用于中国的时候，对于资产阶级是很好的一种革命手段：且不要管什么礼教罢，怎样能发展你自己，便怎样做；可是他对于劳动阶级的意义，却是：不用管什么社会主义了，怎样能解决你们目前的难题，便怎样做去算了。于是大家蒙着头干去，当前的仇敌，固然因此大受打击，而后面的群众也不至于“妄想”，岂不是很好的手段？所以“且解决目前问题，不必问最后目的”。这种原则，用之于中国，一方面是革命的，一方面就是反动的。至于欧美呢，这却纯粹是维持现状的市侩哲学。

诚然不错，实验主义教中国人自问“为着什么而生活，怎么

样生活？”在中国是旧制度崩坏，新阶级兴起时的革命标语；在欧美却是旧阶级衰落时，自求慰藉的呓语，因为实验主义给的答案是“怎样应付现状”。阶级所处的地位不同，这“应付”的方法也就不同：在中国的第三阶级，要应付军阀的压迫，所以是革命的；在欧美的资产阶级，要应付劳工阶级的反抗，所以是反动的。

中国这样的文化落后的国家，处于国际竞争之间，当然需要科学的知识，以为应付之用，所以实验主义带着科学方法到中国。其实这是一种历史的误会。实验主义只能承认一些实用的科学知识及方法，而不能承认科学的真理。实验主义的特性就在于否认一切理论的确切价值。他是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实用哲学，尤其是“美国主义”。实验主义竭力综合整理现代市俗的心理，暗地里建筑成一个系统，虽然他自己是否认一切哲学系统的。市俗所需要的是“这样亦有些，那样亦有些”：一点儿科学，一点儿宗教，一点儿道德，一点儿世故人情，一点儿技术知识，色色都全，可是色色都不彻底，这样才能与世周旋。可是决不可以彻底根究下去，不然呢，所得的结论，便是彻底改造现存制度，而且非用革命方法不可。那多么可怕呵！现状是可以改造的，却不必根本更动现存的制度，只要琐琐屑屑，逐段应付好了。所以实验主义是多元论，是改良派。

实验主义是什么？

詹姆斯说：实验主义的方法，最先便是消弭哲学上辩来辩去辩不完的争论问题。宇宙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是自由的还是必然的？这是永久不能解决的问题。宇宙的真实，其实可以不用讨论。实验主义只问某种意见在实用上有什么结果。假使某人认甲种意见为真理，认乙种意见为非真理，在实用的结果上，有甚么区别？若是没有什么区别，那就很不用争辩。真正的争辩，只有实用上两种意见有不同的结果时，方有价值。

实验主义的名称——Pragmatism 的语根与欧洲文 Practic（实用）一字相同，本为希腊字“行动”之意（故又译为唯用主义）。普通的哲学系统，大致都以“静观”作考察宇宙的观点；从没有问及宇宙的变易之可能与必然的，亦没有注意到现实世界的积极精神的。实验主义却是一种行动的哲学。

“实验主义远避一切抽象的不可几及的东西，一切纸上的解决，先天的理由，一切硬性的不可变易的原则，一切锁闭的系统以及一切绝对与原理。他只问具体的、切近的东西，只问事实行动及权力。”（詹姆斯之《实验主义》）实验主义不愿意做锁闭的系统。他要成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有这方法可以研究现实生活，并且改革现实生活。他的根本精神就是使一切“思想”都成某种行动的“动机”；他时时刻刻注重现实生活的实用方面及积极性质。这都是实验主义的优点。

然而实验主义的弱点，却亦在他的轻视理论，因为实验主义的宇宙观根本上是唯心论的。

照实验主义说来，一切理论不是解释疑谜的答案，而只是工具罢了。凡是一种理论，一方面是我们对付外界的手段，别方面是一种逻辑的工具，如此而已。人的知识，究竟符合于客观世界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却在于这种知识能否促进我们的某种行动。因此，一切学说的价值，照实验主义的意思说来，只要看他对于我们是否有益。某种学说假使是有益的，便是真实的；有几分利益，便有几分真理。一切真理都应当合于我们的需要。一切学说的真实与否，完全看他实用上的结果而定。“那一种理论对于我们最有贡献，最能领导我们，最能解决现实生活里的各部分的问题，最能综合我们的一切经验，丝毫不爽，这种理论，实验主义方认他是真实的。假使宗教能合乎上述的条件，假使‘上帝’的概念有这样的能力，那么，实验主义又何所根据而反对上帝的存在呢？”（詹姆斯）只要对于事实有利益，不管他究竟真不真，这种理论总是好的，假使宗教能“安人心”，那么，宗教亦是真理。

实验主义的意思，以为真理自身并无何等价值。每种学说必须与人的实际需要发生关系，方能成为真理。假使宗教能帮助我们经营实际生活，减少我们生活里的苦恼，那么，宗教亦是真实的，而且是必要的。

实际上真理是否能作如此解释呢？不然。仅仅是“有益”还不能尽“真实”的意义。一种思想，必须是真实的，必须是合于客观的事实的，方能是有益的；思想的积极精神必须反映现实里的积极精神。事实上无所用其“积极”的地方，单是我们主观的努力是无用的。一定要客观世界给我们一个保证：保证客观里的一切发展是依定律的，这些定律可以做我们人的行动的指导的，那时方有积极之可能。如今实验主义只问理论能否做人的行动的动机，那就是承认一切催眠术式的学说亦是真实的。譬如说：中国现在要一个好政府，你们只要承认这一个意见，动手去干就好了，不必细问这一种意见，是否客观上有实行的可能。中国政治的发展，社会里各种力量的形势，依社会变易的定律，是否容许好政府式的救中国，也应当考虑一下。

何以实验主义以为一切理论自身本无何等价值？这是因为实验主义的宇宙观根本建筑在多元论上。“……现实世界若是离了人的思想，就变成很难捉摸的东西。现实世界接触了人的经验之后，还没有定名，便只造成某种观念；或者呢，现实世界还没有被人认识明白之先，能因经验而与人以某种概念。在这种时候，只有一种模糊的绝对的不可捉摸的意象，——纯粹理想上的一种界说。”（詹姆斯）

如此说来，所谓现实世界只是人的种种色色的感觉之总和。这种感觉以外的真实世界，若是不和我们的经验接触，那么，他的存在与否，都不成问题。于是我们便能任意分割经验上得来的感觉，使成种种事物、种种关系及联系以及我们自己的观念。感觉固然是受外界的刺激而来，绝不受我们的管束的。可是我们有自己的利益和需要，凭着这些利益和需要我们来决定：许许多多感觉之中对于那几种感觉我们便注意，对于那几种便不注意。因

此，现实世界的内容，可以由我们自己选择。外物自外物，我自我。我凭我的需要，择取外物的观念，我所见的现实世界，未必便是别人所见的，我现在所见的现实世界，未必便是我将来所见的。于是外物都成了我们任意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凭着自己的需要而设想出来的。詹姆斯说：“……就是在感觉方面我们的精神亦能在一定的范围里有自由选择的能力。我们能取此舍彼，这便是感觉方面的界限；注重感觉所得的某几部分，而不注意其余的部分，我们就划出一个先后来了；在这里再整理出一个系统之后，我们方能了解他。总之，我们有的是一块大理石，要自己拿来雕一个形象出来。”在某一现实世界里，我们有几种目的，便照着这些目的制造出一种观念来，这些目的以外的现实世界，我们可以不问。因此，对于实验主义，不但没有绝对的现实，并且亦没有客观的现实。其结果完全是唯心论的宇宙观。他的真理便成了主观的。所以，一切“真实”只是为我们思想的方便而设；一切“正义”亦都是为我们行为的方便而设。

照实验主义的观点看来，假使某种真理，因种种原故而变成无益的，他亦就成了谬见；换句话说，假使原有的目的和需要变了，以前的真理便变成非真理了。人的需要，现实生活的要求，主观的愿望及目的是知识和意见之真否的最高标准。这些目的和需要愈有价值，愈高尚，那么，能以达到这些目的和需要的学说也就愈有价值，愈真实。

现实生活里的目的和愿望完全依着我们的利益而定的，所以实验主义的重要观念在于利益；再则，各人的利益不尽相同，所以实验主义便只能承认：有几种利益便有几种真理。从表面上看起来，往往有人以为这种学说和马克思的互辩律的唯物主义很相近。其实不然。

第一层应当注意的就是：马克思主义所注重的是科学的真理，而并非利益的真理。马克思主义以为：“各种观念是由于各种感觉所引起的；感觉乃是人对于外界环境直接起的反应作用；人的行为大致依照着自己的需要和利益而定，尤其是每一社会阶

级的行为是如此。”仅仅承认在心理方面说来，每一社会阶级对于自己有益的真理，对于那种能够做自己阶级斗争的好工具的学说格外接近些；却并没有承认一切有益的学说都是真理，亦没有承认人的愿望和目的可以做外物的标准、真理的规范，更没有承认知识的内容是主观的。

实验主义的积极精神早已包含在互辩律的唯物论里。互辩律的唯物论的根本观念，是承认我们对于外物的概念确能与外物相符合。因此，我们要利用外物，只能尽他实际上所含有的属性，来满足我们的需要，达到我们的目的。客观的现实世界里所没有的东西，不能做我们行动的目标。现实只有一个，真理亦只有一个。我的观念及思想，当然是刻刻变的；然而这是因为客观的现实世界在那里刻刻的变。却并不是因为我们主观的目的在那里变。照互辩律的唯物论的意义，我们亦在时时刻刻变易外界的现实生活，然而只能依着客观的趋向。我们不能要做什么便做什么：现实生活处处时时矫正我们的行动。我们的观念反映客观的现实很正确的时候，我们的行动便不致于和现实相冲突，不致于“碰钉子”。某种意见是真理，并不因为他对于我们有益；这种意见对于我们有益，却因为他是真理，换句话说，就是因为他切合于客观的现实世界。客观的现实世界确是变易不息的，我们因此要求科学的真理——确定的真理，求此变易之中“不易”，不能象实验主义那样，只能暂时有益于我们的算真理。我们得了科学的真理、客观世界的定律之后，才能彻底的改造社会，不能安于琐屑的应付。

实验主义既然只承认有益的方是真理，他便能暗示社会意识以近视的浅见的妥协主义，他决不是革命的哲学。

心的声音（节选）

绪 言

心呢？……真如香象渡河，毫无迹象可寻；他空空洞洞，也不是春鸟，也不是夏雷，也不是冬风，更何处来的声音？静悄悄地听一听：隐隐约约，微微细细，一丝一息的声音都是外界的，何尝有什么“心的声音”。一时一刻，一分一秒间久久暂暂的声音都是外界的，又何尝有什么“心的声音”；千里万里，一寸尺间远远近近的声音，也都是外界的，更何尝有什么“心的声音”。钩辘格磔，殷殷洪洪，啾啾唧唧，呼号刁翟，这都听得很清清楚楚么，却是怎样听见的呢？一丝一息的响动，澎湃訇磕的震动，鸟兽和人底声音，风雨江海底声音几千年来永永不断，爆竹和发枪底声音一刹那间已经过去，这都听得清清楚楚么，都是怎样听见的？短衫袋里时表的声音，枕上耳鼓里脉搏的声音，大西洋海啸的声音，太阳系外陨石的声音，这都听得清清楚楚么，却是怎样听见的呢？听见的声音果真有没有差误，我不知道，单要让他去响者自响，让我来听者自听，我已经是不能做到，我静悄悄地听着，我安安静静地等着；响！心里响呢，心外响呢？心里响的——不是！心里没有响。心外响的——不是！要是心外响的，又怎样能听见他呢？我心上想着，我的心响着。

我听见的声音不少了！我听不了许多凤箫细细，吴语喁喁底声音。我听不了许多管、弦、丝、竹、披霞那、繁华令底声音。

《心的声音》这一组散文和新诗连《绪言》一共六篇，其中《远！》为新诗，未收入。《绪言》初刊于一九二〇年三月二十一日《新社会》旬刊第十五号。《错误》初刊于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一日《新社会》旬刊第十八号。《战争与和平》初刊于一九二〇年五月一日《新社会》旬刊第十九号。《爱》初刊于一九二〇年五月一日《新社会》旬刊第十九号。《劳动》初刊于一九二〇年五月一日《新社会》旬刊第十九号。

我听不了许多呼卢喝雉，清脆的骰声，嘈杂的牌声。我听不了许多炮声、炸弹声、地雷声、水雷声、军鼓、军号、指挥刀、铁锁链底声。我更听不了许多高呼爱国底杀敌声。为什么我心上又一一有回音？

一九一九年五月一日我在亚洲初听见欧洲一个妖怪的声音。他这声音我听见已迟了。——真听见了么？——可是还正在发扬呢。再听听呢，以后的声音可多着哪！欧洲，美洲，亚洲，北京，上海，纽约，巴黎，伦敦，东京……不用说了。可是，为什么，我心上又一一有回音呢？究竟还是心上底回音呢？还是心的声音呢？

一九二〇年三月六日晚上（庚申正月十五夜），静悄悄地帐子垂下了；月影上窗了，十二点过了，壁上底钟滴镗滴镗，床头底表悉杀悉杀，梦里听得枕上隐隐约约耳鼓里一上一下的脉搏声，静沉沉，静沉沉，世界寂灭了么？猛听得砰的一声爆竹，接二连三响了一阵。邻家呼酒了：

“春兰！你又睡着了么？”

“是，着，我没有。”

“胡说！我听着呢。刚才还在里间屋子里呼呼的打鼾呢。还要抵赖！快到厨房里去把酒再温一温好。”

我心上想道：“打鼾声么？我刚才梦里也许有的。他许要来骂我了。”一会儿又听着东边远远地提高着嗓子嚷：“洋……面……饽饽”，接着又有一阵鞭爆声；听着自远而近的三弦声凄凉的音调，冷涩悲亢的声韵渐渐的近了……呜呜的汽车声飒然地过去了……还听得“洋……面……饽饽”叫着，已经渐远了，不大听得清楚了，三弦声更近了，墙壁外的脚步声、竹杖声清清楚楚，一步一敲，三弦忽然停住了。——呼呼一阵风声，月影儿动了两动，窗帘和帐子摇荡了一会儿……好冷呵！静悄悄地再听一听，寂然一丝声息都没有了，世界寂灭了么？

月影儿冷笑：“哼，世界寂灭了！大地上正奏着好音乐，你自己不去听！那洪大的声音，全宇宙都弥漫了，金星人，火星

人，地球人都快被他惊醒那千百万年的迷梦了！地球东半个，亚洲的共和国里难道听不见？现在他的名义上的中央政府已经公布了八十几种的音乐谱，乐歌，使他国里的人民仔细去听一听，你也可以随喜随喜，去听听罢。”我不懂他所说的声音。我只知道我所说的声音。我不能回答他。我想，我心响。心响，心上想：“这一切声音，这一切……都也许是心外心里的声音，心上的回音，心底声音，却的确都是‘心的声音’。你静悄悄地去听，你以后细细地去听。心在那？心呢？……在这里。”

一九二〇，三，六。

一 错误

暗沉沉的屋子，静悄悄的钟声，揭开帐子，窗纸上已经透着鱼肚色的曙光。看着窗前的桌子，半面黑魆魆，半面黯沉沉的。窗上更亮了。睡在床上，斜着看那桌面又平又滑，映着亮光，显得是一丝一毫的凹凸都没有。果真是平的。果真是平的么？一丝一毫的凹凸都没有么？也许桌面上，有一边高出几毫几忽，有一边低下几忽几秒，微生物看着，真是帕米尔高原和太平洋低岸。也许桌面上，有一丝丝凹纹，有一丝丝凸痕，显微镜照着，好像是高山大川，峰峦溪涧。我起身走近桌子摸一摸，没有什么，好好的平滑桌面。这是张方桌子。方的么？我看着明明是斜方块的。站在洗脸架子旁边，又看看桌子，呀，怎么桌子只有两条腿呢？天色已经大亮，黯沉沉的桌子现在已经是黄澄澄的了。太阳光斜着射进窗子里来，桌面上又忽然有一角亮的，其余呢——黯的，原来如此！他会变的。……唉，都错了！……

洗完脸，收拾收拾屋子，桌子，椅子，笔墨书都摆得整整齐齐。远远的看着树梢上红映着可爱的太阳儿，小鸟啁啾唱着新鲜曲调，满屋子的光明，半院子的清气。这是现在。猛抬头瞧着一张照片，照片上：一角花篱，几盆菊花，花后站着、坐着三个人。我认识他们，有一个就是我！回头看一看，镜子里的我，笑

着看着我。这是我么？照片上三个影子引着我的心灵回复到五六年前去。——菊花的清香，映着满地琐琐碎碎的影子，横斜着半明不灭的星河，照耀着干干净净的月亮。花篱下坐着三个人，地上纵横着不大不小的影子，时时微动，喁喁的低语，微微的叹息，和着秋虫啾啾唧唧，草尖上也沾着露珠儿，亮晶晶的，一些些拂着他们的衣裳。暗沉沉的树荫里飕飕的响，地上参差的树影密密私语。一阵阵凉风吹着，忽听得远远的笛声奏着《梅花三弄》，一个人从篱边站起来，双手插插腰，和那两个人说道：“今天月亮真好。”……这就是我。这是在六年以前，这是过去。那又平又滑的桌面上放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请秋白明天同到三贝子花园去。呵！明天到三贝子花园去的，不也是我么？这个我还在未来；如何又有六年，如何又有一夜现在，过去未来又怎样计算的呢？这果真是现在，那果真是过去和未来么？那时，这时，果真都是我么？……唉！都错了！……

我记得，四年前，住在一间水阁里，天天开窗，就看着那清澄澄的小河，听着那咿咿哑哑船上小孩子谈谈说说的声音。远远的，隐隐约约可以看见江阴的山，有时青隐隐的，有时黑沉沉的，有时模模糊糊的，有时朦朦胧胧的，有时有，有时没有。那天晚上，凭着水阁的窗沿，看看天上水里的月亮。对岸一星两星的灯光，月亮儿照着，似乎有几个小孩子牵着手走来走去，口里唱着山歌呢。忽然听着一个小孩子说道：

“二哥哥，你们看水里一个太阳，太……”又一个道：

“不是，是月亮，在天上呢，不在水里。”转身又向着那一个小孩子说道：

“大哥哥，怎么今天月亮儿不圆呢？昨天不是圆的么？”听着回答道：

“怎么能天天都是圆的呢？过两天还要没有月亮呢。”

“大哥骗我，月亮不是天生圆的么？不是天天有的么。”

“我们去问姊姊。姊姊，姊姊。我刚才和阿二说，月亮会没有的，他不信，他说我说错了。”姊姊说道：

“妈妈的衣服还没有缝好呢，你们又来和我吵，管他错不错呢……”

一九二〇，三，三十。

二 战争与和平

小花厅里碧纱窗静悄悄的，微微度出低低的歌声。院子里零零落落散了一地的桃花，绿荫沉沉两株杨柳，微风荡漾着。一个玲珑剔透六七岁的小孩子坐在花厅窗口，口里低低的唱着：

“姊姊妹妹携手去踏青。

垂垂杨柳，啾啾莺声，

春风拂衣襟，春已深。

郊前芳草地，正好放风筝……”

桌子上放着一个泥人，是一个渔婆，手里提着一只鱼篮，背上搁着很长很长一竿钓鱼竿，丝线做的钓丝，笑嘻嘻的脸。小孩子一面唱一面用手抚着那钓丝，把许多桃花片，一片一片往钓丝上穿，又抓些榆钱放在那鱼篮里。又一个小孩子走来了。说道：“哥哥，我找你半天了，爸爸给我一个皮球。”那哥哥道：“我不爱皮球。弟弟，你来瞧，渔婆请客了，你瞧他体面不体面？篮子里还装着许多菜呢。”弟弟瞧一瞧说道：“真好玩，我们两个人来玩罢。”说着，转身回去拿来许许多多纸盒，画片，小玻璃缸，两只小手都握不了。一忽儿又拿些洋团团，小泥人来了。两个小孩子摆摆弄弄都已摆齐了，喜欢得了不得，握握手对着面笑起来。弟弟一举手碰歪了一只小泥牛，哥哥连忙摆好了说道：“都已齐了，我们请姊姊来看，好不好呢？”弟弟说：“我去请。”说着兴头头的三脚两步跑进去了。一忽儿又跑出来气喘喘的说道：“姊姊不来，他在那儿给渔婆做衣服呢。”

哥哥道：“他不来么？”说着，又把一张画片放在渔婆面前说

道：“弟弟，你瞧，渔婆又笑了。”弟兄两个人拍着手大笑。一忽儿，哥哥弟弟都从椅子上下来，一面踏步走，一面同声唱着，嚷着很高的喉咙，满花厅的走来走去，只听得唱道：

“……战袍滴滴胡儿血。

自问生平……头颅一掷轻。”

一面唱一面走出花厅，绕着院子里两株杨柳，跑了两三匝。哥哥忽然说道：“渔婆要哭了，进去罢。”弟兄两个又走进花厅，两个人都跑得喘吁吁的。哥哥在桌子上一翻，看见一张画片，诧异道：“谁给你的？我昨天怎么没有看见他？”弟弟道：“爸爸昨天晚上给我的。”哥哥道：“送给我罢。”弟弟道：“不，为什么呢？爸爸给我的。”弟弟说着，把那张画片抢着就跑。哥哥生气道：“这些我都不要了……”说着，两只小手往桌子上乱扑乱打了一阵。渔婆，小泥人，玻璃缸打得个稀烂。弟弟听着打的声音又跑回来，看一看，哭道：“你把我洋团团底头打歪了，我告诉爸爸去！”说着往里就跑，哥哥追上去，弟兄俩扭做一堆，连扭带推，跑过院子，往里面上房里去了。

只听花厅背后，弟弟嚷着的声音：“姊姊！姊姊！哥哥打我……”

院子里绿荫底下，落花铺着的地上，却掉着一张画片——原来是法国福煦元帅底彩色画像，戴着军帽穿着军衣的……

一九二〇，三，二十八。

三 爱

“爱”不是上帝，是上帝心识底一部现象。

——托尔斯泰

“唔唔……妈呢？……”

“好孩子。妈在城外赶着张大人丧事，讨些剩饭剩菜我们吃呢。闭着眼静静儿罢。陆毛腿去弄药草怎么到现在还不来呢？”

孩子，你饿吗？难受得厉害吗？吃什么不要？”

“我……唔唔……我……我我……不……我不……”

模模糊糊的呻吟声，发着，断断续续的……轻微声浪隐隐的震着，沉静的空气里荡漾着……唉！

嫩芽婀娜的几株垂杨底下，一家车门旁边，台阶上躺着十二三岁的孩子，仰面躺着，那如血的斜阳黯沉沉的映着他姜黄色的脸，只见他鼻孔一扇一扇，透不出气似的，时时呻吟着。旁边跪着一个老头儿，满脸沙尘，乱茅茅的胡须，蓬蓬松松的头发，苍白色的脸，远看着也分不出口鼻眼睛，只见乌黑阵阵的一团。他跪在地上，一手拿着许多柳枝替小孩子垫头，一手抚着小孩子底胸，不住的叹气，有时翻着自己褴褛不堪的短衫搔搔痒。他不住的叹气，不住的叹气！心坎里一阵酸一阵苦。他时时望着西头自言自语：“来了吗？没有！不是；好孩子！”……“你妈……”

我在街上走着，走着，柳梢的新月上来了……呼呼一阵狂风。呼……呼……满口的沙尘。唉！风太大了！……

一个“冥影”魑然一扇，印在我心坎里，身上发颤，心灵震动……震动了。他们……他们那可怕的影子，我不敢看。

“老爷，爷爷！多福多寿的爷爷，赏我们……赏……”

那老头儿在地上碰着头直响，脸上底泥沙更多了。小孩子翻一翻眼，唉！可怕！他眼光青沉沉的……死……死人似的！可怕！

“老爷，我这小孩子病了。怎好？赏几个钱……”

老头儿又碰着头，我走过他们，过去了，又回头看看，呀！……给他们两个铜元……两个铜元？

老头儿拣着，磕头道谢；又回身抚着小孩子，塞一个铜元在他手里，又道：“妈来了，来了。”小孩睁一睁眼……我又回头一看，赶快往前就走。我心里，心里跳。怪，鬼，魔鬼！心里微微的颤着，唉！

……

我事情完了，要回家去。叫洋车。坐上车，一个小孩子跟着

车夫。车夫给他一个铜元道：“家去跟着妈罢！”

“爸爸回来吃晚饭？我们等着爸爸……等着您！”

东长安街两边的杨柳、榆树，月亮儿莹洁沉静，沉静的天空。呀！不早了！十点半。车夫拖着车如飞的往前走去。似乎听得：“妈！……好吃……嘻嘻嘻……”

月亮儿莹洁沉静，沉静的天空！

“爱！”……宇宙建筑在你上。

四 劳 动？

青隐隐的远山，一片碧绿的秧田草地，点缀着菜花野花，一湾小溪潺潺流着；荫沉沉的树林背后，露出一两枝梨花，花下有几间茅屋。风吹着白云，慢慢的一朵朵云影展开，绉得似鱼鳞般的浪纹里映着五色锦似的，云呵，水呵，微微的笑着；远山颠隐隐的乌影闪着，点点头似乎会意了。啁啾啾的小鸟，呢呢喃喃的燕子织梭似的飞来飞去。青澄澄的天，绿茫茫的地，荫沉沉的树荫，静悄悄的流水，好壮美的宇宙呵，好似一只琉璃盒子。

那琉璃盒，琉璃盒里有些什么？却点缀着三三两两的农夫弓着背曲着腰在田里做活。小溪旁边，田陇西头，一个八九岁的小孩子，穿着一条红布裤子，一件花布衫，左手臂上补着一大块白布，蓬着头，两条小辫子斜拖着，一只手里拿着一件破衣服，汗渍斑驳的，一只手里提着篮，篮里放着碗筷，慢慢的向一条板桥走去，口里喃喃的说道：“爸爸今日又把一些菜都吃了，妈又要抱怨呢。”他走到桥上，刚刚两只燕子掠水飞过，燕子嘴边掉下几小块泥，水面上顿时荡着三四匝圆圈儿。他看着有趣，站住了，回头看一看，他父亲又叫他快回家。他走过桥去，一忽儿又转身回来，走向桥坞下，自言自语道：“妈就得到这儿来洗这件衣服，放在这儿罢。”一面说，一面把那件衣服放在桥下石磴上，起身提着篮回去了。

夕阳渐渐的下去了，那小孩子底父亲肩着锄头回家了，走过

桥边洗洗脚，草鞋脱下来提在手里，走回家去。远山外还是一片晚霞灿烂，映着他的脸，愈显得紫澄澄的。他走到家里。“刚换下来的衣服洗了没有？”一个女人答道：“洗好了。四月里天气，不信有这么热！一件衬里布衫通通湿透了。”——接着又道：“张家大哥回来了，还在城里带着两包纱来给我，说是一角洋钱纺两支。”那父亲道：“那不好吗，又多几文进项。”

那父亲又道：“我吃过饭到张家去看看他。”小孩子忙着说道：“我跟着爸爸同去，张家姊姊叫我去帮他推磨呢。”父亲道：“好罢，我们就吃饭罢。”大家吃过饭，那女人点着灯去纺纱了，爷儿两个同着过了桥，到对村张家来。

听着狗汪汪的叫了两声，一间茅屋里走出一个人来说道：“好呀！李大哥来了，我午上还在你家里看你们娘子呢，我刚从城里回来就去看你，谁知道已经上了忙了，饭都没有工夫回家吃，我去没有碰着你，你倒来了。”接着三个走进屋子，屋子里点着一盏半明不灭的油灯，摆着几张竹椅子，土壁上挂一张破钟馗，底下就摆一张三脚桌子；桌子旁边坐着一位老婆婆，手里拈着念佛珠，看见李大哥进来忙着叫他孙女翠儿倒茶。一忽儿翠儿同着李家的小孩子到别间屋子里去了，李大就在靠门一张矮竹椅上坐下，说道：“谢谢你，张大哥，给我带几支纱回来。”那老婆婆说道：“原来你们娘子也纺‘厂纱’吗？那才好呢。多少钱纺一支？”张大道：“半角洋钱。”老婆婆说道：“怪不得他们都要纺纱纺线的。在家里纺着不打紧，隔壁的庞家媳妇不是到上海什么工厂纱厂里去了么？山迢水远的，阿弥陀佛，放着自己儿女在家里不管，赤手赤脚的东摸摸西摸摸，有什么好处！穿吃还不够，镀金戒指却打着一个，后来不知怎么又当了，当票还在我这儿替他收着呢。阿弥陀佛！”

李大问张大道：“庞大现在怎么样了？”老婆婆抢着说道：“他么？阔得很呢！哼！从城里一回来，就摇摇摆摆的，新洋布短褂，新竹布长衫，好做老爷了。一忽儿锄头碰痛了他的手，一忽儿牛鼻子擦脏了他的裤子，什么都不是了；见着叫都不叫一

声，眼眶子里还有人吗？我看着他吃奶长大了的，这忽儿乾妈也不用叫一声了，当了什么工头，还是什么婆头呢？阿弥陀佛！算了罢！”

张大道：“妈那儿知道呢？他只好在我们乡下人面前摆摆阔，见他的鬼呢！我亲眼看见他在工厂门口吃外国火腿呢，屁股上挨着两脚，那外国人还叽叽咕咕骂个不住，他只板着一张黑黝黝的脸，瞪着眼，只得罢了，还说什么‘也是’‘也是’。他们那些工厂里的人是人吗？进了工厂出来，一个个乌嘴白眼的，满身是煤灰，到乡下来却又吵什么干净不干净了，我看真像是‘鬼装人相’，洋车夫还不如。”

老婆婆道：“又来了，拉洋车就好吗？你还不心死？拉洋车和做小工的，阿弥陀佛，有什么好处！有一顿没一顿的。你还想改行拉车么？我说你还是不用到城里罢，水也不用挑了。快到头忙了，自己没有田，帮着人家做做忙工，在家里守着安安稳稳的不好吗？”李大道：“婶婶说得对。现在人工短得很，所以忙工的钱也贵了，比在城里挑水也差不了多少，还吃了人家的现成饭，比我自己种那一二亩田还划算得来呢。”

张大道：“差却不差，我明后天上城和陈家老爷说，我的挑水夫底执照请他替我去销了罢，横竖陈家老爷太太太多慈悲，下次再去求他没有不肯的。人家二文钱一担水，他家给三文，现在涨了，人家给四文钱，他家总算七八文，不然我早已不够吃了。”老婆婆叹口气道：“阿弥陀佛，那位老爷太太多子多孙多福多寿。”李大也说声“阿弥陀佛”，说着站起来叫他小孩子道：“我们回去罢，小福，出来罢，请翠姐姐空着就到我们家里去玩。”小福答应着，同着翠儿出来。爷儿二个一同告别要走，翠儿还在后面叫着小福道：“不要忘了，福弟弟，我们明天同去看燕子呀。”说着，祖孙三个都进屋子里去。

月亮儿上来了，树影横斜，零零落落散得满地的梨花，狗汪汪的叫着……。

饿乡纪程

——新俄国游记（节选）

绪 言

阴沉沉，黑魑魑，寒风刺骨，腥秽污湿的所在，我有生以来，没见一点半点阳光，——我直到如今还不知道阳光是什么样东西，——我在这样的地方，视觉本能几乎消失了；那里虽有香甜的食物，轻软的被褥，也只值得昏昏酣睡，醒来黑地里摸索着吃喝罢了。苦呢，说不得，乐呢，我向来不曾觉得，依恋着难舍难离，固然不必，赶快的挣扎着起来，可是又往那里去的好呢？——我不依恋，我也不决然舍离……然而心上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滋味呵！这才明白了！我住在这里我应当受，我该当。我虽然明白，我虽然知道，我“心头的奇异古怪的滋味”我总说不出来。“他”使我醒，他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谜儿，他变成了一个“阴影”朝朝暮暮的守着我。我片刻不舍他，他片刻不舍我。这个阴影呵！他总在我眼前晃着——似乎要引起我的视觉。我眼睛早已花了，晕了，我何尝看得清楚。我知我们黑甜乡里的同伴，他们或者和我一样。他们的眼前也许有这同样的“阴影”。我问我的同伴，我希望他们给我解释。谁知道他们不睬我，不理我。我是可怜的人儿。他们呢，——或者和我一样，或者自以为很有幸福呢。只剩得和我同病相怜的人呵，苦得很哩！——我怎忍抛弃他们。我眼前的“阴影”不容我留恋，我又怎得不决然舍离

《饿乡纪程》于一九二二年九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时，经作者友人改名为《新俄国游记》，一九五三年十月编入《瞿秋白文集》时，恢复原书名，改《新俄国游记》为副题。

此地。

同伴们，我亲爱的同伴们呵！请等着，不要慌。阴沉沉，黑魑魑的天地间，忽然放出一线微细的光明来了。同伴们，请等着。这就是所谓阳光，——来了。我们所看见的虽只一线，我想他必渐渐的发扬，快照遍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兄弟。请等着罢。

唉！怎么等了许久，还只有这微微细细的一线光明，——空教我们看着眼眩——摇荡恍惚晞微一缕呢？难道他不愿意来，抑或是我们自己挡着他？我们久久成了半盲的人，虽有光明也领受不着？兄弟们，预备着。倘若你们不因为久处黑暗，怕他眩眼，我去拨开重障，放他进来。兄弟们应当明白了，尽等着是不中用的，须得自己动手。怎么样？难道你们以为我自己说，眼前有个“阴影”，见神见鬼似的，好象是一个疯子，——因此你们竟不信我么？唉！那“阴影”鬼使神差的指使着我，那“阴影”在前面引着我。他引着我，他亦是为你们呵！

灿烂庄严，光明鲜艳，向从来没有看见的阳光，居然露出一线，那“阴影”跟随着他，领导着我。一线的光明！一线的光明，血也似的红，就此一线便照遍了大千世界。遍地的红花染着战血，就放出晚霞朝雾似的红光，鲜艳艳地耀着。宇宙虽大，也快要被他笼罩遍了。“红”的色彩，好不使人烦恼！我想比黑暗的“黑”多少总含些深意。并且黑暗久了，骤然遇见光明，难免不眼花缭乱，自然只能先看见红色。光明的究竟，我想决不是纯粹红光。他必定会渐渐的转过来，结果总得恢复我们视觉本能所能见的色彩。——这也许是疯话。

世界上对待疯子，无论怎么样不好，总不算得酷虐。我既挣扎着起来，跟着我的“阴影”，舍弃了黑甜乡里的美食甘寝，想必大家都以为我是疯子了。那还有什么话可说！我知道：乌沉沉甘食美衣的所在——是黑甜乡；红艳艳光明鲜丽的所在——是你们罚疯子住的地方，这就当然是冰天雪窖饥寒交迫的去处（却还不十分酷虐），我且叫他“饿乡”。我没有法想了。“阴影”领我去，我不得不去。你们罚我这个疯子，我不得不受罚。我决不

忘记你们，我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我愿去，我不得不去。我现在挣扎起来了，我往饿乡去了！

一九二〇，十一，四。哈尔滨。

二

生活也好似行程。青山绿水，本来山阴道上，应接不暇。疾风迅雷，清阴暖日，就是平平常常一时一节的心绪，也有几多自然现象的反映。何况自然现象比社会现象简单的多，离人生远得多。社会现象吞没了个性，好一似洪炉大冶，熔化锻炼千万钧的金锡，又好象长江大河，滚滚而下，旁流齐汇，泥沙毕集，任你鱼龙变化，也逃不出这河流域以外。这“生命的大流”虚涵万象，自然流转，其中各流各支，甚至于一波一浪，也在那里力求突出的生活，因此各相搏击迸涌，转变万千，而他们——各个的分体，整个的总体——都不知道自己，不知道自己的转变在空间时间中生出什么价值。只是蒙昧的“动”，好象随“第三者”的指导，愈走愈远，无穷无尽。——如此的行程已经几千万年了。

人生在这“生命的大流”里，要求个性的自觉（意识），岂不是梦话！然而宇宙间的“活力”，那“第三者”，普遍圆满，暗地里作不动不静的造化者，人类心灵的谐和，环境的应响，证实天地间的真理。况且“他”是“活力”，不流转而流转，自然显露，不着相而着相，自然映照。他在个性之中有，社会之中亦有，非个性有，非社会有，——似乎是“第三者”而非第三者。

“生命大流”的段落，不能见的，如其能见，只有世间生死的妄执，他的流转是不断的；社会现象，仍仍相因，层层衔接，不与我们一明切的对象，人生在他中间，为他所包涵，意识（觉）的广狭不论，总在他之中，猛一看来，好象是完全汨没于他之内。——不能认识他。能认识他的，必定得暂舍个性的本位。——取第三者的地位：“生命大流”本身没有段落，可以横

截他一断；社会现象不可认识，有个性的应和响；心灵的动力不可见，有环境为其征象。

在镜子里看影子，虽然不是真实的……可是真实的在那里？……

“人生都是社会现象的痕迹，社会现象都是人生反映的蜃楼。”社会吞没了一切，一切都随他自流自转。我如其以要求“突出生活”的意象想侵犯“社会”的城壁，要刻划社会现象的痕迹，要……，人家或者断定我是神经过敏了。

中国社会组织，有几千年惰性化的（历史学上又谓之迟缓律）经济现象做他的基础。家族生产制，及治者阶级的寇盗（帝皇）与半治者阶级的“士”之政治统治包括尽了一部“二十四史”。中国周围的野蛮民族，侵入中国文化，使中国屡次往后退，农业生产制渐渐发达，资本流通状态渐渐迁移，刚有些眉目，必然猛又遇着游牧民族的阻滞。历史的迟缓律因此更增其效力。最近一世纪，已经久入睡乡的中国，才矇矓矓矓由海外灯塔上得些微光，汽船上的汽笛唤醒他的痴梦，汽车上的轮机触痛他的心肺。旧的家族生产制快打破了。旧的“士的阶级”，尤其不得不破产了。畸形的社会组织，因经济基础的动摇，尤其颠危簸荡紊乱不堪。

我的诞生地，就在这颠危簸荡的社会组织中破产的“士的阶级”之一家族里。这种最畸形的社会地位，濒于破产死灭的一种病的状态，绝对和我心灵的“内的要求”相矛盾。于是痛，苦，愁，惨，与我生以俱来。我家因社会地位的根本动摇，随着时代的潮流，真正的破产了。“穷”不是偶然的，虽然因家族制的维系，亲戚相维持，也只如万丈波涛中的破船，其中名说是同舟共济的人，仅只能有牵衣悲泣的哀情，抱头痛哭的下策，谁救得谁呢？我母亲已经为“穷”所驱逐出宇宙之外，我父亲也只是这“穷”的遗物。我的心性，在这几几乎类似游民的无产阶级（lumpen proletariat）的社会地位中，融陶铸炼成了什么样子我也

不能知道。只是那垂死的家族制之苦痛，在几度的回光返照的时候，映射在我心里，影响于我生活，成一不可灭的影象，洞穿我的心胸，震颤我的肺肝，积一深沉的声浪，在这蜃楼海市的社会里；不久且穿透了万重疑网反射出一心苗的光焰来。

我幼时的环境完全在破产的大家族制度的反映里。大家族制最近的状态，先则震颤动摇，后则渐就模糊渐灭。我单就见闻所及以至于亲自参与的中国垂死的家族制度之一种社会现象而论，只看见这种过程，一天一天走得紧起来。好的呢，人人过一种枯寂无生意的生活。坏的呢，人人——家族中的分子，兄弟，父子，姑嫂，叔伯，——因经济利益的冲突，家庭维系——夫妻情爱关系——的不牢固，都面面相觑戴着孔教的假面具，背地里嫉恨怨怼诅咒毒害，无所不至。“人与人的关系”已在我心中成了一绝大的问题。人生的意义，昏昧极了。我心灵里虽有和谐的弦，弹不出和谐的调。……

我幼时虽有慈母的扶育怜爱；虽有江南风物，青山秀水，松江的鲈鱼，西乡的菰菜，为我营养；虽有豆棚瓜架草虫的天籁，晓风残月诗人的新意，怡悦我的性情；虽亦有耳鬓厮磨啾啾情话，亦即亦离的恋爱，安慰我的心灵；良朋密友，有情意的亲戚，温情厚意的抚恤，——现在都成一梦了。虽然如此呵！惨酷的社会，好象严厉的算术教授给了我极难的天文学算题，闷闷的不能解决；我牢锁在心灵的监狱里。“内的要求”驱使我，——悲惨的环境，几乎没有把我变成冷酷不仁的“畸零之人”，——我决然忍心舍弃老父及兄弟姊妹亲友而西去了。

三

小小的院落，疏疏的闲花闲草，清早带些微霜，好象一任晓风颭拂摇移，感慨有些别意，仿佛知道，这窗中人快要离他们远去万里了。北京四年枯寂的生涯，这小小的院落容我低徊俯仰，也值得留一纪念，如今眼看别离在即，旧生涯且将告一段落，我

也当有以安慰安慰这院落中的旧伴呵。可是呢。……我没离故乡之前，常州红梅阁的翠竹野花，环溪的清流禾稼，也曾托我的奇思遐想。母亲去世，一家星散，我只身由吴而鄂，由鄂而燕。黄陂铁锁龙潭的清波皓月，也曾使我低徊留恋；以至于北京南湾子头的新柳，丝丝的纤影，几番几次拂拭我的悲怀诗思。我又何独对于这小院落中奄奄的秋花格外深情呢？“自然”向不吝嗇他自己的“美”，也未必更须对我卖弄，——我只须能尽量享用，印取他的“美”意，自慰偏枯悲涩的心怀，离别便离别，一切不过“如是而已”。

我离山东回到北京之后，匆匆的整理行装，早夜疲乏，清晨起来没精打采的坐着，不知道辜负了这小院秋花的多少好意。我纯哥的家庭，融融泄泄，安闲恬静的生涯虽说不得，隐隐地森严规律的气象，点缀些花草的闲情雅意，也留我许多感想。我因远别在即，黄昏时归来就同哥嫂家常闲话，在北京整整的住了四年，虽纯哥是按“家族的旧道德”培植扶助我，我又被“新时代的自由神”移易了心性，不能纯然坐在“旧”的监狱里，或者有和他反背的意见，——纯哥当初竭力反对我到俄国去，以为自趋绝地，我却不是为生乃是为死而走，论点根本不同，也就不肯屈从，——到现在一切都已决定，纯哥亦就不说什么，勉励我到俄国后专门研究学问，不要半途而辍。兄弟的情分，平常时很宽泛泛，如今却又有些难舍。——人生生活的剧烈变更，每每使心理现象，出于常规，向一方面特别发展。我去国未决定以前，理智强烈，已决定后，情感舒展伸长，这一时期中总觉得低徊感慨之不尽。然而走是已决定走的了。我这次“去国”的意义，差不多同“出世”一样，一切琐琐屑屑“世间”的事，都得作一小结束，得略略从头至尾整理一番。哥嫂的谈话，在家事上也帮助我不少。

应整顿的事繁琐得很。母亲死时遗下的债务须得暂时有个交托，——破产的“士的阶级”大半生活筑在债台上，又得保持旧的“体面”，不让说是无赖呵！——旧时诗古文词稿，虽则已经

视如敝屣，父亲却要他做个纪念，须得整理出来；幼时的小伴，阔别已经好几年，远在江南，不能握别，须得写封信告辞。总之当时就知道俄国远处万里，交通梗塞，而且我想一去不知道甚时才能回来（生命于我无所重轻），暂时须得象永告诀别似的，完一番“人间的”手续。于是抽出这几天晚上整理整理。

儿时的旧伴，都已星散了，谁还管得谁？然而我写信时，使我忆及我一少寡的表姊。他现在只他一人同一遗腹子孤苦伶仃的住在母家，我姑母受儿媳的供养已是很为难，何尝能好好周顾到他呢。姑母家是地主，然而生活程度随着渐渐欧化的城市生活增高，农业生产，却因不能把他随着生活程度增高的雇工价值核计，不会处置变态中的农地生产资本，而且新由大家族经济变成个人经济，顿然现出濒于破产的现象。于是我表姊的寄生中之寄生生涯，精神苦痛不可言喻。还有一个表姊，从小没有母亲，和我一处长大的，他家亦是破产的“土的阶级”，丈夫是小学教员，儿女非常的多，非但自己创不起小家庭，还非得遵从家族经济的原则，所谓仰事俯蓄，艰难得很。我表姊感着“中国妇女的痛苦”，每每对于生活起疑问。他又何尝能解决他呢？

夜深人静，灯光黯黯的笼罩着人的愁思。晚风挟着寒意，时时到窗隙里来探刺。握着笔要写又写不下去：旧话重提有什么意味？生活困难，心绪恶劣，要想得亲近人的慰藉，这也是人情，可是从何说起！亲人的空言虽比仇人的礼物好，究竟无益于事。况且我的亲友各有自己阶级的人生观，照实说来，又恐话不投机，徒然枉费。中国的社会生活，好象朦胧晓梦，模糊得很。人人只知道“时乖命蹇”，那知生活的帐子里有巨大的毒虫以至于蚊蚋，争相吸取他们的精血呢？大千世界生命的疑问不必提起。各人吃饭问题的背后，都有世界经济现象映着，——好象一巨大的魔鬼尽着在他们所加上去的正数旁边画负号呢。他们怎能明白！我又怎能一一的与以慰藉！……几封诀别的信总算写完了。

我记得，我过天津的时候，到亲戚家去，主人是我世交，又是我表姊丈。他们知道我有远行，开瓶白兰地酒痛饮半宵。我这

位表姊，本是家乡的名美人，现在他饱经世变，家庭生活的苦痛已经如狂风骤雨扫净了春意。那天酒酣耳热，大家吃着茶，对着烟灯谈话。表姊丈指着烟盘道：“我一月赚着五六十块钱，这东西倒要去掉我六十元。你看怎么过？”表姊道：“他先前行医也还赚几个额外的钱。他却懒得什么似的，爱去不去，生意怎么能好？铁路局里面的事情，还是好容易靠着我们常州‘大好老’（这是常州话，指京里的大官说的）的面子弄着的，他也是一天去，两天不去。事情弄掉了，看怎么样！……”他女儿丰儿忽然插话对我说道：“双舅舅，双舅舅。你同我上北京去罢？去看三姨，三姨上次来我家里，和娘娘谈天，后来不知道怎么还淌眼泪来呢。……”茶已经吃完了，烟也抽了不少了。我的醉意也渐渐醒了。……那天从他们家里回客栈，不知怎么，天津的街市也似乎格外凄凉似的。……

我记得，北京西城一小公寓，短短的土墙，纸糊的窗格，院子里乱砌着鸡冠凤仙花，一见着就觉得一种极勉强极勉强的城市生活的光景。我那天去看亲戚，进了他的屋子，什物虽收拾得整整齐齐，地方究竟太窄些。我告诉了我这表舅母快要到俄国去的话。他道：“这样亦好。你母亲一世愁穷，可惜等你学好了本事，他再也看不见了。”我道：“这也罢了！我是很爱学的。穷迫得紧，几几乎没有饿死，学不成学得成又是一事。一点希望本只在自己。第一次从常州出门求学，亏得你当了当头借给我川资。这次出去求学，也刚巧借着了钱。究竟穷是什么事，暂且不放他在心上。……”我去国的志愿究竟在什么地方，不能表示出来，现在中国社会思想，截然分了两个世界，新旧的了解是不可能的。——表舅母接着问道：“你在天津看你二表姊去没有？他姑爷还吸鸦片么？”我道：“怎么不吸？”他叹道：“象我们这样丝毫没有人家的也不用说。他们这般公子少爷，有了财产拼命浪费；——也难怪他，他父亲不会教训，和儿子是一样的货。‘有’的时候，不知道上进。现在‘没’了，看怎么样。他却还吸烟！现今还比得从前吗？……象你表舅，从小没钱求学。现在一家两

口，东飘西走，一月进款三四十元，够什么！这个那个小机关上的小官员，如此景况的人成千成万。现在的世界，真不知道是什么世界！……”接着又问道：“三小姐到京了，你去看他没有？”我说我看见过了。他道：“三小姐这桩亲事，真正……小孩子时候就定亲许人家，最坏事。幸而他们夫妻还亲爱。不过姑爷中文都不大好，又不能做什么事，生计是……将来很艰难呵。……”

我记得，我心灵里清纯洁白一点爱性，已经经过徘徊缠绵的一番锻炼。如今好象残秋垂柳，着了严霜，奄奄地没有什么生意了。枯寂的生活，别有安闲的乐趣。然而外界偶然又有感触，即使一片云影，几朵落花，也能震动我的心神。我的心神现在虽已在别一个世界，依旧是……何况，这又和旧时代的精神密切相关，是旧社会生活的遗迹，感动了我别方面的感慨，更深了我的“人与人之关系”的疑问呢？……这一天，我看三妹去，他说：“我刚从南边来，你又要到北边去了！……我一个人离母家这样远，此地好象另一世界似的。满北京只有一两个熟人。西城的你的表舅母，却到我这里来了，你近来看见他没有？他是我们家乡旧时的熟人。我总盼望他来谈谈话。……冷静得教人烦闷。家里母亲大姊不知道怎样？他（指他的新婚而言）又懒，我又不会写信，你替我写封信给你姑母和天津的二姊罢。……你几时动身到俄国去，俄国离中国有多远，在什么地方呢？……”我答道：“我大概一两礼拜后就走。你有空到纯哥那里看看，明后天我在家。……信，容易得很，我写就是了。我在天津，看见二姊，丰儿要想到北京来看你呢。呀！时光过得真快，丰儿都这样大了。我们一别，不是四五年了么？现在又得分手，人生还不是驿站似的。……”半晌大家不言语。我无意的说道：“妹婿要能在什么衙门或是银行找个事情才好，三妹，你看怎么样？”他道：“自然呢！不过我也不知道要怎样托托人情才行。我真为难，我还不过是一个小孩子，现在样样事要担些斤量，怎么样好？”我答道：“不要紧，事情慢慢的找就是了，一切不知道的，你可以去问问纯哥纯嫂。”——做新妇的时代，是中国妇女一生一世的紧要关

头。——“你的小叔子，小姑娘还算是好的。”他道：“也就这样罢了。想起我们那时在环溪，乡下地方，成天的一块儿玩，什么亦不管……”我这天去看他，本想早些回家，不知不觉谈到黄昏时候。北京城南本来荒僻，我从他那里回家到东城，路却不少。出了他们大门，正是秋夜时分，龙泉寺边的深林丛树时时送出秋声，一阵一阵萧萧的大有雨意，也似催人离别。满天黑云如墨，只听得地上半枯的秋草，飕飕作响。那条街上，人差不多已经静了，只有一星两星洋车上的车灯，远远近近的晃着。远看正阳门畔三四层的高洋房，电光雪亮的耀着……

过去的留恋，心理现象情绪中的自然状态，影响于人的个性却也不少。况且旧社会一幅一幅的画呈显于吾人之前，又是我们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的对象。个性的突变没有不受社会环境的反映的。可是呢，“过去的留恋”呵，你究竟和我的将来有什么印象，可以在心灵里占一不上不下的位置呢？我现在是万缘俱寂，一心另有归向了。一挥手，决然就走！

四

二十世纪的开始，是我诞生的时候，正是中国史上的新纪元。中国香甜安逸的春梦渐渐惊醒过来，一看已是日上三竿，还懒懒的朦胧双眼欠伸着不肯起来呢。从我七八岁时，中国社会已经大大的震动动摇之后，那疾然翻复变更的倾向，已是猛不可当，非常之明显了。幼年的社会生活受这影响不小，我已不是完全中国文化的产物；更加以经济生活的揉挪，万千变化都在此中融化，我不过此中一份而已。

二十年来思想激变，一九一一年的革命证明中国旧社会的破产。可惜，因中国五十年的殖民地化使中国资产阶级抑压他的内力，游民的无产阶级大显其功能，成就了那革命后中国社会畸形的变态。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革命，只赚着一與台奴婢匪徒

寇盗的独裁制。“自由”“平等”“民权”的口头禅，在大多数社会思想里，即使不生复古的反动思潮，也就为人所厌闻，——一激而成厌世的人生观：或是有托而逃，寻较远于政治科学的安顿心灵所在，或是竟顺流忘反，成绮语淫话的烂小说生涯。所以当受欧化的中学教育时候，正值江南文学思想破产的机会。所谓“欧化”——死的科学教育——敌不过现实的政治恶象的激刺，流动的文学思潮的堕落。我江苏第五中学的同学，扬州任氏兄弟及宜兴吴炳文都和我处同样的环境，大家不期然而然同时“名士化”，始而研究诗古文词，继而讨论经籍；大家还以“性灵”相尚，友谊的结合无形之中得一种旁面的训育。然而当时是和社会隔离的。后来我因母亲去世，家庭消灭，跳出去社会里营生，更发见了无量无数的“？”。和我的好友都分散了。来一穷乡僻壤，无锡乡村里，当国民学校校长，精神上判了无期徒刑。所以当时虽然正是袁世凯做皇帝梦的时候，政治思想绝对不动我的心怀。思想复古，人生观只在于“避世”。

唯心的厌世梦是做不长的。经济生活的要求使我寻扬子江而西。旧游的瓜洲，恶化的秦淮，长河的落日，皖赣的江树，和着茫无涯涘的波光，沉着浑噩的波声，渗洗我的心性，舒畅我的郁积，到武昌寻着了纯哥，饥渴似的智识欲又有一线可以充足的希望。——饭碗问题间接的解决法。同时却又到黄陂会见表兄周均量，诗词的研究更深层一层；他能辅助我的，不但在此，政治问题也渐渐由他而入我们的谈资。然而他一方面引起我旧时研究佛学的兴趣，又把那社会问题的政治解决那一点萌芽折了。这三四个月的旅行，经济生活的要求虽丝毫没有满足，而心灵上却渐渐得——安顿的“境界”。从此别了均量又到北京，抱着入大学研究的目的。当时家庭已经破碎，别无牵挂，——直到如今；——然而东奔西走，象盲蝇乱投要求生活的出路，而不知道自己是破产的“士的阶级”社会中之一社会现象呵！

从入北京到五四运动之前，共三年，是我最枯寂的生涯。友朋的交际可以说绝对的断绝。北京城里新官僚“民国”的生活使

我受一重大的痛苦激励。厌世观的哲学思想随着我这三年研究哲学的程度而增高。然而这“厌世观”已经和我以前的“避世观”不相同。渐渐的心灵现象起了变化。因研究国故感受兴趣，而有就今文学再生而为整理国故的志向；因研究佛学试解人生问题，而有就菩萨行而为佛教人间化的愿心。这虽是大言不惭的空愿，然而却足以说明我当时孤独生活中的“二元的人生观”。一部分的生活经营我“世间的”责任，为自立生计的预备；一部分的生活努力于“出世间”的功德，做以文化救中国的功夫。我的进俄文专修馆，而同时为哲学研究不辍，一天工作十一小时以上的刻苦生涯，就是这种人生观的表现。当时一切社会生活都在我心灵之外。学俄文是为吃饭的，然而当时吃的饭是我堂阿哥的，不是我的。这寄生效涯，已经时时重新触动我社会问题的疑问——“人与人之关系的疑问”。

菩萨行的人生观，无常的社会观渐渐指导我一光明的路。五四运动陡然爆发，我于是卷入旋涡。孤寂的生活打破了。最初北京社会服务会的同志：我叔叔瞿菊农，温州郑振铎，上海耿济之，湖州张昭德（后两位是我俄文馆的同学），都和我一样，抱着不可思议的“热烈”参与学生运动。我们处于社会生活之中，还只知道社会中中了无名毒症，不知道怎么样医治，——学生运动的意义是如此，——单由自己的体验，那不安的感觉再也藏不住了。有“变”的要求，就突然爆发，暂且先与社会以一震惊的激励，——克鲁扑德金说：一次暴动胜于数千百万册书报。同时经八九年中国社会现象的反动，《新青年》《新潮》所表现的思潮变动，趁着学生运动中社会心理的倾向，起翻天的巨浪，摇荡全中国。当时爱国运动的意义，绝不能望文生义的去解释他。中国民族几十年受剥削，到今日才感受殖民地化的况味。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学生运动的引子，山东问题，本来就包括在这里。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就是这个原因。况且家族农业经济破产，旧社会

组织失了他的根据地，于是社会问题更复杂了。从孔教问题，妇女问题一直到劳动问题，社会改造问题；从文字上的文学问题一直到人生观的哲学问题；都在这一时期兴起，萦绕着新时代的中国社会思想。

我和菊农，振铎，济之等同志组织《新社会》旬刊。于是我的思想第一次与社会生活接触。而且学生运动中所受的一番社会的教训，使我更明白“社会”的意义。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正如久壅的水闸，一旦开放，旁流杂出，虽是喷沫鸣溅，究不曾自定出流的方向。其时一般的社会思想大半都是如此。我以研究哲学的积习，根本疑及当时社会思想的“思想方法”。所以我曾说：“现在大家，你说我主张过激，我说你太不彻底，都是枉然的……究竟每一件东西，既是我们的研究对象，就得认个清楚；主观客观的混淆，使你一百年也不能解决一个小小的问题。……”虽然如此，我们中当时固然没有真正的“社会党”，然而中国政府，旧派的垂死的死神，见着“外国的货色”——“社会”两个字，就吓得头晕眼花，一概认为“过激派”，“布尔塞维克”，“洪水猛兽”——于是我们的《新社会》就被警察厅封闭了。这也是一种奇异现象，社会思想的变态：一方面走得极前，一方面落得极后。

此后北京青年思想，渐渐的转移，趋重于哲学方面，人生观方面。也象俄国新思想运动中的烦闷时代似的，“烦闷究竟是什么？不知道。”于是我们组织一月刊《人道》（Humanité）《人道》和《新社会》的倾向已经不大相同。——要求社会问题唯心的解决。振铎的倾向最明瞭，我的辩论也就不足为重；唯物史观的意义反正当时大家都不懂得。《人道》的产生不久，我就离中国，入饿乡，秉着刻苦的人生观，求满足我“内的要求”去了。

八

哈尔滨这个地方，中国本部人初到的时候，总不免有种种奇异的感想。俄国旧日的经营西伯利亚一直到北满一带，生生开辟出来的荒地，历年以来，虽渐渐的一方面资本主义化，一方面孕育劳动运动，始终经济生活还是保存落后民族的特性。如此“非现代的”经济生活里，如西伯利亚，如哈尔滨，怎样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社会？——这是一个疑问。再则，我就经济现象想来，最容易显现出生产关系的，除非是“交易单位”（各地的货币制度交易汇兑方法）。而现代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往往使殖民地的经济生活，另成一种特异性。经济生活的研究，我们就最粗浅的现象观察，观察当地的“财政资本”流通的状态（即银行经济在市面上的影响），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感受资本主义的痛楚。——何况在殖民地的特异经济中呢，自然尤其显得出帝国主义的功能。我就旅哈身受的经验想起：从天津到奉天，北京天津的中交票不能用了，要换日本朝鲜银行钞票，从长春到哈尔滨，中东路未收归中国管理之前，还不得不换俄国卢布买车票，现在虽可用中国银元，然而天津钞票已不大行，非得哈尔滨钞票或日本钞票不可。同样差不多在一范围内的经济生活，何以必须经三重“国家”的麻烦呢？人类经济生活，生产消费各得其当，便完了；象这样“殖民地的”剥削政策下之经济，依社会主义的原则，应当怎么样整顿呢？——这是第二个疑问。这两个疑问，虽然不是我现在所能解决，然而却引起我心灵中的变化；我预想社会改造既在俄国实现，事实上他们——俄共产党——必定有确切实际生活的方法。——抽象的“真”“美”“善”的社会理想，决不能象飞将军似的从天而降。——因此我个人的哲学概念，推广这种实例；由主观立论，一切真理——从物质的经济生活到心灵的精神生活——都密切依傍于“实际”，由客观立论，更确定我的“世间的唯物主义”。劳工神圣，理想的天国，不在

于智识阶级的笔下，而在于劳工阶级实际生活上的精进。心灵的安慰，物质与精神的调和，——宇宙动率的相映相激——全赖于人类的“实际内力”。“实际内力”能应付经济生活的“要求”及“必需”，方真是个人，民族，人类进化的动机。

我“回向”实际生活。我且就在哈尔滨的感想，所处的环境随笔记一记。那经济学问题，哲学问题，暂且搁下，留在此做我心理变迁史中的一鳞一爪的痕迹。

黯黯的天色，满地积雪，映着黄昏时候的淡云，一层一层春蚕剥茧似的退去，慢慢透出明亮严肃的寒光来；嘁嘁喳喳私语的短树，林里穿过尖利残酷的寒风；一片空旷的冬原，衰草都淹没在白雪里，处处偶然露出些头角，随着风摇动，刷着雪丝作响；上下相照，淡云和积雪，象是密密诉说衷肠，怨叹生活的枯寂，哈尔滨秦家岗南头，俄国人住家多数在那里，热闹的市面已经过去了。我走去看一俄国朋友并访他的妹子马露西霞（Raigorodsky Maruca），才走到这段地面。向来厌恶哈尔滨小城市生活的繁猥，到此也稍有安慰了。“呀！你们来了。”他们赶紧招呼预备茶点，大家坐下，就谈起来。他们知道我要到俄国去，随便替我说些俄国文化上的趣事，怎样不和西欧相同，怎样宗教的势力很大等等。——马露西霞是一托尔斯泰派。——谈到苏维埃政府，他们也不知道详细情形，莫斯科生活如何，他们也很想去看一看，可是苏维埃俄国穷困不堪，大家是知道的，所以要回籍须得政府的许可，因此他们却不比外国人，能容易入境。我因他谈及俄国文化，就随便问问他，住在中国许多年，对于中国文化有怎样的感想。他们都说：“我们没到过中国。你们以为哈尔滨是中国么？俄国侨民的生活却完全是俄国式的。——和中国文化接触的机会很少。就是在俄国商务中学念过点中国史。东方古国的文化非常之有趣。也很想到北京上海等处去走一走。……”我和俄国人的交际虽因俄语程度太坏，不十分广，却也认识十几个人——有是党人，有非党人的。我们请他们吃过一次中国饭，他们羡慕得不

了；——原来住在中国地方，一直没真确知道中国生活，中国文化。他们心目中的中国人只有一般苦力，小商人呵。当天晚上七八点钟回寓，走出他们家门，街上已经很冷落。天气很冷，走了好一段路，才看见一辆马车。我叫了他一声，只听得回答道：“Kudai?” 我才知道是一个俄国车夫，随即和他说了地方，坐上车去，相离不到一里半地，却要五角大洋，读者如其是中国内地人，不要以为是上海汉口的马车，这是破旧不堪的俄国式马车，却要得如此之贵，——中国车夫要得便宜些。我因随口问问这一车夫家计怎样，据他说哈尔滨样样东西都贵，所以车费不得不昂，一天却也可以赚得五六元钱，——俄国车夫大半只知道要日本金票，不要中国洋钱，我这里是他折算的。他也没甚功夫去到俄国工会所设的俱乐部，音乐会。一路谈着，忘其所以，抬头一看，却走到秦家岗南头去了。——和我们的寓所背道而驰。其时云影翻开，露出冷冰冰亮晶晶的一轮明月，四围还拥着寒雾，好象美人出浴披着轻纱软帔似的；马路旁寒林矗立，一排一排的武装着银铠银甲，万树枝头都放出寒浸浸的珠光剑气；——贪看着寒月雪影，竟忘告诉车夫，走错了路。愈走愈远，——错误偶然与人以奇遇：领略一回天然的美，可是寒意浸浸，鼻息都将冻绝，虽则沉寂的寒夜，静悄悄已没一点半点风意，宇宙的静美包涵在此“琉璃天盒”里，满满的盛住没起丝毫震荡，然而大气快成冰水，“干冷”的况味，也不容易受。我才唤醒车夫，叫他拨转马车，赶回寓所。他却还咕噜着说：“……中国人……中国人今天怎么忽然不知道哈尔滨街道的俄国名字？……叫我跑这许多冤枉路。”我心上想，你在中国地面赶马车，却不知道中国街道的中国名字，等到到了福顺栈，才说：“唔，原来是这个地方，为何不早说清楚！”那又怎么说呢？

哈尔滨道里及秦家岗两部分，完全是俄国化的，街道都有俄国名字，中国人只叫第几道街，第几道街而已。俄国人住在这里，象自己家里一样。可惜年来俄国商务，道里市面，不大繁盛了。却是，俄国资产阶级一方面和日本人勾结，日本人商界实业

界努力博取哈尔滨的经济势力；劳动阶级一方面，组织运动却有一步一步兴旺起来的趋势，和赤塔新党暗中互通消息。那一天我从前进报馆出来到七道街江苏小饭馆吃了饭，沿着俄国人所谓中国大街（Kitaiskaya ulitsa）回家，已是傍晚时分。走过一家俄国报馆，看见许多中国卖报的，领着报，争先恐后的跑到中国大街去抢生意做，——抢着跑着，口里乱喘，脚下跌滑，也顾不得，逢着路人，喘吁吁叫着：“买《Novo-ctijizni》，呵！买《Vperiod》呵！买《Zarya》《Russky Golos》呵！”——为的是生活竞争。沿大街两旁，俄国人，有相偎相倚坐在路旁椅子上的；有手搀手一面低低私语指手划脚，一面走着的；有在铺子里买着东西，携着一大包裹出来的；雪亮的街灯，电灯光底下，男男女女一对一对穿花蛱蝶似的来来往往，衣香鬓影，紫狐披肩，蓝绸领结，映着大商铺窗帘里放出的电光，还想努力显一显西欧化的“俄国资产阶级”文明。还有一阵一阵俄国青年学生和女郎散步的踪迹；我走着，看见大街对面，乱乱落落俄国人影的背后，雪亮的电光，从窗子里映出来，照着很清楚两个金字在玻璃上：“朝日”，却是俄文，细看窗子里面，有日本女郎的影子，窗口露着一端一端的日本绸布呢。中国大街尽头，一转弯就是一日本的哈尔滨日本商品陈列所，我们走过时却不见门口有电灯，已经关门了，然而我记得陈列所里商品很丰富，除农业品平常不足论外，工业品却应有尽有，形式上看来和“西洋”货无毫厘差别。过了这陈列所，离我们寓所不远，却走过我们天天吃饭的小饭馆，饭馆主人是山东人，看见我们就问：“为什么今天不进去坐坐呢？”我们和他说已经吃过了。正谈着的时候，忽然听着背后有人哼着：“Milocti……Milocti”（请赏……）回头一看，却是一俄国乞丐。饭馆主人给他两个冷馒头，我也给他一角钱钞票（在哈尔滨难得用着铜元，身上竟不大找得着）。他画着十字尽说：“谢谢，谢谢，上帝佑你……上帝呵！中国人比俄国人还好多着呢……”咕噜着去了。饭馆主人说道：“给不得他们，天天来歪缠，昨天还有两个毛子，不知什么地方偷来一丈多黑绸，要卖给我们；少他的呢！……毛

子真不好打发。先生们，呵，知道不知道，在这儿俄罗斯毛子穷人多得很。先生们想，要是俄国穷党（北方人俗称‘布尔塞维克’的名字）一来，这般人都得抖起来罢？……”我笑一笑，也没回答他，就顺路走回寓所了。

蔚蓝的天色，白云似堆锦一般拥着，冷悄悄江风，映着清澄的寒浪。松花江畔的景色，着实叫人留恋。那天我同着俄文专修馆的同学特地去游一游，趁着小船从道里到道外。在江中远看着中东铁路的铁桥，后面还崇起几处四五层的洋房，远远衬着疏林枯树带些积雪，映着晴日，亮晶晶光灿灿露出些“满洲”的珠光剑气。在船上谈起俄文馆同学，原来在哈尔滨我们同学很多，审判厅，俄白党报馆，中东铁路，戊通公司在在都有。——不但哈尔滨，从奉天至满洲里以及中东路小站都有我们同学。他们的教育程度是“如此”，他们的生活也比上海洋行买办式的英文学生甚至于北京天津研究英法文的“大学生”寒俭得多。然而大家是知道的，满洲三省文化程度几等于零，他们还要算此地的明星呢。我这次到松花江畔，本是顺便找我的俄文馆同学，——一个船长，可惜他没有在那里。所以趁此乘小船逛一逛，到道外上岸——沿着中国地界的茅屋土舍间污秽不洁的小路转回寓所。俄国的哈尔滨，俄国的殖民地，——可怜的很，——已经大不如天津上海，马路上到处堆着尿粪。——在中国人眼光里还只见他辉煌庄丽的大商铺。再一到中国“北方”人生活里，更加污糟不堪。道外这种远僻街巷，沿松花江边，几间土屋，围着洋铁皮木板乱七八糟钉成的短墙，养着几只泥猪；这就是中国人的写生。文化不是天赋的，中国民族应当如何努力；并欧洲人所笑的野蛮的俄罗斯人都不如。经济生活，生产方法不变，一方面既不能有文化的要求，以进于概括而论的文明；另一方面更不能有阶级的觉悟，担负再造文物的重责。东方古文化国的文化何时才能重兴？所谓“改造”，根本的意义，通筹统计原在于“为全人类文化而奋斗”。如此黑暗的民族，不是须经更深切的资本主义化，就得行“新式的”无产阶级化。在满洲三省尤其重要。且不谈那总解

决的大问题，就是目下急切的零星解决，满洲的文化运动，也就紧急必需“往民间去”的先锋队。可惜在此地的智识阶级只有一般中了“北方式”官僚教育毒的俄文馆派。只好任那松花江里帝国主义的血浪，殖民政策的汗波，激扬震荡，挟着红胡子似的腥秽的风暴，丘八爷似的严酷的冰雪，飞吼怒号罢了。

哈尔滨旅馆生活一瞬已有一月多了，天气一天一天冷起来，街上的积雪，树梢的寒意，和着冷酷陈死的中国社会空气，令人烦闷。北地严寒，渐渐的显他的威武。可是我心苗里却含着蓬蓬勃勃的春意：冒险好奇的旅行允许我满足不可遏抑的智识欲，可爱的将来暗示我无穷的希望。宇宙的意志永久引导人突进，动的世界无时不赖这一点“求安”的生机。你如其以“不得知而不安”就自然倾向于“知”。天气的温度降低，他的密度失了均势以压力不平而不安，汽质就自然倾向于凝结。社会组织失了根据地，自然就动摇，借着怪物的“社会声浪”，鸣他心意的不平。自“不知”动而至“知”。自气动而至冰。自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动而至社会主义，至“新式的”现代的无产阶级化。全宇宙不过只这一“求安而动”的过程。安与不安的感觉，又只在前“五识”及第七识上显现，以为行为最后的动机。第六识（意识）的动机是粗象而且虚伪谬误的。而社会的意识（社会的第六识）尤其常常陷于伪造幻象错觉。动的过程只在直觉直感于“实际”时显其我执（第七末那识）的功能。我旅俄的意义，实是我直感的反射动作。第六识的分别，计较成败所影响于行为的极少。

凄凄的寒月，冷冷的寒风，映着晶晶的寒雪，澈影我的心神，——照见我就是“斯笃矣”主义（Stoicisune）也只是求精神生活安宁，甚至于还是求物质生活安俭的倾向而已。我自念我的内力，实际所有的才能，在当时实无一利于社会，同时于我个人的生活意趣，有极不安宁的状态。所以因求安宁而愿蹈危险。“至于冒险而去，成败究竟如何？”并不是不应当问，而是不必问，或简直是不问。意识万能，本是迷信；何必起计较分别。至

于极粗的心理现象“意志”，更不足论。所以我冒险而旅俄，并非是什么“意志坚强”，也不是计较利害有所为——为社会——而行；仅只是本于为我的好奇心而起适应生活，适应实际精神生活的冲动。生活不安的程度愈高，反应冲动的力量亦愈大。既无益于抽象的中国社会文化，又无味于具体的枯燥生活。当然，除出那一部分薄弱的意识作用：有无利益于社会，而心理上突然呈一种猛进的状态。“宁死亦当一行”。——如其还有“社会”“文化”观念，求为人而劳动，那只是第七识的我执所驱策。每天工作完，同着颂华散步，荒地上凄凄的月色，雪影稀微放他“自然”的动机，往往就谈及这些兴味浓郁的问题。哈尔滨寓所狭隘不堪，我却常常说到莫斯科，有这样一间屋，三个人住住也就可以了。那时听说莫斯科食粮缺乏，燃料不足，又常常说笑话：“颂华，我们去了，不但冻饿，还有别种危险，兴兴然而去看‘新奇’，也许不幸奄然而就死。……”颂华道：“你为什么说这种不祥的话，扫兴得很！……”

十二

阴沉的天色，几万里西伯利亚的广原，蒙着沉寂冷酷的雪影，寒意浸浸，天柱地轴都将冻绝。“冷酷”“严肃”的天然隐隐限制生活之迫促，虽令人失冥想想象的乌托邦乐及优游余暇的清福，却能消灭“抽象名词爱”的妄想的所谓智识劳动的奢侈毒。宇宙的本质结晶于假设的现实世界，——生活的意义只有两端：在此现实世界内的世间生活，与超此现实世界上的出世间生活。如其无能力超脱一切，就只能限制于“现实”之内，第六识（意识）的理解所不能及之境界，却为最浅薄最普通的“现实感觉”所了然不误的。显现生活的情感（空气 atmosphere），虽不与人以切实的了解，却也不生意识上的错觉。传达思想的文辞（理论），表示情况的名物（事实），却都只能与人以笼统抽象的概念，不见现实生活是绝对不能明白了解的，而且常常淆乱人的思断。人

类表示思想，传达事物的言语文字本来只能在某一限度内抽出一相对合于“现实”的概念，因此思想的本身也受这“情性化”的影响，只凭主观概念中的理解去思索论断现实生活。——于是往往使现实生活堕于抽象的恶化。“当使现实了然显现，以立真理之世间的一方面，必须令理论的文辞，事实的名物服从于现实生活：而现实生活，因得自此映现的情感之助，而能驾驭得住文辞中的理论及事实之抽象性。”身离赤塔，不日入“赤国”，我实行责任之期已近，自然当立此原则。从此于理论之研究，事实之探访外，当切实领略社会心理反映的空气，感受社会组织显现的现实生活，应我心理之内的要求，更将于后二者多求出世间的营养。我的责任是在于：研究共产主义——此社会组织在人类文化上的价值，研究俄罗斯文化——人类文化之一部分，自旧文化进于新文化的出发点。寒风猎猎，万里积雪，臭肉干糠，猪狗饲料，饥寒苦痛是我努力的代价。现在已到门庭，请举步入室登堂罢。

寒气浸浸的车舱里，拥着厚被，躺在车椅上，闭眼静听，澎湃的轮机声，怒号的风雪声，好一似千军万马奔腾猛进，显现宇宙活力的壮勇，心灵中起无限的想象，无限的震荡；一东方古文化国的稚儿，进西欧新旧文化，希腊希伯来文化，剧斗刚到短兵相接军机迫切的战场里去了：炸爆洪声，震天动地，枪林弹雨，硫烟迷闷的新环境，立刻便震惊了“东方稚儿”安恬静寂的“伪梦”。——新文化的参谋处，一面要定攻击西欧旧文化之战略，一面要行扑灭东欧半封建文化遗毒的抗拒战斗力之计划。正是军书旁午千钧一发的时机，何况战略的玄妙在于敌人反抗力之利用，新建筑的构成在于安顿基础之苦功，请看他所负责任的重大——全人类新文化的建设！他所为工作的艰苦——数十重“文化落后障碍物”的排除！无怪搏战所用的力量如此之重，战争过程活现得如此之剧烈。“东方稚儿”！你只待春梦初醒，冷眼相觑，那战线渐渐展开，炮弹远度之所及，不由得你不卷入旋涡呵！

四日离赤塔，当晚到上乌金斯克。睡梦之中，听见上乌金斯

克华侨商会会员上车来见总领事，诉说那地方红胡子哄着俄国多数党反对商会，派兵搜查，诬蔑商会长，剥去上下衣勒索，要求总领事办理。他们絮絮叨叨咕噜着，那实实在在中国北方人的笨声音诉说个不了。——这件事后来不知道怎样结果。五日深夜到色楞河边，远东及苏维埃俄交界的地方。到此一带真是黑暗阴幽的所在。现在在政治地理上是民主的远东国与苏维埃的俄国交界之地；文化上是东西杂色的俄国积极殖民地文化，与北方中原的中国消极殖民地文化融会之处。经连年战乱，刚刚平定，奄奄一息，正如久病之后，勉强得一点生机，元气亏耗，病根还没有全去，未来的命运恰在当地劳动人民之手呵。“查票了！护照，护照！”寒梦惊醒，黯黯的烛影，寂寂的风声，车已停住，听着窗外轻轻的一阵一阵雪花簌簌的飞转。人声嘈杂，车上的人都检护照。我出来把护照验过，深夜寒甚，又复睡下。听着隔舱人声，似乎查票的没有走。朦胧睡梦中，只偶然听到断断续续的谈话：“这是什么？有 Cognac（白兰地）！”——听着一人答道：“有便怎么样！这是外交人员的特权……你想……我不……”这确象是中国人说俄国话的声音。接着极粗笨的俄国人声音，声浪很重，可是语音模糊：“……你们中国……没有；我怎么没见上面来电……本来不能放……”——“怎么样？”寂然半晌，语声不可辨。忽听又一个俄人的声音：“我们打电到伊尔库次克……走罢！……那边自有办法。……”天色渐渐明亮，车又开了。

六日清早醒来，已到美索瓦站（Mezovaya）。极望一片雪色。浩无边际，道旁疏疏落落几株槎杈的古树带着雪影，绝好一幅王石谷的《江干七树图》。车进站后停下，就有三个中国人上来求见总领事，说他们许多苦状。美索瓦是苏维埃俄东方边境第一站，到此当换车头，原有车头要退回远东，所以车停足有四五点钟。因此那三个中国人要求总领事接见当地全体侨工。总领事极力安慰，说“不好太费事”。我们顺便和那三人谈谈。美索瓦有中国侨工二百多人，大概都是做苦工的。他们说着，颜色凄然：“……不能回去，有什么法想呢！……一个月我们现在得了三十

斤黑面包，只够半个月吃。大家都得做活，不做活的呢，更坏！‘登’上大狱。要到别处去也很难……”

车停在站南头等着开发。我们在车里吃饭，旁边走过去好几辆运兵的车，一个一个，穿着褴褛不堪的兵衣，顶着油腻污秽的皮帽，都伸长着颈项看中国专车里的白米饭，牛肉，白菜呢。过了一会，一辆车停住在我们车窗前面，就有几个兵向我们车窗里做手势要香烟吃，我们给了他们几支，千谢万谢着去了。

我们的车原是因为误了趟，远东交通总长沙都夫特派一单车头送过来的。车手得到了美索瓦站站长另派车头引车西去的消息，他就上车来道别，回赤塔去，要几支烟。他说：“可怕可怕……生活真难呵！我一个月薪水七百元苏维埃卢布，买一盒洋火倒要二百元。……”

“赤色”的火车头来带着我们的车进苏维埃的新俄了。七日一清早，朦胧睡梦初醒，猛看见窗外一色苍白，天地冻绝，已到贝加尔湖边。蜿蜒转折的长车沿着湖边经四十多个山洞，拂掠雪枝，映漾冰影，如飞似掠的震颤西伯利亚原人生活中之静止宇宙，显一显“文明”的威权。远望对岸依稀凄迷，不辨是山是云，只见寒浸浸的云气一片凄清颜色，低徊起伏，又似屹然不动，冷然无尽。近湖边的冰浪，好似巉岩奇石突兀相向，——不知几时的怒风，引着“自由”的波涛勃然兴起，倏然一阵严肃冷酷的寒意，使他就此冻住，兴风作浪的恶技已穷，——却还保持他残狠刚愎倔强的丑态。离湖边稍远，剩着一片一片水晶的地毡，澈映天地，这已是平铺推展的浪纹，随着自然的波动，正要遂他的“远志”，求最后的安顿，不意不仁的天然束缚他的开展，强结成这静止的美意，偶然为他人放灿烂突现的光彩。凄清的寒水，映漾着墨云细雪，时时起无聊畏缩的波动，还混着僵硬琐碎的冰花，他阵阵的绉痕，现于冷酷凄凉的面面，对着四围僵死冻绝的乡亲，努力表示那伟大广博的“大”湖所仅存的一点生意：“呵！不仁的‘寒’神震怒，荡漾狂澜几乎全成僵绝的死鬼，所剩我这‘中心’一毫活泼的动机，在此静候春风；和煦的暖意，

不知甚时才肯惠临？……”

十三

七日下午三时车到伊尔库次克，站长命令教把中国专车摘下来，停在车站尽头。随即上来了几个人，口称得到边境来电，中国专车带有秘密文件，须得扣留检验，扰扰半天，查不出什么东西来，刘守清又骂了他们一顿，才算掩旗息鼓的下去了。那副领事刘守清气狠狠坐下说道：“他们现在那里来这许多犹太人，真歪缠得很！这还不是那天要白兰地没要着的小子弄的鬼么？今天一闹又闹晚了。明天非得去找当地的外交当局不可。……”我听了才想起那天晚上听见的谈话，原来有这样一段故事在内呢。车离车站足有四分之一里远，我只听得他们来来往往的上车站打电话。到晚上十二点钟才听说，电话打通了，那边认错，答应好好接待，一有通车，就可以挂车前进，只待明天当面再谈一谈罢了。……大家的疑虑才烟消云散。

冷清清漫天的雪色，镇着死神似的沉寂，清早的严寒，掩盖了熹微的晨光，云影滞凝，死也不愿开展，反令人觉着死沉沉的暮气。只有那疏疏密密的枯枝，时时战颤，忍着百般痛心切骨的苦恼，静待遥远未来的春意呢；偶然残酷的北风拂拭簌簌的雪响，好一似力尽声嘶，耐不住疼痛，突然漏出一些畏怯的呻吟。车站外长河已经冰冻着一半，架着木板的码头，满盖着冰雪。从此桥渡河进伊尔库次克城，——走尽桥端，上“苏维埃渡船”，一只小小的火轮，也已征收公用，不费渡钱，可是不但桥上冰滑，再三再四几乎滑下冰里，就是船上也是污泥痰秽，烟气迷闷。站出船头，宁任寒战风侵，也比闷闷的站在舱里好些。回看阴阴凄凉的天色，近车站高岗上的树影，还远远的含笑点头致意呢。我同刘守清渡河，经此二十分钟就到“彼岸”。刘君想找西伯利亚外交委员，我也得去验一验我们来俄的种种文件，——得知道知道他们招待的态度。上岸之后，只见荒凉的街市，一片雪

影，足迹都非常之少，可怜的店铺掩着双扉，从外面看去，好象都是没人住的。沿着道旁慢慢的走，偶然遇着行人，问一问街道，大概都不能清楚回答，走得精疲力尽，想找一辆马车，也找不着。转过三四个弯，远远一条长街只看见三四个人，蹀躞着，缩头缩颈歪斜着走；却有一辆冰橇停在路旁，我们赶紧去问一问，要的价钱贵得可怕，不能坐，又往前走。好容易问着一人同到外交委员家里。我们一进院子，看见一女郎穿得很整齐华丽（那一天是希腊教耶稣降生节），自己捧着木柴拿斧子在那里劈呢，院子东角上两间小屋前站着两个人，远远的看不清楚。忽然听着中国话的声音，抬头一看，那两人已经走近，原来是中国人。我们正在谈话，听得那女郎高声叫道：“华西里（中国人的俄国名字），唉！帮一帮我，Radi Boga！（意为‘看上帝面上’——俄国俗语）”那一中国人就去帮他劈柴；还剩一个，拼命的拖我们到他屋子里去，他媳妇也是俄国人，出来见我们，彼此问长问短。他们同外交委员住一院子里；外交委员住“上房”，他们住“下房”。那天外交委员不在家，只得留话便走出来，同着那中国人，找到留伊的副领事薛君处。

现在已经进了饿乡了。饿乡的滋味却还没尝着。可是，在伊尔库次克，赤军刚刚占领不到半年，兵燹之后，余烬还没全熄，一切建设都还在草草初创，或者一毫都没动手呢。那地经济状况，在那时为全国最窘急的地方。我们在薛君处第一次吃着“苏维埃的黑面包”，其苦其酸，泥草臭味，中国没有一人尝过的，也没有一人能想象的。可是那天席间还有些鸡鱼。据他们说，布尔塞维克来了之后，商业一概禁止，这是乡下有熟人偷买上来的。我们因问起工人职员（官吏）的生活，据说口粮分好几等：从每月十五斤（俄一斤抵中国一斤之四分之三）到每月四十五斤黑面包。薪水最多的不过八千卢布，依那时卢布的行市只抵到中国的八角钱。吃完了饭之后，觉着身体轻松了好些，冷风里跑了三四个钟头，得在软椅上躺着，又饱又暖，听着桌上“自暖壶”细细的私语，随意谈话，听来都感新奇的奇闻，这也是饥寒之国

的一瞬间的乐趣。薛君所住的房屋，还有一工程师及一中国医生；电灯房费都很便宜，房子是后来简直完全免费了。他们介绍我见那工程师，走进屋子，只见烟沉沉的依稀映着一老瘦的人面。旁边还坐着他几个亲戚——女人，工程师恭恭敬敬的请我们坐，我心上想：今天第一天进赤色的苏维埃俄国的城市——饿乡，怎能不知他们主张“饿”的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人生观，因问工程师是不是共产党。工程师放下烟斗，破壳的喉咙里发出嘲笑的声音，而又带着愁惨的声调，说道：“我？共产党！噢！……”旁边有人插嘴，指着一女郎道：“他是共产党。”我就回身问他共产党的党纲；并看他脸上涂脂抹粉的，很可笑的形容。那女郎楞着，只是笑，勉强说着一两个字，又顿着不说，似乎害羞不好意思。……工程师抢着说：“党纲好极了！好极了！可惜梦想，幻想；枪，监狱，监狱……”老工程师在铁道局办事，屡次怠工，唾骂布尔塞维克，下狱三四次，依旧如此，劳农政府没有技师，也只能听他。他又说：“乡下人的鸡鱼鸭肉一概都行集权制，怎么办得了，又不准做生意。办事的人才有饭吃，不办事的，——也许他不高兴，——可不行了。好罢，看着罢！究竟怎样？……”可惜他所说都是零星片断，不能给我一明晰的观念。那天谈着，不觉得已经是晚上八九点钟了，辞了主人就回车上。

九日上午八时，一切都已接洽妥帖，开车。在伊不过两日，只得一闪烁的印象，一切还留在我幻想中。社会的实际生活，卖书买面，极普通极平常，不如理论的深奥万倍，粗看虽只见“黑面包”一极具体的事实，而意味深长，要了解他须费无限的心灵之努力。——反不如社会主义深奥理论的书籍容易呵。冻澈的轮机声随着我的幻想颤动，从此又西去了，渐渐的人欧俄了。

十一日过乌客（Uk），砦木沙尔（Zamzor），十二日晚过克腊斯诺雅尔斯克（Krasnoyarsk），十四晚过新尼各拉叶斯克（Novo Nikolaevsk）——正是俄历新年，在车里亦没能看一看俄国旧俗，十五日过发腊宾斯克（Farabinsk），十六日到沃木斯克（Omsk）。沿路车行甚慢，只有漫漫的雪色，阵阵的风声。到沃

木斯克又要办交涉，因此再停顿。

车站上行人很多。我们上站走了一走，离站不远一荒场上聚着许多人，似乎是市场，我买一盒俄国烟，价值倒要一千七百五十卢布。市场上的俄国人都穿得褴褛不堪，看见中国人来都围着兜卖。遇见一中国工人，谈起来，说是：一九二〇年春天那地方还可以做小买卖，后来全充公了，强逼做工，一天一斤半黑面包，现在商业禁止，这市场上的小买卖还可以做，可是从前每每因为工人缺乏，全市场都赶进工厂做工，这两天才稍为松些。中国人有二千多，新尼各拉叶斯克有四五百，做工还好，不做工的很苦，也只得偷做些生意。华工会发的护照勉强可以保护工人，可是非钱不行。我听着有无限的感触：极目荒凉，黯黯的夕阳，投着散乱的人影，寒气浸浸，回头一看，已经满身都是霜了。

在伊尔库次克时外交委员答应打电到沃木斯克可以领些食物，到此交涉好久才出官价二千多卢布买了面包牛肉鸡子等。可是当天（十六日）晚上，车停在车站尽头，我们货车上的锁被人扭断，偷去面十铺德，陈广平咆哮大怒，噪了半天，也就无法可想了。

十天以来我的生活一发无味枯燥。西伯利亚快过完了。生活上的感想，只觉得全宇宙盖满了阴沉沉的肃气。我主观的人格抑郁到极处，应当豁然醒悟：请看恬静可爱的“俄国乡下人”百年来奋斗争取自由……到现在不容他口口声声否认，不得不承认外围的社会力。梦想！幻想！离社会求个性，个性在什么地方呢！

社会是整个的具体的，假使了解他，或者还嫌“社会”一字。抽象的名词为多事呢。西伯利亚中世纪的社会，半封建的经济组织，离共产主义有多远！俄国的所谓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力竟渐渐的侵犯蚕食他。我只见实际生活：俄皇政治，欧洲大战，国内战争，在宇宙的大海内涌起巨波，震荡西伯利亚的小舟。社会革命，俄国的社会革命，不是社会思想的狂澜，而是社会心理，——实际生活“心”的一方面，——及经济生活，——实际生活物的一方面，——和合而映成的蜃楼。来俄之前，往往想：

俄罗斯现在是“共产主义的实验室”，仿佛是他们“布尔塞维克的化学家”依着“社会主义理论的公式”，用“俄罗斯民族的原素”，在“苏维埃的玻璃管里”，颠之倒之试验两下，就即刻可以显出“社会主义的化合物”。西伯利亚旅行的教训，才使人知道大谬不然。

“只有实际生活中可以学习，只有实际生活能教训人，只有实际生活能产出社会思想，——社会思想不过是副产物，是极粗的现象。”西伯利亚的人民在严厉的教师之下，自然的学习呵。

主观的我在客观的物之中，何容你呖语连篇的求解放呢。

十四

十天以来，伊尔库次克暮霭沉沉中的晚钟，沃木斯克追赃查贼时的骂叱，沿途褴褛瑟缩的人影，车行风掠雪碾的厉声，中古神教威权的想象，现代国际公法的痴念，远东泰西西伯利亚人文的混合，帝国主义狂暴之下的呻吟，人类文化热病之中的喘息，——一切一切融和会杂复映而成我的心灵之印象。亲亲热热抱着这一印象来到“现代的文明的”欧洲之遥远荒僻，“现代性”（contemporanéité）色彩还很淡很淡的边境，——十八日离沃木斯克，二十日到都明站（Tiumen），欧亚的交界。当晚到嘉德琳堡（Catherinburg），那地矿产非常之丰富，宽洪大量的“天然”，含笑看着：人类因“家事”扰攘，蜗角牛斗，还竟没闲暇去聘请他（“天然”）以奏天下太平的盛乐呢。依稀恍惚的幻想，伴着震荡飞掠的旅梦，淹没在寒衾里，二十一日清早醒来已在乌拉岭（Ural）上郭同站（Kordon）。白雪四山掩抑那丰富的“天然”，不见无产阶级实业家的轮椎，却只见诗人呼啸清新的美意。

长林迥密，随着高低转折的峰峦，蜿蜒漫衍，努力显现伟大雄厚的气概；闪烁晶光的雪影映射着寒厉勇猛的初日，黯云掩抑依徊时，却又不时微微的露出凄黯的神态；松杉的苍翠披着银铠晶甲的圣衣，固然明明轩昂有骄色，表示他克己能耐忍受强暴的

涵量，倏然忽起狂吼的怒风，号召四山的响应，万树枝头都起暴动，簌簌的雪花不由的纷纷堕落，虽则越显得寒厉的“冬之残酷”，然而散见零星的翠色，好一似美人的眉飞目舞，已确然见温情蜜意的“春之和畅”之先声。一干一枝拥着寒雪，只觉得冷凄凄的外围掩抑他的个性，渴望和润的幻想虽充满了他的内力，究不敌漫天盖地宇宙的伟力。等到万树长林，震荡巨波泛滥的风暴，才能群起蜂拥，摇曳飞动。其时虽得不着内力充分的发展，——本是盲然蠢动，何尝立刻得饮春风中的甘露，却也如巨潮澎湃，嚣然不可复当，暗示天意的回转。何况他们占东半球大陆的领袖地位，居高临下，安镇乌拉岭崇峻的峰头，为大地之脊，上接飞舞的长云，下临寒渐的小流，暗示全世纪以宇宙伟大的动力呢。

长蛇蜿蜒的火车在乌拉岭上缓缓的游行。山色清新时时投入车窗，成飞掠转折翠白相间的画影。顺山麓西下的时候经一小站。在山凹密林的中间，当窗突然显现可爱的俄国乡村。琐居复凑的木屋，盖着一片白雪，中间矗立希腊教堂的塔影，铜顶的光彩闪烁不定，和四围万树的雪枝相语，只有午钟初动，传响山壑时，突然打断他们密密相诉的情话。车窗外有一老人，掘着铁轨中的死雪，模糊的须影里露着忠诚朴实的面貌，披着破旧油腻皮氅，把着铁铲，勤勤恳恳的一铲一铲抛那雪块。笑嘻嘻手搀手飞跑来了两个小孩，约摸七八岁。老人似乎和他们说着几句话，一个小孩就拿起雪铲帮着铲雪，那一个两手捧着雪块搬运；大约有十几分钟，铲雪的放下铲子，从破口袋里掏出来一块黑面包，捧雪的忙忙的抛下雪块赶来要着半块面包；两个小孩相对着吃，笑嘻嘻的似乎谈什么事情；忽然捧雪的捡起一块雪掷去，掷在那铲雪的肩上，两个又扭在一块，相打起来；一个翻倒在地，一个往前就逃，翻倒的站起来就追；那时老人举起铲子，只看见他蓬松胡须的嘴唇乱动，似乎说着一大篇话似的，小孩子却头也不回。我正看得出神，忽然“嘟”的一声汽笛，车已动了，那老人和小孩都渐渐不能看见了，只有那老人体力工作时的和蔼沉静怡然自乐

的笑容和小孩子活泼天真的神态，还在我心里留一印象。

二十二日晚下乌拉岭西麓。经小站，有一俄国村妇携着一筐鸡子要换食盐，——我们带的盐却很少——只得出三万苏维埃卢布买了他一百枚。问他为什么不愿意要钱，他说：“这样的布尔塞维克的钱有什么用处，反正什么也买不着，只有外国人带点子‘product’来就换些用用。盐呢，糖呢，布呢，少得很呵。那……那花花绿绿的纸票，干什么！我们自己也是拿东西换东西，‘上面’还不准呢。”从此往西，每站都稍须有些东西买，只算是偷做的生意。伊尔库次克到乌拉岭，沿路火车站上是绝对没有小买卖。到此才见物物交换的原人经济。此后共产党改变经济政策，三年来喘息方定，才着手于经济改造，经济组织因工商业的恢复，或者渐渐的进步到现代的文明，建筑起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础。（这已是一九二一年三四月间的话。）那时呢，还只见一般可怜的“偷做生意者。”呵。二十三日晨，经维阿德嘉（Viatka），二十四日到复洛葛达（Vologda）。愈往西愈近俄国的工业区，已出中世纪而进现代，所以西来渐渐觉着有生意，车站上往来的行人也穿着得比较好些，整齐些，不象东西伯利亚的穷窘形状了。简单的物质文明的进步观念，原来在人类文化上有很大的意义的。“克己复礼”爱人如己的废除私有制，唯心的社会主义，究竟只侥幸他身家好，受祖父几世的教育文化，铸成这样社会主义家的慈善心肠，那知就这点教育文化也是唯物的经济组织中剥削劳动而得来的呢。只有这一带新俄罗斯居民，因经济组织的落后，虽政权入了共产党之手，何尝就能全无私有观念的人呢。不仅如此，这一区（欧俄东部）入苏维埃版图，还在十月革命一年及一年半之后。风起潮涌的自由战激励他们驱逐地主，打破封建遗毒的偶像。等到农民得胜，初赖共产党的指挥操纵，分到了土地，小资产阶级心理发现，屡次为白党利用扰攘多时。实际生活的教训和社会心理的内力如此之显著呵。唯心的“社会主义试验家”，也只好干笑罢了。

复洛葛达离彼得城六百余俄里（一俄里抵中国二里），是北

线（Sieverney ligne）的腰站，从此折往南四百七十俄里就到莫斯科。

车轮雷辗，鼓动热烈的声浪，血气奋张，含着不定的希望，舞手蹈足似的前往，经俄国大河复尔嘉（Volga）的上流，铁桥两面，望去已经隐约看得见两两三三的工厂的烟筒。二十五日早起，忙着整理什物，四十多天的火车生活快完了。天色清明，严肃的寒风，裹着拥锦的白云越发谨飭，宇宙含笑融容，都和煦我的心灵，使勿太沉寂。满目雪色长林，欣欣然迎我这万里羁客。苍苍的暮霭，渐渐地漫天掩地的下罩，东方故国送别的情意，涌出一丸冷月安慰我的回望。轮机轧轧，作谐和的震动，烟汽蓬勃喷涌，扑地成白云缭绕；夹着木柴火烬的飞舞，星星在长林墨影冻堤白雪上显现灿烂勇武的“红光”，飞掠的车龙更抛拂他们成万条宛转的金翼。沿铁道两旁，行近莫斯科郊外的地方，夹着两排疏疏密密的雪树，车行拂掠着万条枝影前进，偶尔掠过林木的缺处，就突然放出晶光雪亮的寒月，寒芒直射，扑入车窗，如此闪闪飞舞突进，渐近莫斯科。已经遥遥看见城中电光明处，黑影中约略还辨得出喘息稀微的工厂烟汽。几分钟后已到莫斯科雅洛斯拉夫站（Yaroslavsky Wokzal）。那时是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五日晚十一时光景，太阴历的庚申年十二月十七。寒月当空，嘈杂的人声中，知道已到“饿乡”了。

赤国的都城也就是四世纪前俄罗斯莫斯科时代皇朝的旧宫。处于欧洲无产阶级“心海”的涛巅，涌着俄罗斯劳动者心血热浪，颠危震荡于资本主义风颶之中的孤岛已经三年有余了。“赤都”第一夕的心影，留一深切的印象，东方稚儿渐渐自觉他的内力，于人类文化交流之中求一灯塔的动机已开，饿乡之“饿”如其不轧窒他的机括，前途大约就可以见平风静浪的海镜，只待于百忙之中，将就先镇定了原人时代海运的帆篷舵索，稳稳的去探奇险。

社会革命怒潮中的赤都只是俄劳动者社会心理的结晶。社会结构的幼稚，或者可以说现代人类文化的程度不过如此，群众心

理的表现，大部分还只能如婴儿饥渴求饮的感觉。三年以来，奔腾澎湃的热浪在古旧黑暗的俄国内，劳动者的“生活突现”，就只在勇往直前强力怒发的攻击，具体的实现成就这一“现代的莫斯科”。他们心波的起伏就是新俄社会进化的史事，他们心海的涵量就是新俄社会组织的法式。实际生活中的社会心理变迁再变迁，前进再前进，遥远的未来如果能允许俄国劳动者以胜利，也得先立条约：以他们在“实际生活学校”中的成绩作预支“胜利基金”的信用（credit）。

赤色的旗帜之下——新莫斯科——只能见很稀很少的唯心派社会主义试验法的痕迹。社会进化史是社会心理变迁的记录，就是只显露情感感觉流动的“阴影”；他不是社会思想，社会学说的学案，并无理性分别计较试验的公式图表，本来群众心理还非如个人心理之有理性意识（第六识）作用的表现。

十五

白雪的沉影下，盖着六层的大楼，一面遥对克莱摩（Kremlin）皇宫的殿阙，一面俯接帝国大剧院院顶上雄伟的铜马，这是旧时莫斯科最大的旅馆，现时俄罗斯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外交人民委员会。四层楼上，一间办公室，窗帘华丽而破旧，稀微的雪影时时投射进来；和软的沙发，华美的桌椅时时偶然沾着年久的尘埃，欣欣然的欢迎远客；打字机声滴滴锒锒不停，套鞋沾着泥雪在光滑可爱的地板上时时作响；办事员都裹在破旧的皮大氅里手不停挥的签字画押，忙忙碌碌往来送稿；兴兴勃勃热闹的景象中，只有大病初愈的暖汽管，好一似血脉尚未流通，时时偷着放出冰凉的冷气，微微的暗笑呢。这就是外交人民委员会东方司司长杨松（Yason）的办公处。杨松微微含笑对着远来的新客道：“我们这里怎么样！……可是很冷呵，你瞧我穿着皮大氅办公呢。……中国的劳动人民自然是对我们表很亲密的厚意，可惜协约国封锁以来，谣言四布，他们未必得知此地的实情，或

多误会。诸位到此，正可为正直的中国人民一开耳目，为中俄互相了解的先声。我们能不竭诚欢迎吗！不过我们处于极窘急的经济状况，一切招待有不周到的地方，还请原谅。……”

到莫斯科的第三天就得到外交人民委员会发给的“膳票”，并且派一人同往外交委员会的公共食堂。饭菜恶劣，比较起来，在现时的俄国还算是上上等的，有些牛油，白糖。同吃饭的大半都是外交委员会的职员。我看他们吃完之后各自包着面包油糖回去，因问一问同行的人。他说俄国现在什么都集中在国家手里，每人除办事而得口粮外，没处找东西吃用，所以如此。“譬如你们这种‘双喜’烟，我已经一年多没抽到这样好的烟了。……你们通信，可不要写俄国的坏处呀……哼哼……”他忽然低声的问道：“你们有鸦片烟吗？”……“怎么！竟没有！……我听说此地的中国人常常有抽的……”公共食堂是以前的旅馆，外交委员会职员大半都住在里面，却是很方便的。过不到几天（二月二日）外交委员会就派汽车送我们到一公寓。这公寓亦是旧时的旅馆“Knyaji Dvor”。我们三人占了两间屋子。桌椅床铺电灯都很完全。草草收拾整理停妥，房间汽炉烧得暖暖的，吃饭在公寓里有饭堂。饱食暖居，凭窗闲望，金灿灿辉煌的大教堂基督寺的铜顶投影入目，四围琐琐的小树林，盖着寒雪，静沉沉的稳睡呢。这种物质生活的条件，虽然饮食营养太坏，亦满可以安心工作了。我想一切方便，都赖旧时旅馆的结构处置，公共居住公共消费，也可见资本主义给社会主义打得一好基础呵。可惜三四个月之后，劳农政府实行新经济政策，食粮停发，饮食的方便，在我们公寓里，因此就消灭了。——这是后话。

东方稚儿已到饿乡了。回看东方的同胞在此究竟“如何”。我们到莫斯科十天之后，就刚值全俄华工大会。会中从俄国各地到的代表约有近二百人。所代表的人数尽在欧俄的总有四万多。他们有从法国德国欧战时逃回国没成而流落此地的，有向来在俄经商作工的。现在呢，工作的物质生活条件很窘，往往迫得营私舞弊。一百多代表中“识字知书”的很少，可是穿着倒还不

错，——真可佩服的中国人的“天才”！然而他们听说我们来了，异常之高兴欢迎。长久不听见中国国内的消息，他们也正如渴得饮。我们随便谈谈国内的学潮，却也只激出几句爱国的论调。陈领事不敢出席，——不知因为什么，——各代表都不满意。会议中的要案，因为当时还禁止经商，大家都想回国，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回国问题”。——结果都推在领事身上。至于其余的组织问题，乱七八糟，不用说自然是中国式的组织！大会之中我因此得认识些中国侨工，后来也常往来。只可怜饿乡里的同胞未必认所居地为饿乡呵。

饿乡！饿乡！你还是磨炼我的心志，还是亏蚀我的精力呢？工作开始了，看着罢。

我们的工作条件是不很困难的。杨松介绍我们许多地方，可以搜集材料，访问要人。第一就见着俄罗斯共产党机关报《正道》(Pravda)的主笔美史赤略夸夫(Mechtcheryakoff)。他指示我们参观的手续，一切种种，从他开始。同时东方司还派一翻译郭质生，他懂中国话，生长在中国，所以有中国名字，虽然他不能译得很好，我们也另有英文翻译，亦是外交委员会派来的，自己又可以说几句俄文，本来用不着他，然而后来我同郭质生竟成了终生的知己，他还告诉我们许多革命中的奇闻逸事。实际生活中的革命过程。因此我们正式的考察调查从那天见美史赤略夸夫起，“非正式的”考察调查也从那天见郭质生起。

雄伟壮丽的建筑，静悄悄的画室，女郎三五携着纸笔聚在一处一处大幅画帧之下。——这是德理觉夸夫斯嘉画馆(Tri tyakovskay gallereya)，我们在莫斯科第一次游览之处。那地方名画如山积，山水林树，置身其中，几疑世外。兵火革命之中，还闪着这一颗俄罗斯文化的明星。铁道毁坏，书报稀少，一切文明受不幸的摧折，于此环境之中，回忆那德理觉夸夫斯嘉(Pavel Mikhailovith Trityakovskay, 1832—1898，这画馆的首创者)的石像，还安安逸逸陈列在他死时病榻之处，正可想起“文化”的真价

值。俄罗斯文化的伟大，丰富，国民性的醇厚，孕育破天荒的奇才，诞生裂地轴的奇变，——俄罗斯革命的价值不是偶然的呵！社会之文化是社会精灵的结晶，社会之进化是社会心理的波动。感觉中的实际生活教训，几几乎与吾人以研究社会哲学的新方法。进赤俄的东方稚儿预备着领受新旧俄罗斯民族文化的甘露了。理智的研究侧重于科学的社会主义，性灵的营养，敢说陶融于神秘的“俄罗斯”。灯塔已见，海道虽不平静，拨准船舵，前进！前进！

十六

荒凉广漠的大原，拥抱着环回纡折的峦谷，冷风凄雨，严霜寒雪，僵绝的冰流渐渐的溅裂，飞舞的沙砾阵阵的扫掠，一切“天然”的苛酷累年积月，层层抑遏，却有兀傲猖狂的古树，翹然矗立于其中。臃肿的伟干，蜷曲的细枝，风伯雹神恨他的猖獗，严刑酷罚一日不离这“天然之叛贼”，飕飕微动就已震颤，点滴僵石，却又木然，唉！积威之下，难道他畏怯至此！年龄无量数，幅员无量大，经受尝试无量苦，——不知道天地的久长，宇宙的辽阔，鰥寡孤独的惨戚。只时时颺拂自己的万里长枝，零星琐叶，从容徘徊于此惨忍不仁的“天然”间。似乎是已经老态龙钟，枝叶委琐，雨侵虫蚀，靡靡难振，然而又未尝闻斧斤之声而有丝毫转侧，受啄木之喙而起细微呻楚，确也崛然强项。只有凄微的风色，匿黯的日影，重云摩顶，孤鹄啼枝，添绘了几许悲愁的景象！回忆小阳春时几微流转些将近暖谷的和风，偶尔沾惠些尚未凝霜的甘露，虽则凄惨依然，预觉“严冬之恶神”狂暴，却还有余力作最后的奋斗，试一试防御的战术，居然能及时自显伟大的“春意之内力”；那时何等光荣！殊不知一切都如梦呓，到而今枉然多此悲叹。然而！……然而这春意之内力，他是自信的，不过何日得充分发展，何道得出此牢笼，他那时也许未尝想及。然而……然而他是自信的，神圣的古树呵，自有他永不磨灭

的自信力。

果不其然！在荒原万万里的尽端，炎炎南国的风云飏起，震雷闪电，山崩海立，全宇宙动摇，全太阳系濒于绝对破灭的危险恐怖，天神战栗，地鬼惊啸。此中却还包孕着勃然兴起，炎炎奋焰，生动的机兆，突现出春意之内力的光苗，他吐亿兆万丈的赤舌，几几乎横卷太空。我们的老树，冰雪的残余，支持力尽，远古以来积弱亏蚀，——况且赤舌的尖儿刚扫着他腐朽的老干，于是一旦崩裂，他所自信的春意之内力，趁此时机莽然超量的暴出，腐旧蚀败的根里，突然挺生新脆鲜绿的嫩芽，将代老树受未经尝试的苦痛。

可惜，狂波巨涛，既卷入深曲的港湾，转折力尽，又随“天然”的惰性律而将就渐静。赤舌的光苗于此渐黯渐黯。他国新林中的鲜芽受不足春之热力，又何从怒生呢？孤另另这一棵古树中的新枝，好不寂寞凄清。何况旧时残朽的枝叶，侵蚀的害虫，还有无数的遗留，苛酷的天然，依然如旧，或者暴风霖雷之后，天文的反动，更加暴虐苛刻，冷酷非常。春意的内力呵！你充满宇宙，暂借此一枝不自然，超其能量而暴发的新芽，略略发泄。还希望勇猛精进抗御万难，一往不返，尤其要毋负这老树兀岸高傲的故态呵！

跋

几世纪几千年的史籍，正象心血如潮，一刹那间已现重重的噩梦，印象稀微，何独不因于此。人类社会的现象萦回映带，影响依微，也不过起伏震荡于此心波，求安求静，恃生活力为已后援。一切一切都放在这“实际”上，好一似群流汇合于心波的海底；任凭你飞溅临空，自成世界，始终只成一抽象的空间之点，水落时依然归于大空，不留半毫痕迹，那时自知枉然。

心海心波的浪势演成万象，错构梦影。醒时愈近，梦象愈真，亦许梦境愈恶。心海普通圆满，心波各趁奇势；所以宇宙同

梦，而星神各自炫耀他自己的光彩。其中梦短者不必多羨长梦中的“旧时歌舞”，已可先见后来恶鬼的狞脸：——只须经过中加速几秒，跳过几重类似的梦影，——咱们同梦者还得同醒。假设心海的波涛，展荡周遍，“趋平”之机成熟，这自然是可能的。

唉！资本主义的魔梦，惊动了俄罗斯的神经，想求一终南捷径，早求清醒。可惜只能缩短分秒，不容你躐级陟登。西欧派斯拉夫派当日热烈的辩论，现在不解决自解决了。中国文运的趋向，更简直，更加速，又快到这一旧步。同梦同梦！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交流，在俄在华原是一样，少不得必要打过这几个同样的盘旋。

我这东方稚儿却正航向旋涡，适当其冲，掌舵得掌稳才好。还有我个人心理的经过，作他浮桨前依拂的萍藻，更成交流中之交流；必得血气平静，骇浪不惊，又须勇猛镇定，内力涌现。

我寻求自己的“阴影”，只因暗谷中光影相灭，二十年来盲求摸索不知所措，凭空舞乱我的长袖，愈增眩晕。如今幸而见着心海中的灯塔，虽然只赤光一线，依微隐约，总算能勉强辨得出茫无涯际的前程。何况孑然飘零，远去故乡，来此绝国，交通阻隔，粗粝噎喉，饿乡之“饿”，锤炼我这绕指柔钢，再加以父母兄弟姊妹，一切一切，人间的关系都隔离在此饿乡之“乡”以外。如此孤独寂寞，虽或离人生“实际”太远，和我的原则相背，然而别有一饿乡的“实际”在我这一叶扁舟的舷下，——罗针指定，总有一日环行宇宙心海而返，返于真实的“故乡”。

一九二一年十月稿竟。

赤都心史

序

人生的经过，受环境万千现象变化的反映，于心灵的明镜上显种种光影，错综闪烁，光怪陆离，于心灵的圣钟里动种种音响，铿锵递转，激扬沉抑。然生活的意义于客观上常处于平等的地位，只见电影中继续存存陆续相衔的影象，而实质上却是一个独立的影片。宇宙观中尽成影与响，竟无建立主观的余地。变动转换，复杂万千，等到分析到极处，原无所“有”。然而同样的环境，各人各时各地所起印象各异，——此所谓“世间的平等性”于实际生活上永存不灭，与世间同其久长。所以有生活，有生活的现象，有生活现象之历史的过程。生活现象之历史的过程既为实质之差异的印显，就必定附丽于一定的“镜面钟身”。于是已出抽象概括的问题而入具体单独的问题。缘此世间的平等性而有人生经过可说。镜面之大小，钟身之厚薄，于是都为差异之前因。镜与钟的来处，锻炼时的经过，又为其大小厚薄之前因。历史的过程因此乃得成就。

东方稚儿熏陶于几千年的古文化中，在此宇宙思潮流转交汇的时期，既不能超越万象入于“出世间”，就不期然而然卷入旋涡，他于是来到迅流瀑激的两文化交战区域，带着热烈的希望，脆薄的魄力，受一切种种新影新响。赤色新国的都城，远射万丈光焰，遥传千年沉响，固然已是宇宙的伟观，总量的反映。然而

——《赤都心史》于一九二四年六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东方古国的稚儿到此俄罗斯文化及西欧文化结晶的焦点，又处于第三文化的地位，不由他不发第二次的反映，第二次的回声。况且还有他个人人生经过作最后的底稿。——此镜此钟置之于此境此界，自然断续相衔有相当的回射。历史的经过，虽分秒的迁移，也于世界文化上有相当的地位，所以东方稚儿记此赤都中心影心响的史诗，也就是他心弦上乐谱的记录。

《赤都心史》将记我个人心理上之经过，在此赤色的莫斯科里，所闻所见所思所感。于此时期，我任北京《晨报》通信记者的职务，所以一切赤国的时事自有继续的通信，一切赤国的制度另有系统的论述，不入《赤都心史》内。只有社会实际生活，参观游谈，读书心得，冥想感会，是我心理记录的底稿。我愿意读者得着较深切的感想，我愿意作者写出较实在的情事，不敢用枯燥的笔记游记的体裁。我愿意突出个性，印取自己的思潮，所以杂集随感录，且要试摹“社会的画稿”，所以凡能描写如意的，略仿散文诗。材料的来源，都在我莫斯科生涯中，约略可以分作几种：杂记，散文诗（“逸事”），读书录，参观游览记。“我心灵的影和响，或者在宇宙间偶然留纤微毫忽的痕迹呵！——何况这本小小的册子是我努力了解人生的印象。”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莫斯科，集竟记。

一 黎明

沉沉的夜色，安恬静密笼罩着大地。高烧的银烛，光焰影昏，羞涩的姮娥，晚妆已卸；酒阑兴尽，倦舞的腰肢，已经颓唐散漫，睡态惺忪，渴涩的歌喉，早就澜漫沉吟，醉呖依微。兴高采烈，盛会欢情，极人间的乐意，尽人间的美态，情感舒畅，横流旁溢，“留连而忘返”，将当年“复生”的新潮所创造的“人间美”，渐渐恶化，怠化，纵恣化。清歌变成了醉呖，妙舞已代以淫嬉，创造的内力已自趋于磨灭。一切资产阶级的艺术文化渐渐

的隐隐的暴露出他的阶级性：市侩气。地轴偷转，朝日渐起，任凭你电花奇火有几万万光焰，也都濒于夺光失采的危怖。几分几秒后，不怕你不立成“烟火”的微光。黎明来临，预兆早见，然而近晓的天色几微，鱼肚惨色渐转赤黑愁黯的霞影时，反不如就近黄昏的夕阳！游荡狂筵的市侩乐，殊不愿对于清明健爽的劳作之歌让步。何况夜色的威权仍旧拥着漫天掩地的巨力，现时天才转，微露晨意，未见晨光，所显现的只是黎明的先兆，还不是黎明呢。鱼肚之光，黑霞之色，本来是“夜余”而又是“晨初”呵。

人类的文化艺术，是他几千百年社会心灵精采的凝结累积，有实际内力作他的基础。好一似奇花异卉受甘露仙滋的培植营养：土壤的膏腴，干枝的壮健，共同拥现此一朵蓓蕾。根下的泥滋，亦如是秽浊，却是他的实际内力的来源；等到显现出鲜丽清新的花朵，人人却易忘掉他根下的污泥。——社会心灵的精采，也就包含在这粗象的经济生活。根本方就干枯，——资产阶级经济地位动摇，花色还勉强留几朝的光艳，新芽刚才突发，——无产阶级经济权力取得，春意还隐于万重的凝雾。

那将来主义，俄罗斯革命后而盛行的艺术上之一派，——是资产阶级文化的夜之余，无产阶级文化的晨之初；他是春阑的残花，是冬尽的新芽；凝雾外的春意暂时委曲些儿，对着那南风中的残艳，有无愧色？……固然！然而，夜阑时神昏意怠的醉荡之舞，看来已是奄然就息；那黎明后清明爽健的劳作之歌，还依稀微忽。当然仅觉着这目前沉寂凄清的“奇静”，好不惨惋。可是呢……悄悄地里偶然遥听着万重山谷外“新曲”之先声，又令人奋然振发，说，黎明来临……黎明来临！

莫斯科的德理党夸夫斯嘉画馆里，陈列著名的俄国画家，如联萍等的手笔，旧文化沙砾中的精金，攸游观览，可以忘返。于此间突然遇见粗暴刚勇的画笔，将来派的创作，令人的神意由攸乐一变而为奋动，又带几分烦恼：粗野而有楞角的色彩，调和中

有违戾的印象，剧动忿怒的气概，急激突现的表显，然而都与我以鲜，明，动，现的感想。前日，我由友人介绍，见将来派名诗家马霞夸夫斯基，他殷勤问及中国文学，赠我一本诗集《人》。将来派的诗，无韵无格，避用表词，很象中国律诗之堆砌名词形容词，而以人类心理自然之联想代动词，形式约略如此，至于内容，据他说和将来派的画相应，——他本来也是画家。我读他不懂。只有其中一篇《归天返地》，视人生观似乎和佛法的“回向”相仿佛。家乐剧院更取将来主义入演剧的艺术，一切旧规律都已去尽，亦是不可了解。新艺术中的有政治宣传性者，如路纳察尔斯基的《国民》一剧，我曾经在国家第二剧院，——旧小剧院看过，所用布景，固然是将来主义，已经容易了解些，剧本的内容却并非神秘性的，而是历史剧，演古代罗马贫民革命，且有些英雄主义的色彩。昨日到大剧院，一见旧歌剧花露润融，高吟沉抑，旧艺术虽衰落不少——据俄国人说如此，——却一切美妙的庄丽的建筑艺术都保存完好。

危苦窘迫，饥寒战疫的赤都，文化明星的光辉惨淡，然而新旧两流平行缓进，还可以静待灿烂庄严的将来呢。

一九二一年二月十六日。

十一 宗教的俄罗斯

愁惨的阴云已经散尽，凝静的死雪已经化完，赤色的莫斯科渐渐融陶于明媚的春光。蔚蓝的天色，堆锦的白云，春气欣欣，冷酷的北地风雪已化为乌有了。基督救主庙壮丽的建筑，辉煌的金顶，矗立云际，依然昂昂突显神秘的奇彩。庙旁旷园，围着短短的灌林，初春的花草，鲜黄嫩绿，拂拭游春士女的衣袂。

俄友郭质生来谈，说今天是俄国旧历复活日曜日，家家都插“瘦柳”，教堂中行大礼拜呢，因邀我们去看。希腊教的仪式，却是中国人的基督教观念中所没有的。

莫斯科最大的教堂——基督救主庙，建筑伟丽，雕刻画像都

有很大的艺术上的价值。我们进去的时候，人已很多，每人手中都拿着一握“瘦柳”。只见十余丈高的堂顶上，画着非常之伟丽的耶稣像，四壁辉煌金彩，中间成一十字甬道，甬道的一端，正中有大理石龕，龕前（十字甬道之前）二角有两台：一经筵，一歌筵；十字甬道之他端是庙门，此处和经筵歌筵相对又有两座：左为国皇座，右为神甫座。救主庙的神甫，是全俄最高神甫，革命前受国库供养，统辖全国教堂事务，所谓“国家中之国家”。十月革命后教制仍存，不过与国家政府绝对脱离关系，单受信教徒的供给。我们在教堂中站着不多时，人渐拥挤，最高神甫到了。只见一老者穿着银色长袍，仿佛中国的道士服装，旁有两侍者，服装相类。一侍者手执香炉，垂着银索，在前一面走着，一面荡着，领导最高神甫走向祭坛，歌筵上立刻就唱起圣歌来。大礼拜式就此开始。随后神甫走到堂中向众画三次十字，一侍者展开斯拉夫文《圣经》，放在他前，高声朗读。如此种种仪式，延长约有两小时余。

我们回到寓所，郭质生问我有何感想。我说仿佛不在欧洲。他笑着说俄国东方文化很深，大多数农民群众，迷信得很呢。——革命之后才稍好些。诚然不错，希腊教仪式竟和中国道教相似。

农民因俄国旧文化的缘故，守旧而且愚昧。据郭质生说：十月革命初期，各地乡村中农民奋起，高呼分权万岁，各村通行须有当地地方政府的执照，如此者三月。后来国内战争剧烈，农民少壮都受征调，政府派遣食粮军收集食粮，农民才渐渐忘掉苏维埃政府分给土地驱逐地主的政策而起怨忿之心。现时新经济政策初实行，还时时听见农民反抗的事——他们还不十分相信呢。然而革命前俄国人民有百分之七八十不识字，如今识字者的数目一跃而至百分之五十。最大的原因有两个：（一）二月革命后政局上不断的起非常之巨大的剧变，虽然沉寂的乡僻地方也渐渐有得政治消息的兴趣，各党宣传者多四出散给报纸。（二）退伍兵士，从战线回家，思想已大改变。——因此现在农民对于宗教的关系

稍淡，思想上的改造，已经要算大告成功了。

四月二十三日。

十六 贵族之巢

两三月前，《劳农公报》初发表开放商业的命令。小商人市侩欣欣然的露出头来。不但小商人呢！体力不能当工人的一班“念书人”，夫人，小姐，受不着职工联合会的保护，口粮所领太少，消费的欲望又高，——这才有了机会。

十字街间，旷场两面，一排一排小摊子。……人山人海，农家妇女，老人，工人，学生……种种色色人，簇拥在一处。这里一批白面包，香肠，火腿，牛奶，糖果点心，那里一批小褂，绒裤，布匹。一堆一堆旧书旧报，铁罐洋锅，碗盏茶杯，……唔！多得很呢！再想不着：严冬积雪深厚，——我们初来时，劳动券制之下，——这些丰富杂乱的“货物”，都埋在雪坑里冰池底么？经济市场的流通原来这样。可是开端的原始状况还很可怜。学生服装的一两个人或是拿一条裤子，一双旧鞋也算做生意呢。

远远的日影底下，亮晶晶耀着宝石，金链；古玩铜器，油画，也傲然一显陈列馆的风头。有华丽服饰，淡素新妆的贵妇人，手捧着金表，宝盒等类站在路旁兜卖。有贵族丰度的少年，坐在地下，展开了古旧贵重的红氍毹，等着顾主呢……

现在又过了两月了。亚尔培德街前，许多小孩子拿纸烟洋火叫卖，汽车马车穿梭似的来往，街窗里红玫瑰绣球来欣欣的舞弄他的美色，一处两处散见着新油漆的商号匾额，——啊哎！热闹呢！再不象“冬时”，军事的共产主义之下，满街只有茫茫的雪色，往来步行的“职员”，夹着公事皮包的人影了。

一间大玻璃窗，染着晶亮的银字：“咖啡馆”。窗里散排着几张小桌藤椅。咖啡馆小室尽头账台上坐着一素妆妇人，室中间站着一半老的徐娘，眉宇间隐隐还含贵倨之态，却往来招呼顾客。

——请问，是不是要咖啡，还是中国茶？

——两块点心，糖果多拿些！——一男子粗鲁的口音回答着，翘着双腿，笑嘻嘻的和同伴谈天呢。

——就来，就来！咖啡一杯，中国茶两杯，点心两块，这里的客人要。……

馆门开处，一位“美人”走进来了，红粉两颊，长眉拂黛，樱唇上涂着血滴鲜红的胭脂，丝罗衣裙，高底的蛮靴，轻盈缓步的作态坐下，眼光里斜挑暗视，好象能说话似的。拈着一枝烟，燃着了，问道：

——咖啡牛奶一杯，有好点心么？

贵倨的半老徐娘和声下气的答应着。咖啡点心都拿来了。忽然又进来一女郎，服装虽不华丽，神态非常之清高，四处一看，见有那一“新妓女”神气的女人坐在那里，于是不多看，忙找着店主人，问好之后，接口就咕噜咕噜用德国话谈了半天。店主人拿出几万苏维埃钱交给女郎，他就匆匆的走了，新妓女那时已吃完：

——你们这里没有牛肉饼么？几万钱一碟？

——没有，对不住，可是可以定做，晚上就好，要多少呢？请问。两万钱一碟。

——要两碟，浓浓的油。

说完他就站起来，扭扭捏捏的走出来，走到门口，懒懒的说一句“再见”。店主人忙答应着，回头笑向那半老徐娘，用法文说道：这又不知道是那一位“委员”的相好，看来很有钱呢……

假使屠格涅夫（Turgeneff）的《贵族之巢》在地主华美的邸宅，现在五十年后，苏维埃俄国新经济政策初期的贵族之巢却在小小的咖啡馆。——原来革命后贵族破产，所余未没收的衣饰古玩，新经济政策初行，流到市场上，过了这两月他们便渐渐集股积聚，居然开铺子了。其实新经济实行，资本主义在相当范围内可以发展。而资本集中律一实现，这班小资本的买卖不过四五月

——杜洛次基，
现译为托洛茨基

就得倾倒。我初见街头所卖白面包，还是小生意家家里自己零做的。现在已经看得见一两种同式同样又同价的白面包，打听起来，原来已有犹太旧商人复活，做这大宗批发生意，替他算起来，一天可得利几千万苏维埃卢布呢。资本的发展——按经济学上的原则——真是“速于置邮之传命”。

俄国贵族的智识阶级向来最恨资产阶级的文化，——赫尔岑说西欧文明不外一“市侩制度”而已。现在却都要成可怜的资产阶级中的落伍者呢。虽然……虽然……那“忏悔的贵族”，——“往民间去的青年”，一世纪来在社会思想上为劳动人民造福不浅。共产党领袖中磊落的人才也不少过去时代的贵族呵。前一月我曾遇一英国共产党——很研究俄国文学。他说俄国文化中资产阶级一分都没创造，历来文学家社会思想家差不多个个都是贵族。……

我的俄国历史教授纪务立说：大俄罗斯民族东方性本重，个性命发达，——固然有许多特点优良的国民性，然而缺点也就不少。老实说，一切艺术科学文学的文化不是西欧输入的么？未欧化的大俄罗斯人污秽迟钝，劣性很可见，至于贵族青年有志的，那又是一件事——他们欧化虽不纯粹，始终在历史上占了一过渡西欧文化的地位。如说到小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已近西欧，东方色彩就淡得多。平民之中也可以看得文化性。

初到莫斯科时，我们认得一英国人——共产党，外交委员会的职员威廉。威廉夫人是生长在小俄罗斯的。他曾说小俄罗斯贵族的地主制——封建遗迹，破坏的较早。那地农家妇女爱清洁，有条理，——日常生活之中才真见得文化的价值。往往在大俄罗斯及乌克兰边境，小俄农家女有嫁给大俄人的；新媳妇进门不到两三天，立刻就就要把大俄农村家庭整顿一番，油刷裱糊都是新媳妇极力主张的，——他根性就不能忍耐那半东方式的污糟生活。

六月十三日。

十八 列宁杜洛次基^①

克莱摩宫十三世纪的宫墙，七百年前的教堂——朴素古旧，建筑奇特，当时必是国家中央最大的圣地，而今比着后代西欧式的新殿宇，已竟很低很狭了，累世纪的圣像画壁——人面衣饰，各画之间还留着古艺术的“条件性”，好一似中国的关帝像，希伯来君士但丁文化的遗迹还显然；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苏维埃的办公室，都在新殿宇内：巨大的跳舞厅，光滑雪亮的地板，金碧辉煌的壁柱，意大利名艺术家的雕刻，有一部分宫殿，彼得大帝以前的俄皇起居，还另设陈列馆人员指导游览，西欧化后俄国的文明已算会集希腊日耳曼的精髓糟粕；现今则安德莱厅赤色光辉四射，全宇宙映耀，各国劳动者代表的演辞，声音震及环球，——第三次大会的共产国际；今日之克莱摩宫真做得人类文化三阶段的驳杂光怪的象征。

第三次大会第一天，杜洛次基提案《世界经济现象》，指呈当时经济恐慌稍缓，渐有改善，劳动运动由进攻一而而为防守——资本家反乘机进取，然而这不打紧，共产国际可藉此深入群众，正是历练巩固革命力的好机会。丰采奕奕的杜氏，演说辞以流利的德语，延长到三小时余，……后来讨论时，法国共产党有许多疑问，争辩很久。我们新闻记者中有不十分懂的，因约着布加利亚代表同去问杜氏。杜氏见中国新闻记者很欣喜，因竭力和我们解释，说话时眉宇昂爽，流利倜傥。他说，经济状况窘迫——就是“恐慌”到时，并不一定是革命的时机，有时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派之激于意气，冒昧暴发，反丧群众的元力；经济状况改善时，工人资本家冲突渐入“经济要求”的狭轨里，然而即此可鉴“社会党人”和群众的密接训练程度增高……“法国同志就是不赞成我这一层意思……”他说得兴高采烈的时候，手里一枝短铅笔，因他指划舞弄，突然失手飞去，大家都哄然笑起来了。……

列宁出席发言三四次，德法语非常流利，谈吐沉着果断，演说时绝没有大学教授的态度，而一种诚挚果毅的政治家态度流露于自然之中。有一次在廊上相遇略谈几句，他指给我几篇东方问题材料，公事匆忙，略略道歉就散了。

安德莱厅每逢列宁演说，台前拥挤不堪，椅上，桌上都站堆着人山。电气照相灯开时，列宁伟大的头影投射在共产国际“各地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等标语题词上，又衬着红绫奇画，——另成一新奇的感想，特异的象征。……列宁的演说，篇末数字往往为霹雳的鼓掌声所吞没。……

大会快完，政治生活的莫斯科这次才第一次与我以一深切的感想呵。

七月六日

二〇 官僚问题

俄国社会问题从十九世纪的以来，除九十年时代勃然兴起的劳工问题外，向来在社会思想中占极重要而不得解决的还有三个问题：智识阶级问题，农民问题，官僚问题，封建遗毒，东方式专制政体，使官僚问题种得很深的根底。葛葛里（Gogol）的《巡按》，俄国官僚社会的肖像，几十年，因有社会经济的根源，只在变化不在消灭，革命的巨潮如此汹涌尚且只扫刷得一些。无产阶级新文学中已有“新葛葛里”出现，共产党报纸上努力的攻击官僚主义呢。

二一小学女教师值学校停课，所领口粮不够生活，因就一临时讲席，原来的口粮也没辞去。农工检察人民委员会，委派整理职员予以考核的时候，这位女教师不得不受审判，争辩的结果，反得知审判官中每人至少也得七份口粮呢。

郭质生和我说：有一营官兼营中政治文化委员会会员，不知

怎么样作弊得五百万苏维埃卢布，营长及委员长两人最初假装着不知道。此后营官贿赂营长妻以地毯，却骗了委员长。营长及委员长两位长官的夫人彼此谈起来，委员长夫人吃起醋来了！于是这件事就此发作。营官的老母托质生去看他，他对着质生凄然的说道：

——听说判决死刑……枪毙，……枪毙……难道我的命只值五百万……五百万么？……

八月十二日。

二一 新资产阶级

无产阶级政府命令如箭的飞来，“店老班”的肚子如牛的胀起。

一月半前有一共产党的亲戚开了一咖啡馆，托一朋友雇跑厅的女郎，道：

——每月十五万卢布，每天两小时的工作，……嘻……嘻，额外钱“在咖啡馆”里他们自己还可以另赚，只要会……请你留心替我找一找。

郭质生——虽是“非政治主义者”，然而始终是热烈的“忏悔的贵族”，嫉视市侩主义的文化——他听说这件事，暗含隐语的说道：

——现在又多一出路了。你中国的道学家！以为资产阶级，上等社会清高得很呢，你看，现在俄国机关有多少女郎！战前向来没有过。第一次外交部有女官，大家还诧异呢。现在这班“女官”你想他们怎么样。早晨上衙门，外交委员会呀，教育委员会呀，下半天“公余”，赶紧重新梳掠涂抹起来，上咖啡馆当女役去！又是一条出路！你还不知道，革命时资产阶级破产，这些女孩儿家，速记生，打字生……怎样得上衙门去的呢，革命了，炮火连天。家里一个钱也没有，生意做不成，工厂没收了，丈夫在战线上不得回来，一个女人家年纪又老了，……要吃要用，怎么

办呢？唔！哼……女儿十八九岁了，……一清早梳掠同着女儿去看一看“熟人”新任的委员，主任，“怎么样呢！困难得很……想一方法，请你给女儿弄个位置罢，啊哎！”……委员长看一看，眯细着眼说：“好……好，哈……哈！我给你们想法，给你们想法。……”于是成功了，有口饭吃。现在呢……现在呢……新经济一开放商业，哼……“旧的”更倒到“底下”去，新的更爬到“上头”来。

说得好急激，好急激，……未免刻毒。

和质生说完之后，顺路出来，天色已竟薄暮，暗地里隐约见前面两个人影，一面走着谈天呢：

——啊！我今日忘了带“白手套”，出得手汗，好不难受。……你的事怎么样？“得意”么？

——我给他二百万卢布股分，他还请加。我想他那买卖利钱太少，算了罢。

新资产阶级发生起来，应着“资本最初积累律”，社会生活的现象中也就随之发见种种“新式”。戏院（私人的），咖啡馆，饭馆，照相馆，市场经济越发扩张了，技师就私人企业家聘请的每月动辄百余万了。

国家工厂企业也完全改成“每一企业为一法人”的原则，竭力增加生产力，设许多国立托拉斯，种种专利制，——以与私人经济竞争。不但如此呢，政权把得稳稳才好。

前一月小商人自由集会于赤场，要想立新提嘉（syndicat），当时被苏维埃警察驱散。又一次选举商会，会长每月薪金一百五十万，会员一百万。——总共五人，说要“整理”市价，想做投机总机关，又被政府禁止，听说不久就要有合法的商人组织起来呢。——非得使他在国家市政监督之下不可。

八月十五日。

二三 心灵之感受

一间小小的屋子，以前很华丽的客厅中用木板隔成的。暗淡的灯光，射着满室散乱的黑影，东一张床，西一张凳，板铺上半边堆着杂乱破旧的书籍，半边就算客座，屋角站着一木柜，柜旁乱堆着小孩子衣服鞋帽，柜边还露着一角裙子，对面一张床上，红喷喷的一小女孩甜甜蜜蜜在破旧毡子下做酣梦呢。窗台上乱砌着瓶罐白菜胡萝卜的高山；一切一切都沉伏在灯影里，与女孩的稚梦相谐和，忘世忘形，绝无人间苦痛的经受，或者都不觉得自己的存在呢。那板铺前一张板桌，上面散乱的放着书报，茶壶，玻璃杯，黑面包，纸烟。主人，近三十岁的容貌，眉宇间已露艰辛的纹路，穿着赤军的军服，时时拂拭他的黄须。他坐在板桌前对着远东新客，大家印密切的心灵，虽然还没有畅怀的宽谈。两人都工作了一天，刚坐下吃了些热汤，暖暖的茶水，劳作之后，休息的心神得困苦中的快意；轻轻的引起生平的感慨回忆。主人喝了两口茶，伸一伸腰站起来，对客人道：

——唔！中国的青年，那知俄罗斯心灵的悠远，况且“生活的经过”才知道此中的意味，——人生的意趣，难得彻底了解呵，我想起一生的经受，应有多少感慨！欧战时在德国战线，壕沟生活，轰天裂地的手榴弹，啞……嘶……啞……噏……哄……砰……砰，飞机在头上周转，足下泥滑污湿，初时每听巨炮一发，心脏震颤十几分钟不止，并不是一个“怕”字；听久了，神经早已麻木，睡梦之中耳鼓里也在殷鸣，朝朝晚晚，莫名其妙，一身恍荡，家，国，父母，兄弟，爱情，一切都不见了。那里去了呢？心神惫劳，一回念之力都已消失了。十月革命一起，布尔塞维克解放了我们，停了战，我回到彼得堡得重见爱妻，……我们退到乡间，那时革命的潮流四卷，乡间农民蠢蠢动摇，一旦爆发，因发起乡村苏维埃从事建设。一切事费了不少心血办得一个大概。我当了那一村村苏维埃的秘书，家庭中弄得干干净

净，——那有象我现时的状况！不幸白党乱事屡起，劳农政府须得多集军队，下令征兵。我们村里应有三千人应征。花名册，军械簿，种种琐事，我们在苏维埃办了好几天。那一天早上，新兵都得齐集车站，我在那里替他们签名。车站堆着一大堆人，父母妻子兄弟，牵衣哀泣，“亲爱的伊凡，你一去，别忘了我……”“滑西里，你能生还么？……”从军的苦情触目动心。我们正在办公室料理的时候，忽听得村外呼号声大起，突然一排枪声。几分钟后，公事房门口突现一大群人，街卒赶紧举枪示威，农民蜂拥上前，亦有有枪械的，两锋相对；我陡然觉得满身发颤，背上冰水浇来，肺脏突然暴胀，呼吸迫促，昏昏漠漠不辨东西，只听得呼号声，怒骂声，“不要当兵”，“不要苏维埃……”哄哄杂乱，只在我心神起直接的反射，思想力完全消失，胡……乱……——我生生世世忘不了这一刻的感觉，——是“怕”，是“吓”，是“惊”？……不知道。

主人说到此处换一口气，忙着拿起纸烟末抽了一抽，双手按着心胸，接下又说道：

——然而……然而……过了这几分钟，我就失了记忆力了。不知怎么晚上醒来，一看，我自己在柴仓底里。什么时候，怎么样子逃到那地，我实在说不出来。自然如此一来，我们乡间生活完全毁了。来到一省城里，我内人和我都找了事情。过了几月才到莫斯科这军事学院里。我内人留在那省里，生了这一个女孩子，——主人拿手指着床上，——不能去办事了，口粮不够吃，我一人住在莫斯科，每一两星期带些面包（自然是黑的）回去，苦苦的过了一年。什么亦没有，你看现在内人亦来此地，破烂旧货都在这屋子里，俄国现在大多数的国家职员学生都是如是生活呵。可是我想起，还有一件事，是我屡经困厄中人生观的纪念。有一次，我上那一省城去，——那时我家还没搬来，——深夜两点钟火车才到站。我下站到家还有二里路，天又下雨，地上泥滑得不了，手中拿着面包，很难走得，况且坐在火车上又没有睡着，正在困疲。路中遇见一老妇背着一大袋马铃薯，蹒跚前行，

见我在旁就请我帮助。我应诺了他，背了大袋，一直送他到家，替他安置好。出来往家走，觉着身上一轻，把刚才初下站烦闷的心绪反而去掉了。自己觉得非常之舒泰，“为人服务”，忘了这“我”，“我”却安逸，念念着“我”，“我”反受苦。到家四点多钟，安心心的躺下，念此时的心理较之在战场上及在苏维埃的秘书席上又如何！

主人说到此处，不禁微笑。女孩的酣睡声，在两人此时默然相对之中，隐隐为他们续下哲学谈话的妙论呢。

九月十日。

二七 智识劳动

西伯利亚行旅现时非常困难，而我带的书籍太多，又不能走了，——总要等一“便”的机会才好。

病亦似乎轻了好些，最好能进医院，……肺病是要“养”的。可是我一天不读，一天不“想”，就心上不舒泰，——不能不工作；要工作。

工作？我现在的工作纯粹是非体力劳动，片面的智力劳动更使健康受损，性情怪僻，再加之智识劳动所必须的“精神娱乐”，我也看得非常之淡，自然没有生趣了。

前天购书时偶然遇见德尔纳斯嘉女士，他约我赴他的家庭音乐晚会，聊一散心畅怀！

音乐会中到客亦有二十多人，大家肆谈种种问题，从家常琐事到文学哲学。有一女郎和我大谈其中国诗，——他本来是研究文学和科学的，他说无论如何听不出中国诗中的韵；我给他说，中国文的单音，如其照欧文押韵法，势必至于字字相同，所以“韵”，在中国文中只是“两字母音相同”，而子音难得相符。他们又都说中国读诗声如犹太教的祈祷词呢。

披霞娜声忽动，大家聚在厅里来。有一人奏携琴，一人奏繁

华令（西洋胡琴）相和。风雷疾转，泉漏铿锵，固然已经怡神心会，最动人处却在抑扬迢递间写得人心弦上的言语。一中年妇人且吭喉高歌。……我总觉得欧洲音乐，比较的能传达人的情感于外；我虽中国人，听中国乐却没听外国乐的易于感动愉悦。乐竟，大家聚着几位少年人，——老年的吃完晚饭，都已告辞归去，——于是假作演剧，一直到早上六时才散。

欧洲人的精神娱乐，高尚雅致，而且不一定是上等人间，……智力劳动之暇尤其必须，——比打麻雀总好些！一笑。

哼！智力劳动，智力劳动，——一天一小块黑面包，还要娱乐……

今天一中国工人林扬清请我们吃饭；他是皮包匠，每天在工厂里做工八小时，一月得钱二百多万呢。

小小的两间屋子，女主人围着厨裙出来相见，问道：

——诸位说俄国话不说？请坐，请坐。

过不一忽儿，厨房里拿出牛肉汤，面条，我们道了谢，吃着，因说起工厂情形。据林扬清说，工人生活就是如此，也不算得坏了。每天工作完，归来有俄国妻子谈谈心，有时上戏院。当时还有好几位林扬清的同伴，热热闹闹谈话。

我看来暗暗的想，他们——非智力的劳动者——即使有困难苦痛，大概永没有我这一种……“烦闷”呵。

十月十二日。

二八 清田村游记

一 游 侣

托尔斯泰的邸宅，所谓清田村（Yasnaya Poliana），离莫斯科约四百余里；革命时还保存得完完全全，现在归教育人民委员会经管，已改作托氏邸宅陈列馆，另设一事务所管理他。托氏幼女亚历山大为陈列馆事务所的主任。苏维亚·托尔斯泰女士曾屡次邀我们去游。这次刚好莫斯科教育厅第一试验模范学校有一班

学生读托氏文学事迹后，特赴清田村旅行游览；我们趁此专车一同前往。

游侣小学生二十余人，女教员二人，一德维里（Tver）人——老者，托氏亲戚嘉德琳等数女士，一少年；此外还有一所谓“苏维埃小姐”顺路趁便车回家乡，他对我们说：“我在嘉里宁那里办事。嘉里宁！你知道么？现在我们最大的伟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长。……”

我们三十多人同坐一辆专车。十三日晚我同宗武乘月到苦尔斯克车站，会着学生旅行队，他们都很高兴，一同上车，十四日一早到都腊（Tula）车站。由此到清田村不满四十里地，火车忽然停住，派人上去交涉半天毫无影响。我们因下车散步，宗武还替学生队在车旁照了一张照片。当时托氏亲戚等得心焦，先下车步行前去。我们闲着无事，因和德维里老者谈天。他是一个托尔斯泰派，此来也是特为趁车进谒托氏遗泽的。他是德维里地方一牛奶坊协作社的职员，那地从新经济政策实行以来，协作社已经由德维里省经济苏维埃出租于私人，不比国立时候了，——从此工人生活还要职工联合会来整顿呢。老者谈吐朴实，是中下社会的人，蔼然可亲，俄国风度非常之盛，谈及托氏主义，那一种宗教的真诚，真也使人敬仰俄罗斯民族的伟大，宽洪，克己，牺牲的精神，“第一要知道怎么样生活，人生的意义，唔，操守，心地……”谈及历年经过，不胜感喟的说：

——唉！俄国人根性就是无政府的。二月革命后，农民间无政府党非常之盛，反对克伦斯基政府急激得不了。比如北部诸省，就是十月革命后还延长许多时候才平定的，至今时起消极的抗拒，所谓人民委员，去都不敢去呢。那十月十一月时布尔塞维克“面包与和平”的口号，反对与德战争，大得全国农村的同情。后来才明白，军事不是空口停得的，都市里人也是要面包吃的……说起当时的政情来，唔！我们不谈共产党的政策。单说克伦斯基，他那里是一政治家，更不是政客，……谁知“自由与土地”的口号，呼号的那么高，“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谁知

道他是一个“好人”呢。农民要土地，不是要社会革命党党纲的宣言书——是要实实在在的田地，没有什么神妙科学！他真不过是一个空想的智识阶级，譬如开国会问题，延长又延长，在那种政潮的时候！可见他丝毫政治作用都不懂得呵。说起智识阶级来，——你知道俄国几十年来的潮流？——革命之中智识阶级负罪不小。俄国人的心念中，智识阶级向来和普通平民分得清清楚楚，革命初起，他们就已谈什么宪法，国会，人民看得他们和皇上一样的高高在上。等到事情急了，他们又都抛弃了人民逃到外国去了，——不来帮着人民共负大业。怪不得无产阶级也走极端：那几月风潮汹涌的当口，看见戴眼镜的人都指为智识阶级，怠工者，拼命排斥；于是智识阶级更逃得厉害，至今弄得要人办事的时候，人手又太少了。

我问现时俄国的宗教怎样，象托氏学说，传布得深远么？

——宗教么？俄国人是有名的宗教民族。一派市侩式的教堂宗教本是迷信，就是托尔斯泰派也很反对他的。革命前社会运动中反对教堂，以及绝对的否认宗教，本是很甚的。现在呢，政府和教堂分离了，宗教，及有宗教色彩的学说，未免大受打击。无意识的群众、农民却又起心理的反动，更去迷信起教堂来……托尔斯泰派呢，绝对不问政治，不过一种讲学的道德的宣传罢了，“人应当知道怎样生活”，唔！我这次有事到莫斯科，见着白尔嘉诺夫，据说在清田村组织了一托氏派公社，所以特地去参观参观。听说这一公社组织得太晚了些，——现在新经济政策一行，一切都本商业办法，一切农具牛马，种籽，都要买去，那里来许多钱呢？要是早得半年，虽说是“军事的共产主义”，却一定可以得到政府帮助，——集体组织，公共事业向例共产党还算赞助的……

我们在站等到晚上八点钟才开车离都腊。——“都腊”这一字俄文原意为“拦阻”，据说当时鞑靼人从南进攻莫斯科，追到此地，俄国人藉此地的森林，乱斫柴木堆积成山，以挡鞑靼的来路，所以称做都腊，近代却是出产“自暖壶”的名城。

到清田站的时候，已经晚上九十点钟，不能到托氏邸宅去，——托氏邸宅离站约六里。我们两人和小学生同住站边一旧别墅中，别墅虽破旧，小小几间木屋，却也清雅，当天晚饭时，学生旅行队所带干粮牛乳还很殷勤的请我们吃。小学生嬉笑天真神态真使人神往。晚上将就在板床一宿。清早四时即醒，早饭前又替学生照了一相。问起那德维里老者来，说昨晚早已往公社去了。

二 托尔斯泰邸宅

秋云微薄，桦林萧瑟的天气，自清田站步行，向托氏邸宅行来。小桥转侧，树影俯窥溪流，水云映漾，轻步衰草上，如天然的氍毹，心神散畅，都市心绪到此也不由得不自然化了。转向北，直望大道，两旁矗立秋林，红叶斑斓，微风偶然奏几阙仙乐；遥看草间车辙，直行远出，有如川流——旷阔的村路一变而成“流水道”影。黯淡秋云，却时时掩隐薄日，日影如伞盖迎人，拂肩而过。偶然见一二农夫乘着大车，纵辔遄行，赶着马，“嘟嘟嘟”飞掠而过。抵托氏邸宅栅门，就见中世纪式半垒；——这邸宅原是托氏母家复尔广斯基王爵的遗产，地主制度的遗迹还可以看得见。进栅门后，转侧行数十步，遥隔花棚已见托氏宅，犬吠声声报客至，宅中人有出来探望的呢。

一进宅门，前室中就见五六架书橱；上楼时亚历山大出迎，指示解释室中陈设，说是托氏死后一切设置都还仍旧丝毫未动呢。两间图书室，也满放书橱，托氏生时屡次想整理一大间，专设图书馆，始终以邸宅太小没有成功，所以散置楼上楼下；如今还是仍旧。看一切陈设，托氏生前的生活确很朴素，——贵族生活如此却也在意想之外。就只饭厅里有一钢琴；四壁挂着画像，——有名画家联萍的托氏像。再转往东有一小过室——读书一周记室，一小圆桌，上放《读书一周记》，托氏生时每早起先到此室，记日记语录数则后，才出吃早饭呢。进一间就是书房，满架书籍，而突然投入我们眼帘的却是几个中国字，——原来是

芝加哥出版的汉英对照老子《道德经》；书桌上文具很简陋；有一大块碧晶石，上刻金字，是托氏被希腊教堂除名时，马尔切夫斯基工厂工人公送托氏的贺礼；壁间满挂照相，托氏世代的遗像，安德莱·托尔斯泰夫人——苏菲亚女士的母亲，指示我些托氏兄弟伯叔的照相，中一框空着，据说，是托氏叔，因酗酒赌博，堕落子弟，所以除去，不使和诸兄弟相并而立。还有美国人克罗斯倍（Crosby）的肖像，他是美国候补总统，特来谒托氏，托氏劝他一番，他居然放弃候选之职，从此和托氏为至友。再进便是托氏卧室。

小小一间屋子，床头小几上还放着烛台，半枝残烛——托氏出走那天，半夜起来所点的最后一枝烛。床前窗下一小桌，屋角一洗脸架，旁有一马鞍，如此而已。壁间却有一托氏夫人芳年时的肖像，——不愧为名美人呢。

参观时，大家——小学生，教员及德维里老者都格外注意托氏出走轶事，频问亚历山大。亚历山大说：

——你们看这样的家庭布置，就是三十年前也算不得奢侈，然而我父亲晚年，时时刻刻总觉不安心，屡次想出走抛弃一切。再加之家庭恶剧，我母亲处处阻挠他的计划，如分地与农民等事。因此忏悔之心益切，也不得不走了。那天晚上，二点钟起，下楼叫我，同整理行装，叮嘱千万不告家人。父亲走时只肯带得最要紧几件物事，一切奢侈品都不肯用，还是我强勉把一手携灯纳在袋中……唉！你们不知道托氏晚年，心灵之经受多痛苦呵！

参观的小学生都很感动。当时他们散去，到托氏墓前并公社游览。

我们出来，安德莱夫人请我们再周观一次，宗武照了好几张照相，——中有一托氏生时之榻。安德莱夫人又说：

——你们还到楼下一看。那里有托氏早年时的书室呢。

楼下书室中，安德莱夫人还指示我们看一小栋，是当托氏初起忏悔，屡思自缢之处。

三 俄罗斯的农家

天色忽然阴沉，微有雨意，安德莱夫人说恐雨后不能出游，趁此时散步一周，再回来吃饭。

从后院走出，院中一大树，漫散四出，残叶时堕，安德莱夫人指着说，托氏生时每每坐此树下招待贫农谈话，村人都称此树为“贫者树”。出院后，一带果树，绕小径出去，经托氏宅前草场，入疏林蹊路，到托氏墓前，林中有一树椅，托氏散步时，常常坐此休息。我们在托氏墓前，看着小学生用落叶穿成一圈挂托氏墓上。满天湿云飞舞，瘦叶时时经风细吟，一仰首满目清朗，乡野天地，别有会心，托氏的遗泽更使人想起古人浑朴的天性，和此自然相交洽。

返托氏家午膳。托氏妻妹，托氏幼女亚历山大，托氏媳安德莱夫人，还有一中年妇人——托氏亲戚，及一老者——旧时军官，因托氏一语而弃职归田的，他们有的是教育人民委员会所委任，有的是借住于此，大家聚齐吃饭，殷勤问及中国政象，老子学说等。

饭后安德莱夫人又约游园。法国式的芳径，树木夹路，秋末残叶满地，踏步行来胜于毡茵。小池一角清漪如画，那时已萧萧微雨，浪纹都画秋痕。我问安德莱夫人乡居如何，为什么比在莫斯科时越发清瘦了？安德莱夫人说，乡居也不过因为有事罢了，此间人愚蠢，无可谈心，未免焦闷。“你看，那些人，老军官现在已反成希腊教徒，我们两位亲戚女太太们，成天的骂革命政府，俄国平民对着他们都有罪似的，——难道这是托尔斯泰的主义？……”所以他说很乏味，在乡间住着，说还是偶然到农民家去走走，倒可散心。

我们谈着话，信步行来已出托氏栅门，远望三五村落，烟雨迷闷，一片秋原寥落的光景。

安德莱夫人道：

——可惜今天天气如此，不然，还可以同你们到田间一散步呢，我们现在且到那边几家一坐，一看俄罗斯的乡间生活。

我们走过两畦到一木屋，小小巧巧四五间，也有电灯，玻璃窗……安德莱夫人笑着高声说：中国人来访“俄国农夫”了。

——呀，远客来了！——只见一农家女掀布帘出来，——原来中国人也来看俄国乡下人呢，……我们此地近着地主邸宅，向来比寻常农民讲究些；新近装了电灯……啊呀，天气不好，不然诸位可到那边村庄看一看，纯粹的俄国生活。请坐请坐。

安德莱夫人和我们介绍相见，女主人是以前托氏的农奴，还有一位客是安德莱夫人以前的陪嫁丫鬟。坐着吃了几口茶。屋中板桌板凳，屋角挂着希腊教神像，壁上居然有一张半新不旧的油画。四间住房，后面一小小院落，牛羊的兽栏，草仓。四间屋之间，一火炉制在墙壁里，一面临门处有铁板，中可烤面包煮菜；炉顶高及屋梁，上铺床铺。女主人指着炉子道：

——你们中国没有这样炉子罢！呵，冬天冷的时候，才好呢。睡在炉顶上，深夜时分，满身裹得紧紧，烘得暖暖的，将睡未睡的时候，拥着枕头，听着屋顶风暴绞雪，“呼……呼……呼”——真有趣呢。

四 托尔斯泰派公社

自农家出来，顺路到公社一游。

“托尔斯泰派都是非常之有道德的人，可是大概不是务实的人，经营事业，没有经验。”——这是嘉德琳女士和我在莫斯科谈的。现在我亲见托氏派的公社了。他们见我去，非常之欢迎，谈及中国托氏运动，恶战的风俗等等。

据说，托氏派抗拒征调往往被捕；出狱后大家组织起来，仍决然不去当兵，得了教育委员会允许在此组织一公社经济，——田地就用托氏遗产分给农民后所余的。现时社员大约十八九人。有麦田四十七俄亩，菜圃二俄亩，另有三十五俄亩果园，中有一半与村农共有的，……其余产业还有马六匹，牛七匹，羊十头，——一年的生产，预算当可足用，今年还是第一年。社员男女都有，都自己下田工作，——只有农忙时可以雇人，——女社

员还缝工织网。

恬静的生活，一切“人·间·乐”都抛弃。劳作的神圣，自然的怡养固然胜似他百倍。

生产品完全公有，各取所需……今年第一年的成绩还未见出。每年只公付国家五十铺德的食粮税，其他一切自由，几与外界绝无系连。

彼此谈着非常有兴，临走时还说：

——今天天雨，上站晚上简直走不得，我们借一匹马给你们。……

那天深夜，我们走之前，公社中还特派一人送面包及豆来，殷勤诚意，使人感动。

五 清田村之残梦

托尔斯泰邸宅的饭厅里，窗外已乱投秋林晚色，我们望着，正吃过晚饭之后，等着车子，预备返站。

桌上的自暖壶渐渐的响着，沸沫细吟，偶破一室的岑寂。老年的贵妇人——托氏妻妹，坐在桌旁做着女工，他的孙子，天真活泼的小孩子默然静坐在那里读龚察洛夫（Gontcharoff）集，还有一中年妇人——托氏亲戚闲坐读旧杂志。我偶然问那小孩读书几年了。托氏妻妹回道：

——他？他读的书不少，一直在家里，没进学校，——现在的苏维埃学校，……哼。

他说完忽看见小孩子一面看书，一面手里玩着纸牌呢，掀一掀眼镜，欣欣然抬起双眉，暗中流露那贵族派调的礼貌，他问：

——呀！你们中国有赌具么？我非常之爱玩，你知道，我在巴黎时一夜输多少！——少年妇人插嘴道：“呵！他年轻时才爱赌呢。”中年妇人见我们闲着无事，拿出一大盒照相，托氏当年家庭亲友的肖像，克留摩的风景，末后指着一张学生模样的照片说：“这是我的儿子，唉！真伤心呵！革命时被可恶的布尔塞维克杀了。我们家许多房舍，邸宅，田地一概弄光了。我还坐过三

个月牢狱呢，……呵哎……”托氏妻妹忽然向中年妇人道：

——现在，革命之后，什么事都翻过天地来了。你昨天用心没有：某小姐和那一少年，还有几位，唔，都是年轻女郎，挤坐一张沙发上，一点嫌疑，礼貌也不顾。——正说话时一女郎走来，托氏妻妹起初楞了一楞，仍接下笑着说道：

——不怕你恼，小姐，“说到曹操，曹操就到”，我们正在说你呢。

那女郎看着我们，很不好意思似的，半晌才说道：

——怎么为这样的事发恼呢，我们正盼望有人指教呢……——说着，口齿渐渐模糊，底下的几个字都吞在肚子里去了。

——哎唷唷！现在风俗不成话了。男女同学！男女同学！你们还不知道，现在中学校里男女学生成了什么样子呢！近廿年来的新教育！——中年妇人接着说道：

——你可不要冤枉人，他们几个小姐，倒都不是中学校出身，是受家里的贵族教育。

——可不是！生来世道人心如此，有什么法想。我们年轻时，不用说实际上，那怕没有一件两件风流奇闻；可是终还顾着面子。我就不懂，怎么一二十年变成这样的世界！

——说来也奇怪，为什么在英法“男女同学”就不要紧，我们俄国却不行？

我听着禁不住插嘴道：

——那又更奇怪，我们中国也是这样说：“为什么在外国就不要紧，一到我们中国就不成样子。”

车马预备好了，我们同几位女郎一同坐车往车站去。秋夜雨过，马蹄得得，仰看着流云走月，光芒四射；雨余小寒，凝露满裳，也和清田村中贵族的残梦似的，勉强固结“旧时代的俄国”。

清田村当革命怒潮时，农民中的少壮，哄哄欲动，要瓜分托氏财产田地；老年人念托氏的遗德，不忍动手；后来还是中央政

府派员保护了这历史的伟迹。

六 大学生

十五日晚，本来说晚上二时开车，我们赶到车站，睡下，——一觉醒来，仍旧是清田站。早起奇饿，德维里老者约着下站一行，同到前天过宿的别墅中。和看别墅的农夫商量着，请他去买了些牛乳，煮些马铃薯，就在农夫屋里烧着自暖壶喝茶。主人殷勤询问中国生活。谈及托尔斯泰，主人还说：

——我是托尔斯泰初办学校里的小学生，我还会算加减乘除呢！

主人儿子坐在一旁，手里拿一本俄文启蒙读本；我问他要了看一看，因问现在农村学校怎么样。据说，每天小孩子都去上学，不要学费，“上半天去下半天就回来了！”学习算学，俄文。我试和那小孩子谈谈，小孩子很害臊似的，宛然一中国“乡下孩子”。德维里老者还问许多托氏生时的轶事。主人忽道：

——那又怎么样？托尔斯泰生时，我们去总还有许多书，——我们得了又读着，又卖几个钱。要帮助却难了：有熟人去，一块两块卢布，平常三角五角。

自暖壶水沸了，女主人倒茶给我们，咕噜着道：

——托氏自己是很要帮助人的，都是他夫人横在里面……

我问道：

——革命时，你们分着多少地呢？

——一亩半田。这两年勉强还够。今年又有什么“食粮税”，我们也担负轻些，——一年付三分之一，十二铺德。生活要说宽余是说得呢。我们革命前也从没见过三块卢布以上的钱。现在罢，管着别墅，每月经亚历山大·托尔斯泰的手，由教育委员会得八九十苏维埃卢布，——算得什么，几角钱！

说着话，宗武也从车上带着照相机来了。主人又请他照了一相。村里小孩有的嚷：“来看美国照相机呵！……”我笑向宗武说：

——再想不到中国人到了乡间，变成了西欧文明的宣传者。

主人还说，现时到城里去照一相，出一个月的薪水也不够呢。他又很热烈的送我们走，一面说道：

——我们这两天吃的面包都不够。公社里剩的面包，——现在可以出卖了，——我们去买也得出四五千钱一斤。他们都是大学生，虽说什么集合生产，究竟不大会种田。那四五十亩田，据我看来，还不如分给我们小农好些。……唉！穷人还是穷，富人还是富。……

我们回到车上已是十点多钟。十一点开车，到了都腊，不知怎的又停住了。天色阴沉，又不能下车散步。沉闷得很。回想此游所见，历历犹在心头；一见俄国乡间生活，也有无限感触。

一直等到晚上九点钟，才从都腊开车。

七 归 途

一辆车中，暖暖的炉火，暗暗的车窗，笑语呼吸声中，隐隐的画出三幅杂色斑斓的奇画。——三种不同的文化：

车的南头，坐着几位清纯修洁的女郎，文秀的俄国少年，生意活泼，——都是托氏一家的亲友，贵族的遗裔，——可是他们现时虽已尽成平民，苏维埃机关的办事员，学校的大学生，而贵族式“复不顾人”的派调，无意之中隐隐流露。只听着谈笑自如，深夜起坐，“呀！我一把梳子忘在乡下了，……”“马丽答应借普希金集给我，临走时又忘了，”叽叽喳喳笑语不断。

车中间坐着两位中国人，天色已黑，又不能看书，只是默默的坐着，守那东方式的规矩，偶然有人请他们吃马铃薯，还回说：“谢谢，不要，……不用客气，自己请罢。……”

车的北头，学生旅行队占着，傍晚的时候，男学生取柴，烧炉子，女学生洗碗盏。车开之后，大家围坐猜谜，说笑。十时余，教员说“可以睡觉了”，过不了二十分钟，小学生都已声息俱无。

只听车行震荡，渐渐往莫斯科去。晚上二时光景，车南头忽然烛光一亮，又听得低低谈话，过了几分钟，嬉笑声浪，渐渐放纵。猛听得一小孩子声音说道：

——天晚了，人家要睡觉。请显些文化较高的身份出来……

突然烛影寂灭，车中又只听得均匀的轮轴颤动了。偶然露出一句含糊不明的低语：“谁也不是文化程度高的人……”轮声震厉，再往下也听不清楚了。

酣然一梦，醒来已抵莫斯科苦尔斯克车站。

晓霜晴日，伴着归人，欣欣的喜意，秋早爽健的气概送我们归寓。

清田村一游，令人畅心满意，托尔斯泰——世界的伟大文学家，遗迹芳馨。旧时代的俄国，——贵族遗风还喘息于草间，依稀萦绕残梦。智识阶级的唯心派，新村式的运动，也有稀微印象。俄罗斯的农家生活，浑朴的风俗气息，而经济上还深陷于小资产阶级。平民农夫与智识阶级之间的情感深种社会问题的根蒂，依然显露。智识阶级问题，农民问题经怒潮汹涌的十月革命，冲动了根底，正在自然倾向于解决。——新教育与旧教育的过渡时期。

此游感想如此；其他乡间秋色，怡人情性，农家乐事，更饶诗意，生活的了解似乎不在远处……

十月十八日。

三三 “我”

秋白的“我”，不是旧时代之孝子顺孙，不能为现代“文明”所恶化；固然西欧文化的影响，如潮水一般，冲破中国的“万里长城”而侵入中国生活，然而……然而这一青年的生活自幼混洽世界史上几种文化的色彩，他已经不能确切的证明自己纯粹的“中国性”，而“自我”的修养当有明确的罗针。况且谁也不保存

自己个性抽象的真纯，——环境（亦许就是所谓“社会”）没有不生影响的。

然而个性问题有渊深的内性：有人既发展自我的个性，又能排除一切妨碍他的，主观的，困难环境而进取，屈伸自如，从容自在；或者呢，有人要发展自己的个性，狂暴忿怒面红耳赤的与障碍相斗，以致于失全力于防御斗争中，至于进取的创造力，则反等于零；或者呢，有人不知发展他的个性，整个儿的为“社会”所吞没，绝无表示个性的才能。——这是三种范畴。具体而论，人处于各种民族不同的文化相交流或相冲突之时，在此人类进步的过程中，或能为此过程尽力，同时实现自我的个性，即此增进人类的文化；或盲目固执一民族的文化性，不善融洽适应，自疲其个性，为陈死的旧时代而牺牲；竟或暴露其“无知”，仅知如蝇之附臭，汨没民族的个性，戕贼他的自我，去附庸所谓“新派”。三者之中，能取其那一种？

如此，则我的职任很明瞭。“我将成什么？”盼望“我”成一人人类新文化的胚胎。新文化的基础，本当联合历史上相对待的而现今时代之初又相补助的两种文化：东方与西方。现时两种文化，代表过去时代的，都有危害的病状，一病资产阶级的市侩主义，一病“东方式”的死寂。

“我”不是旧时代之孝子顺孙，而是“新时代”的活泼稚儿。

固然不错，我自然只能当一很小很小无足重轻的小卒，然而始终是积极的奋斗者。

我自是小卒，我却编入世界的文化运动先锋队里，他将开全人类文化的新道路，亦即此足以光复四千余年文物灿烂的中国文化。

“我”的意义：我对社会为个性，民族对世界为个性。

无“我”无社会，无动的我更无社会。无民族性无世界，无动的民族性，更无世界。无社会与世界，无交融合作的，集体而又完整的社会与世界，更无所谓“我”，无所谓民族，无所谓文化。

十二月三日。

三六 “自然”

印度哲人泰果尔说：“希腊文化发生于海隅小城市，——都市的城壁暗示‘占有’的冲动，他视‘自然’为敌；譬如行路的人，以大道为障碍人与目的之间的远度。印度文化发生于森林湿地，——长枝漫叶；起居感受于其中，增长‘融洽’的精神，他视‘自然’为友；譬如行路的人，以大道为人与目的之间的因缘，——实在就是目的的一部分。人与自然，个性与社会的协调，为将来的文化；浓郁的希望，仁爱，一切一切……由忿怒而至于喜乐……”

俄国的白林寒雪，旧文化的激发性也是当然；他视“自然”为邻人；偶然余裕，隔篱闲话家常，——封建遗化农村公社的共同寂静恭顺的生活；有时窘急，邻舍却易生窥伺，——西欧的顽皮学生，市侩主义维新后之传染病。中国的长河平原，感受无限制的坦荡性；他视“自然”为路人；偶然同道而行，即使互相借助，始终痛痒漠然。俄国无个性，中国无社会；一是见有目的，可不十分清晰，行道乱投，屡易轨辙；一是未见目的，从容不迫，无所警策，行道蹒跚，懒于移步。万流交汇，虚涵无量，——未来的黄金世界，不在梦寐，而在觉悟，——觉悟融会现实的忿，怒，喜，乐，激发，坦荡以及一切种种性。

是久远久远的过去话，也许是遥远遥远的将来之声。

人远离包涵万象的自然，舍弃永久的基础，只在人造的铁网间行走，——这或是跳舞矫作姿态时，或是乘橇下峻坡耳；他不得不步步勉力自求保持身量之均势；偶然得一休息地，反暂时感觉一隐隐的傲意：“我对于外界的自然，很能有强力的克服他。”自然，自然，不能永久如此，如此强勉。……

“我”与“非我”相合，方有共同之处可言。“我”与“非

我”相对，只觉个性之独一无二。

如此，不得不有以系连之：“爱”。

儿童酷好玩，诚然不错；然而他假使不知道有“母怀”可返，游玩便成迷失，渐觉可怕；我们个性的高傲，假使不能从“爱”增高其质性，他便成我们的诅咒。

十二月二十四日。

四〇 晓 霞

“军国主义”之下已一月多了，高山疗养院的生活恬静规约，——有时也有精神的疲乏。况且和外界绝对隔离，几同封锁，天天看着灰色的天，白茫茫的雪，怎得不盼望清风朗日，一畅胸襟呢？莫斯科忽然移近东亚——远东大会召集，用得着我这“东方稚儿”，于是出高山——陡然呼吸一舒，好一似长夏清早，登高山而望晓霞。

灰色的短夜，星汉徐移，“沉闷”如飞云一般渐渐吹散，放出些早凉，凝凝的细露，淡淡的晓色，长林丰草间偶然一阵一阵清风，“夜”的威权慢慢地只剩得勉强支持的姿态。小鸟欣欣的相语，蛩虫朦朦的相投，一望远东，紫赤光焰，愈转愈明，炎炎的云苗，莽然由天际直射，轰轰烈烈，光轮轰旋，——呀！晓霞，晓霞！

此时此际，未见烈日，——也许墨云骤掩，光明倏转凄黯，不然也只遥看先兆，离光华尚远；然而可以确信，神明的太阳，有赤色的晓霞为之先声，不久不久，光现宇宙，满于万壑。欣欣之情，震烈之感，不期而自祝晓霞。

寒凛的北国，死寂的严冬，忽然想象烈夏的风光，何等快事！这是回念，这也是预想。可以回念，年年的夏日清早之飞赤，也可以预想，明年后年，暑日初晨之远东——那不都有“晓霞”么？

诚然不错，一九一七年二月以后十月以前，北海之南，芬兰湾之东，亚尔帕山之北，乌拉岭之西，曾染浓艳光赤的晓霞。——现在久现红日了。

远东大会的饭厅里偶然可以遇见革命潮中之过来人。他能和你们讲：

——革命的怒潮，革命的怒潮！呵，如火如荼！现在我能安逸逸生在此，为远东古国诸同志尽一毫助力，——虽然通译的才能或者不足，然而始终有尺寸的功效，心安意逸；那时，那时，二月革命后克伦斯基还要确守协约国的“信约”，造俄罗斯成“战胜的帝国主义的民主共和国”；哼，何苦何苦！我在前敌以一小小的军官，一年多受尽德俄战线壕沟中的地狱生活，不论普通兵士了。于是布尔塞维克的传单如雨的飞下；“不用战争”，“和平与面包”，“不杀我们共同神圣的德奥劳动者，而各自去杀吸我们膏血的老爷们——资产阶级”……军心动摇，长官人人自危，“杀有高级军官肩章的……杀，……杀！”战事的继续，当然非常之困难了。步队已经完全不稳，于是发生有史以来第一的“大逮捕”；里德瓦战线，司令竟只得命马炮队一夜速行逮捕全数步兵八十万人。一队走完，又是一队，垂头丧气的也有，昂面谩骂的也有。——他说到此处，以手抚额，叹了一口气又道：

——我辛苦艰难，“为人作嫁”，干什么？布尔塞维克的口号好：“不用打仗，还乡，还乡！”我也道“还乡”为是。可是当时我们营里紊纷陡起，——凡有肩章的军官，一出自己的营，头就不见；他们决议，各兵士，反对帝国主义爱和平的旧日的农夫，奋起实行革命的口号，各人暂时不杀自己的长官，而相约互杀各人的长官——以免眼前吃亏。我那时想跑不得跑，心胆虚寒，呵，可怕可怕！幸而我兵士感爱我，一直保护到解散前敌时。……布尔塞维克解放了我的军役，始终解放了。……紊乱，紊乱，呵，可怕！那象现时得安坐喝茶呵！

革命怒潮的先声，那正是“天地青”的时候。革命赤日的遥

光，那正是“晓霞”的散彩。群众的伟力，愈抵拒愈激励；不如欢笑相迎。回念，回念，……预想，预想。

一月二十九日，秋白生日。我生的晓霞在此么？

四九 生 活

世界是现实的，人是活的。

生活是“动”，求静的动，然而永不及静的。正负两号在代数中是相消的，在生活中是相集的。进取工作，脑血筋力鼓动膨胀发展时，人觉积极的乐意，——是生活；疲惫怠荡弛缓时，人觉消极的休息，——是死灭。这第一式中虽相对，然而凡“一切动时一切生”。动而向上，动而向下，两端相应，积极消极都是动。所以欣然做工者，憩然休息者，忿然自杀者都在生活中。永不及静，是以永永的生活。

不动不生，又要不死不灭，不工作，不自杀，处于生与死两者之间，是不可能的。

既然如此，“动”而“活”，活而“现实”。现实的世界中，假使不死寂——不自杀，起而为协调的休息与工作，乃真正的生活。

“工作为工作”是无意味的，必定有所得。——其实“为工作的工作”固然有无上的价值，然而也不能说无所得，“动的乐意”即是所得。动的，工作的“所得”之积累联合，相协相合而成文化。文化为“动”——即生活的产儿。文化为“动”——即生活的现实。

所以：——为文化而工作，而动，而求静——故或积累，或灭杀，务令于人生的“梦”中，现现实的世界；凡是现实的都是活的，凡是活的都是现实的；新文化的动的工作，既然纯粹在现实的世界，现实世界中的工作者都在生活中，都是活的人。

三月二十日莫斯科高山疗养院。

那个城

沿着大路走向一个城，——一个小孩子赶赶紧紧的跑着。

那个城躺在地上，好大的建筑都横七竖八的互相枕藉着，仿佛呻吟，又象是挣扎，远远的看来，似乎他刚刚被火，——那血色的火苗还没熄灭，一切亭台楼阁砖石瓦砾都煨得煊红。

黑云的边际也象着了火似的，灿烂的红点煊映着，那是深深的创痕。他放着热烈惨黯的烟苗，扫着将坏未坏的城角。那城呵——无限苦痛斗争，为幸福而斗争的地方——流着鲜红……鲜红的血。

小孩子走着；黄昏黯淡的时分，灰色的道旁，那些树影——沉沉的垂枝，一动不动覆着默然不语的大地：——只隐隐的听着蹬蹬的足音。

天上满布着云，星也不看见，丝毫物影都没有，深晚呵，又悲哀又沉寂。小孩子的足音是唯一的神秘的“动”。四围为什么这样静？——小孩子背后跟着就是无·声·的·夜，披着黑氅，——愈看他愈远。

黄昏已经畏缩，赶紧拥抱一切城头塔顶，雁行的房屋，拥抱在自己的怀里。园圃，树林，烟突；一切一切都渐渐的黑，渐渐的消灭，始终镇压在夜之黑暗里。

他却默然的走着，漠然的看着那个城，脚步也不加快，孤寂，细小……可是似乎那个城却等待着他，他是必须的，人人所渴望的，就是青焰赤苗的火也都等着他。

夕阳——熄灭了。雉堞，塔影，都不见了。城小了些，矮了

《那个城》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初刊于《中国青年》第一集第六期。发表时文前附有记者按：「这是象征的小说。那个城即是俄国大革命，大破坏后的光景，那个小孩即是指的中国。」

些，差不多更紧贴了那哑的大地。

城上喷着光华奇彩，在模模糊糊的雾里。现在他已经不象火烧着，血染着的了。——那些行列不整的屋脊墙影，仿佛含着什么仙境，——可是还没建筑完全，好象是那为人类创造这伟大的城的人已经疲乏了，睡着了，失望了，抛弃了一切而去了，或者丧失了信仰——就此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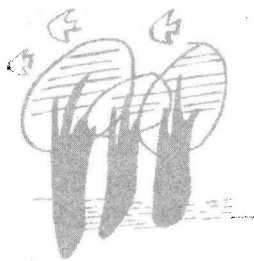
那个城呢——活着，热烈至于晕绝的希望着自己完成仙境，高入云霄，接近那光华的太阳。他渴望生活，美，善；而在四围静默的农田里，奔流着潺湲的溪涧，垂覆在他之上的苍穹又渐渐的映着紫……暗，红的新光。

小孩子站住，掀掀眉，舒舒气，定定心心的，勇勇敢敢的向前看着；一会儿又走起来了，走得更快。

跟在他后面的夜，却低低的，象慈母似的向他说道：

——“是时候了，小孩子，走罢！他们——等着呢……”

读高尔基后。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多余的话

“知我者
谓我心忧；
不知我者
谓我何求。”

何必说？（代序）

话既然是多余的，又何必说呢？已经是走到了生命的尽期，余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份来算，甚〔至〕不能按星期来算了。就是有话，也可说可不说的了。

但是，不幸我卷入了“历史的纠葛”——直到现在外间好些人还以为我是怎样怎样的。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什么主义的；所以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話。

而且，因为“历史的误会”，我十五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正因为勉强，所以也永久做不好，手里做着这个，心里想着那个。在当时是形格势禁，没有余暇和可能说一说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时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现在我已经完全被解除了武装，被拉出了队伍，只剩得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己的冲动和需要：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布尔塞维克所讨厌的小布尔乔亚智识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气，不能够不发

《多余的话》为瞿秋白在福建汀洲狱中所作。一九三五年八月、九月选载于《社会新闻》第十二卷六、七、八期，一九三七年三月五日、二十日、十月五日全文刊载于《逸经》半月刊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期。这里所刊是根据一九九一年十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七卷所附录的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国民政府文学档案手抄本。

作了。

虽然我明知道这里所写的，未必能够到得读者手里，也未必有出版的价值，但是，我还是写一写罢。人往往喜欢谈天，有时候不管听的人是谁，能够乱谈几句，心上也就痛快了。何况我是在绝灭的前夜，这是我最后“谈天”的机会呢？

瞿秋白

一九三五·五·一七于汀州狱中

“历史的误会”

我在母亲自杀家庭离散之后，孑然一身跑到北京，本想能够考进北大，研究中国文学，将来做个教员度这一世，甚么“治国平天下”的大志都是没有的，坏在“读书种子”爱书本子，爱文艺，不能“安分守己的”专心于升官发财。到了北京之后，住在堂兄纯白家里，北大的学膳费也希望他能够帮助我——他却没有这种可能，叫我去考普通文官考试，又没有考上，结果，是挑选一个既不要学费又有“出身”的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去进。这样，我就开始学俄文了（一九一七夏），当时并不知道俄国已经革命，也不知道俄国文学的伟大意义，不过当作将来谋一碗饭吃的本事罢了。

一九一八年开始看了许多新杂志，思想上似乎有相当的进展，新的人生观正在形成。可是，根据我的性格，所形成的与其说是革命思想，无宁说是厌世主义的理智化，所以最早我同郑振铎、瞿世英、耿济之几个朋友组织《新社会》杂志的时候，我是一个近于托尔斯泰派的无政府主义者，而且，根本上我不是一个“政治动物”。五四运动期间，只有极短期的政治活动，不久，因为已经能够查着字典看俄国文学名著，我的注意力就大部分放在文艺方面了，对于政治上的各种主义，都不过略略“涉猎”求得一些现代常识，并没有兴趣去详细研究。然而可以说，这时就开始“历史的误会”了：事情是这样的——五四运动一开始，我就

当了俄文专修馆的总代表之一，当时的一些同学里，谁也不愿意干，结果，我得做这一学校的“政治领袖”，我得组织同学群众去参加当时的政治运动。不久，李大钊、张崧年他们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或是“俄罗斯研究会”罢？），我也因为读了俄文的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的某几段，对于社会——尤其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理想发生了好奇心和研究的兴趣，所以也加入了。这时候大概是一九一九年底一九二〇年初，学生运动正在转变和分化，学生会的工作也没有以前那么热烈了。我就多读了一些书。

最后，有了机会到俄国去了——北京《晨报》要派通信记者到莫斯科去，来找我。我想，看一看那“新国家”尤其是借此机会把俄国文学好好研究一下，的确是一件最惬意的事，于是就动身去（一九二〇年八月）。

最初，的确吃了几个月黑面包，饿了好些时候，后来俄国国内战争停止，新经济政策实行，生活也就宽裕了些。我在这几个月内，请了私人教授，研究俄文、俄国史、俄国文学史。同时，为着应付《晨报》的通信，也很用心看俄国共产党的报纸、文件，调查一些革命事迹，我当时对于共产主义只有同情和相当的了解，并没有想到要加入共产党，更没有心思要自己来做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因为那时候，我误会着加入了党就不能专修文学——学文学仿佛就是不革命的观念，在当时已经通行。

可是，在当时的莫斯科，除我以外，一个俄文翻译都找不到。因此，东方大学开办中国班的时候（一九二一年秋），我就当了东大的翻译和助教；因为职务的关系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不得不研究些，而文艺反而看得少了，不久（一九二二年底），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到莫斯科（那时我已经是共产党员，还是张太雷介绍我进党的），我就当他的翻译。独秀回国的时候，他要我回来工作，我就同了他回到北京。于右任，邓中夏等创办“上海大学”的时候，我正在上海，这是一九二三年夏天，他们请我当上大的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那时，我在党内只兼着一一点宣传工作，编辑《新青年》。

上大初期，我还有余暇研究一些文艺问题，到了国民党改组，我来往上海广州之间，当翻译，参加一些国民党工作（例如上海的国民党中央执行部的委员等），而一九二五年一月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又选举了我的中央委员，这时候就简直完全只能做政治工作了，我的肺病又不时发作，更没有可能从事于我所爱好的文艺。虽然我当时对政治问题还有相当的兴趣，可是有时也会怀念着文艺而“怅然若失”的。

武汉时代的前夜（一九二七年初），我正从重病之中脱险，将近病好的时候，陈独秀、彭述之等的政治主张，逐渐暴露机会主义的实质，一般党员对他们失掉信仰。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上（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间），独秀虽然仍旧被选，但是对于党的领导已经不大行了。武汉的国共分裂之后，独秀就退出中央，那时候没有别人主持，就轮到我主持中央政治局。其实，我虽然在一九二六年年底及一九二七年年年初就发表了一些议论反对彭述之，随后不得不反对陈独秀，可是，我根本上不愿意自己来代替他们——至少是独秀。我确是一种调和派的见解，当时想望着独秀能够纠正他的错误观念不听述之的理论。等到实逼处此，要我“取独秀而代之”，我一开始就觉得非常之“不合式”，但是，又没有什么别的办法。这样我担负了直接的政治领导有一年光景（一九二七年七月到一九二八年五月）。这期间发生了南昌暴动、广州暴动，以及最早的秋收暴动。当时，我的领导在方式上同独秀时代不同了，独秀是事无大小都参加和主持的，我却因为对组织尤其是军事非常不明了也毫无兴趣，所以只发表一般的政治主张，其余调遣人员和实行的具体计划等就完全听组织部军事部去办，那时自己就感觉到空谈的无聊，但是，一转念要退出领导地位，又感得好像是拆台。这样，勉强着自己度过了这一时期。

一九二八年六月间共产党开第六次大会的时候，许多同志反对我，也有许多同志赞成我。我的进退成为党的政治主张的连带问题。所以，我虽然屡次想说：“你们饶了我罢，我实在没有兴

趣和能力负担这个领导工作。”但是，终于没有说出口。当时形势禁，旧干部中没有别人，新干部起来领导的形势还没有成熟，我只得仍旧担着这个名义。可是，事实上六大之后，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者是李立三和向忠发等等，因为他们在国内主持实际工作，而我只在莫斯科当代表当了两年。直到立三的政治路线走上了错误的道路，我回到上海开三中全会（一九三〇年九月底），我更觉得自己的政治能力确实非常薄弱，竟辨别不出立三的错误程度。结果，中央不得不再召集会议——就是四中全会，来开除立三的中央委员，我的政治局委员，新干部起来接替了政治上的最高领导。我当时觉得松了一口气，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五年我居然当了中国共产党领袖之一，最后三年甚至仿佛是最主要的领袖（不过并没有像外间所传说的“总书记”的名义）。

我自己付度着，像我这样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只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结〔积〕习未除”的。对于政治，从一九二七年起就逐渐减少兴趣，到最近一年——在瑞金的一年，实在完全没有兴趣了。工作中是“但求无过”的态度，全国的政治形势实在懒得问。一方面固然是身体衰弱精力短少而表现的十二分疲劳的状态，别方面也是十几年为着“顾全大局”勉强负担一时的政治翻译，政治工作，而一直拖延下来，实在违反我的兴趣和性情的结果，这真是十几年的一场误会，一场噩梦。

我写这些话，决不是要脱卸什么责任——客观上我对共产党或是国民党的“党国”应当负什么责任，我决不推托，也决不能用我主观上的情绪来加以原谅或者减轻。我不过想把我的真情，在死之前，说出来罢了。总之，我其实是一个很平凡的文人，竟虚负了某某党的领袖的声名十来年，这不是“历史的误会”，是什么呢？

脆弱的二元人物

一只羸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辘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一步步的往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实在不能胜任了。我在负责政治领导的时期，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欲罢不能的疲劳使我永久感觉一种无可形容的重压〔压〕。精神上政治的倦怠，使我渴望“甜蜜〔蜜〕的”休息，以致于脑筋麻木停止一切种种思想。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共产党四中全会开除了我的政治局委员之后，我的精神状态的确是“心中空无所有”的情形，直到现在还是如此。

我不过刚满三十六岁（虽然照阴历的习惯算我今年是三十八岁），但是自己觉得已经非常的衰惫，丝毫青年壮年的兴趣都没有了。不但一般的政治问题懒得去思索，就是一切娱乐甚至风景都是漠不相关的了。本来我从一九一九年就得了吐血病，一直没有好好医治的机会，肺结核的发展曾经在一九二六年走到最危险的阶段，那年幸而勉强医好了，可是立即赶到武汉去，立即又是半年最忙碌紧张的工作。虽然现在肺病的最危险期逃过了，而身体根本弄坏了，虚弱得简直是一个废人。从一九二〇年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十年——除却躺在床上不能行动神智昏聩的几天以外——我的脑筋从没有得到休息的日子。在负责时期，神经的紧张自然是很厉害的，往往十天八天连续的不安眠，为着写一篇政治论文或者报告。这继续十几年的不休息，也许是我精神疲劳和十分厉害的神经衰弱的原因。然而究竟我离得衰老时期还很远，这十几年的辛劳，确实算起来，也不能说怎么了不得，而我竟〔成〕了颓丧残废的废人。我是多么脆弱、多么不禁磨炼啊！

或者，这不仅是身体本来不强壮，所谓“先天不足”的原因罢。

我虽然到了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很贫苦了；可是我的家庭世代是所谓“衣租食税”的绅士阶级，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我五

六岁的时候，我的叔祖瞿睿韶还在湖北布政司使任上，他死的时候正署理了湖北巡抚。因此我家的田地房屋虽然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完全卖尽，而我小的时候，却靠着叔祖伯父的官俸过了好几年十足的少爷生活。绅士的体面“必须”继续维持。我母亲宁可自杀而求得我们兄弟继续读书的可能；而且我母亲因为穷而自杀的时候，家里往往没有米煮饭的时候，我们还用着一个仆妇（积欠了她几个月的工资到现在还没有还清），我们从没有亲手洗过衣服，烧过一次饭。

直到那样的时候，为着要穿长衫，在母亲死后，还剩下四十多元的裁缝债，要用残余的木器去抵账。我的绅士意识——就算是深深潜伏着表面不容易觉察罢——其实是始终没脱掉的。

同时，我二十一二岁，正当所谓人生观形成的时期，理智方面是从托尔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很快就转到了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或是主义，这是一种思想方法——所谓思路；既然走上了这条思路，却不是轻易就能改换的。而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这同我潜伏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完全处于敌对的位置；没落的中国绅士阶级意识之中，有些这样的成分：例如假惺惺的仁慈礼让，避免斗争……以至寄生虫式的隐士思想。完全破产的绅士往往变成城市的波希米亚——高等游民，颓废的，脆弱的，浪漫的，甚至狂妄的人物，说得实在些，是废物。我想，这两种意识在我内心里不断的斗争，也就侵蚀了我极大部分的精力。我得时时刻刻压制自己的绅士和游民式的情感，极勉强的用我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智来创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觉方法。可是无产阶级意识在我的内心是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的。

当我出席政治会议，我就会“就事论事”，抛开我自己的“感觉”专就我所知道的那一点理论去推翻一个问题，决定一种政策等等。但是我一直觉得这种工作是“替别人做的”，我每次开会或者做文章的时候，都觉得很麻烦，总在急于结束，好

“回到自己那里去”休息。我每每幻想着：我愿意到随便一个小市镇上去当一个教员，并不是为着发展什么教育，只不过求得一口饱饭罢了，在余的时候，读读自己所爱读的书，文艺、小说、诗词、歌曲之类，这不是很逍遥的吗？

这种二元化的人格，我自己早已发着〔觉〕——到去年更是完完全全了解了，已经不能够丝毫自欺的了；但是八七会议之后我没有公开的说出来，四中全会之后也没有说出来，在去年我还是决断不下，一至延迟下来，隐忍着。甚至对之华（我的爱人）也只偶然露一点口风，往往还要加一番弥缝的话。没有这样的勇气。

可是真相是始终要暴露的，“二元”之中总有“一元”要取得实际上的胜利。正因为我的政治上的疲劳、倦怠，内心的思想斗争不能再持续了，老实说，在四中全会之后，我早已成为十足的市侩——对于政治问题我竭力避免发表意见，中央怎样说，我就依着怎样说，认为我说错了，我立刻承认错误，也没有什么心思去辩白，说我是机会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好了；一切工作只要交代得过去就算了。我对于政治和党的种种问题，真没有兴趣去注意和研究。只因为久年的“文字因缘”，对于现代文学以及文学史上的各种有趣的问题，有时候还有点兴趣去思考一下，然而大半也是欣赏的份数居多，而研究分析的份数较少。而且体力的衰弱也不容许我多所思索了。

体力上的感觉是：每天只要用脑到两三小时以上，就觉得十分疲劳，或者过分的畸形的兴奋——无所谓的兴奋，以至于不能睡觉，脑痛……冷汗。

唉，脆弱的人呵，所谓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需要这种东西干吗？！我想，假定我还保存这多余的生命若干时候，我只有拒绝用脑的一个方法，我只做些不用自出心裁的文字工作，“以度余年”。但是，最好是趁早结束了罢。

我和马克思主义

当我开始我的社会生活的时候，正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的浪潮非常汹涌的时期。为着继续深入的研究俄国文学，我刚好又不能不到世界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去。我那时的思想是很紊乱的：十六七岁时开始读了些老庄之类的子书，随后是宋儒语录，随后是佛经、《大乘起信论》——直到胡适之的《哲学史大纲》，梁漱溟〔漱溟〕的印度哲学，还有当时出版的一些科学理论，文艺评论。在到俄国之前，固然已经读过倍倍尔的著作，共产党宣言之类，极少几本马克思主义的书籍，然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是根本说不上。

而且，我很小的时候，就不知怎样有一个古怪的想头。为什么每一个读书人都要去“治国平天下”呢？各人找一种学问或是文艺研究一下不好吗？所以我到俄国之后，虽然因为职务的关系时常得读些列宁他们的著作、论文演讲，可是这不过求得对于俄国革命和国际形势的常识，并没有认真去研究政治上一切种种主义，正是“治国平天下”的各种不同的脉案和药方。我根本不想做“王者之师”，不想做“诸葛亮”——这些事自然有别人去干——我也就不去深究了。不过，我对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却比较有兴趣。

记得当时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同样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会、心上就很安慰了，因为这同我当初的无政府主义，和平博爱世界的幻想没有冲突了。所不同的是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要达到这样的最终目的，客观上无论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锐的阶级斗争，以至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统治国家的一个阶段。为着要消灭“国家”，一定要先组织一时期的新式国家，为着要实现最彻底的民权主义（也就是无所谓民权的社会），一定要先实行无产阶级的民权。这表面上“自相矛盾”而实际上很有道理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所谓辩证法

——使我很觉得有趣。我大致了解了这问题，就搁下了，专心去研究俄文，至少有大半年，我没有功夫去管什么主义不主义。

后来，莫斯科东方大学要我当翻译，才没有办法又打起精神去看那一些书。谁知越到后来就越没有功夫继续研究文学，不久就宣〔喧〕宾夺主了。

但是，我第一次在俄国不过两年，真正用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不过半年，这是随着东大课程上的需要看一些书，明天要译经济学上的那一段，今天晚上先看过一道，作为预备，其他，唯物史观哲学等等也是如此，这绝不是有系统的研究。至于第二次我到俄国（一九二八——一九三〇），那是当着共产党的代表，每天开会，解决问题，忙个不了，更没有功夫做有系统的学术上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部分：唯物论的哲学，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的理论，以及政治经济学，我都没有系统的研究过。资本论——我就根本没有读过，尤其对于经济学我没有兴趣。我的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常识，差不多都是从报章杂志上的零星论文和列宁的几本小册子上得来的。

可是，在一九二三年的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以至一般社会科学的人，还少得很，因此，仅仅因此，我担任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之后就逐渐的偷到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的虚名。其实，我对这些学问，的确只知道一点皮毛。当时我只是根据几本外国文的书籍传译一下，编了一些讲义。现在看起来，是十分幼稚，错误百出的东西。现在已经有许多新进的青年，许多比较有系统的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而且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水平也提高了许多。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误会”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的现代社会，部分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发端，也不得不由我来开始尝试。五四以后的五年中间，记得只有陈独秀，戴季陶，李汉俊几个人写过几篇关乎这个问题的论文，可是都是无关重要的。我回国之后，因为已经在党内工作，虽然只有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

智识，却不由我不开始这个尝试：分析中国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程度，分析中国社会阶级分化的性质，阶级斗争的形势，阶级斗争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等等。

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七年，我在这方面的的工作，自然在全党同志的督促，实际斗争的反映，以及国际的领导之下，逐渐有相当的进步。这决不是我一个人的工作，越到后来，我的参加是越少。单就我的“成绩”而论，现在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可明显的看见：我在当时所做的理论上的错误，共产党怎样纠正了我的错误，以及我的幼稚的理〔论〕著之中包含着怎样混杂和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成分。

这些机会主义的成分发展起来，就形成错误的政治路线，以致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不能不开除我的政治局委员，的确，到一九三〇年，我虽然在国际参加了两年的政治工作，相当得到一些新的智识，受到一些政治上的锻炼，但是，不但不进步，自己觉得反而退步了。中国的阶级斗争早已进入了更高的阶段，对于中国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形势，需要更深刻更复杂的分析，更明了的判断，而我的那点智识绝对不够，而且非无产阶级的反布尔塞维克的意识就完全暴露了，当时，我逐渐觉得许多问题不但想不通，甚至想不动了。新的领导者发挥某些问题的议论之后，我会感觉到松快，觉得这样解决原是最适当不过的，我当初为什么简直想不到；但是，也有时候会觉得不了解。

此后，我勉强自己去想一切“治国平天下”的大问题的必要，已经没有了！我在十分疲劳和吐血症复发的期间，就不再去“独立思索”了。一九三一年初就开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极时期，直到现在。从那时候起，我没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这并不是说我是一个很好的模范党员，对于中央的理论政策都完全而深刻的了解。相反的，我正是一个最坏的党员，早就值得开除的，因为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加思索了。偶然我也有对中央政策怀疑的时候，但是，立刻就停止怀疑了，因为怀疑也是一种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怀

疑了。

我的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智识，曾经在当时起过一些作用——好的坏的影响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不用我自己来判断——而到了现在，我已经在政治上死灭，不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了。

同时要说我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不确的。如果要同我谈起一切种种政治问题，我除开根据我那一点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方法来推论以外，却又没有什么别的方法。事实上我这些推论又恐怕包含着许多机会主义，也就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在内，这是“亦未可知”的。因此我更不必枉然费力去思索：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时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同时，这思路却同非马克思主义的歧路交错着，再自由任意的走去，不会跑到什么地方去。——而最主要的是我没有气力再跑了，我根本没有精力再作政治的，社会科学的思索了。Stop。

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

当我不得不担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的时候，正是中国革命进到了最巨大的转变和震荡的时代，这就是武汉时代结束之后。分析新的形势，确定新的政策，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阶级斗争最复杂最剧烈的〔路〕线汇合分化转变的时期，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当时，许多同志和我，多多少少都做了政治上的错误，同时，更有许多以前的同志在这阶级斗争更进一步的关口，自觉的或者不自觉的离开了革命队伍，在最初，我们在党的领导之下所决定的政策一般的是正确的。武汉分共之后，我们接着就决定贺叶的南昌暴动和两湖、广东的秋收暴动（一九二七），到十一月又决定广州暴动。这些暴动本身无〔并〕不是什么盲动主义，因为都有相当的群众基础。固然，中国一般的革命形势，从一九二七年三月底英、义〔美〕、日帝国主义者炮轰南京威胁国民党反共以后，就已经开始低落，但是接着而来的武汉政府中

的奋斗、分裂……直到广州暴动的举出苏维埃旗帜，都还是革命势力方面正当的挽回局势的尝试，结果失败了——就是说没有能够把革命形势重新转变到高涨的阵容，必须另起炉灶。而我——这时期当然我应当负主要的责任——在一九二八年初，广州暴动失败以后，仍旧认为革命形势一般存在，而且继续高涨，这就〔是〕盲动主义的路线了。

原本个别的盲动现象我们和当时的中央从一九二七年十月起就表示反对的；对于有些党部不努力去领导和争取群众，反而孤注一掷或者仅仅去暗杀豪绅之类的行动，我们总是加以纠正的。可是，因为当时整个路线错误，所以不管主观上怎样了解盲动主义现象的不好，费力于枝枝节节的纠正，客观上却在领导着盲动主义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纠正了这个错误路线，使政策走上了正确的道路。自然，武汉时代之后，我们所得到的中国革命之中的最重要的教训，例如革命有在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可能和前途，反帝国主义革命最密切的和土地革命联系着等，都是六大所采纳的。苏维埃革命的方针就在六大更明确的规定下来。

但是以我个人而论，在那时候，我的观点之中不仅有过分估量革命形势的发展以致助长盲动主义的错误，对于中国农民阶级的分析，认为富农还在革命战线之内，认为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在有些大城市取得暴动的胜利等观念也已经潜伏着或者有所表示。不过，同志们都没有发觉这些观点的严重错误，还没有指出来，我自己当然更不会知道这些是错误的。直到一九二九年秋天讨论农民问题的时候，才开始暴露我在农民问题上的错误。不幸得很，当时没有更深刻的更无情的揭发。……

此后，就来了立三路线的问题了。

一九二九年年底我还在莫斯科的时候，就听说立三和忠发的政策有许多不妥当的地方。同时，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前称孙中山大学）的学生中间发生非常剧烈的斗争，我向来没有知人之明，只想弥缝缓和这些内斗，觉得互相攻许〔讦〕批评的许多同

志都是好的，听他们所说的事情却往往有些非常出奇，似乎都是故意夸大事实俾为“打倒”对方的理由。因此我就站在调和的立场。这使得那里的党部认为我恰好是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结果撤销了我的中国共产党驻莫代表的职务准备回国。自然，在回国的任务之中，最重要的是纠正立三的错误，消灭莫斯科中国同志之间的派别观念对于国内同志的影响。

但是，事实上我什么也没做到，立三的错误在那时——一九三〇年夏天——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半托洛斯基的路线，派别观念也使得党内到处抑制莫斯科回国的新干部。而我回来之后召集的三中全会，以及中央的一切处置，都只是零零碎碎的纠正了立三的一些显而易见的错误，既没有指出立三的错误路线，更没有在组织上和一切计划及实际工作上保障国际路线的执行。实际上我的确没有认出立三路线和国际路线的根本不同。

老实说，立三路线是我的许多错误观念——有人说是瞿秋白主义——的逻辑的发展。立三的错误政策可以说是一种失败主义，他表面上认为中国全国的革命胜利的局面已经到来，这会推动全世界革命的成功，其实是觉的自己没有把握保持和发展苏维埃革命在几个县区的胜利，觉的革命前途不是立即向大城市发展而取得全国胜利以至全世界的胜利，就是迅速的败亡，所以要孤注一掷的拼命，这是用左倾空谈来掩盖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因此在组织上，在实际工作上，在土地革命的理论，在工会运动的方针上，在青年运动和青年组织等等各种问题上……无往而不错。我在当时却辨别不出来。事后我可以说，假定六大之后，留在中国直接领导的不是立三而是我，那末，在实际上我也会走到这样的错误路线，不过不致于像立三这样鲁莽，也可以说，不会有立三那样的勇气。我当然间接的负着立三路线的责任。

于是四中全会后，就决定了开除立三的中央委员，开除我的政治局的委员。我呢，像上面已经说过的，正感谢这一开除，使我卸除了千钧担。我第二次回国是一九三〇年八月中旬，到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我就离开了中央政治领导机关，这期间只有半年

不到的时间。可是这半年对于我几乎比五十年还长！人的精力已经像完全用尽了似的，我告了长假休养医病——事实上从此脱离了政治舞台。

再想回头来干一些别的事情，例如文艺的译著等，已经觉得太迟了！从一九二〇到一九三〇整整十年我离开了“自己的家”——我所愿意干的俄国文学研究——到这时候才回来，不但田园荒芜，而且自己的气力也已经衰惫了。自然有可能还是可以干一干，“以度余年”的。可惜接着就是大病，时发时止，耗费了三年光阴。一九三四年一月，为着在上海养病的不可能，又跑到瑞金——到瑞金已是二月五日了——担任了人民委员的清闲职务。可是，既然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负了一部的工作，虽然不必出席党的中央会议，不必参与一切政策的最初讨论和决定，然而要完全不问政治却又办不到了，我就在敷衍塞责，厌倦着政治却又不得不略为问一问政治的状态〔态〕中间，过了一年。

最后这四年中间，我似乎记得还做了几次政治问题上的错误。但是现在我连内容都记不清楚了，大概总是我的老机会主义发作罢了。我自己不愿意有什么和中央不同的政见。我总是立刻“放弃”这些错误的见解，其实我连想也没有仔细想，不过觉的争辩〔辩〕起〔来〕太麻烦了，既然无关紧要就算了罢。

我的政治生命其实早已结束了。

最后这四年，还能说我继续在为马克思主义奋斗，为苏维埃革命奋斗，为着党的正确路线奋斗吗？例行公事办了一些，说“奋斗”是实太恭维了。以前几年的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的责任，却决不当因此而减轻的，相反，在共产党的观点上来看，这个责任倒是更加重了，历史的事实是抹杀〔煞〕不了的，我愿意受历史的最公开的裁判。

一九三五·五·二十。

“文 人”

“一为文人便无足观”，这是清朝一个汉学家说的。的确所谓“文人”正是无所用之的人物。这并不是现代意义的文学家、作家或是文艺评论家，这是咏风弄月的“名士”，或者是……说简单些，读书的高等游民，他什么都懂得一点，可是一点没有真实的智识。正因为他对于当代学术水平以上的各种学问都有少许的常识，所以他自以为是学术界的人，可是，他对任何一种学问都没有系统的研究，真正的心得，所以他对于学术是不会有贡献的，对于文艺也不会有什么成就的。

自然，文人也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典型，但是大都实际上是高等游民罢了。假使你是一个医生，或是工程师，化学技师……真正的作家，你自己会感觉到每天生活的价值，你能够创造或是修补一点什么，只要你愿意。就算你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罢，你可以做错误，但是也会改正错误，你可以坚持你的错误，但是也会认真的为着自己的见解去斗争，实行。只有文人就没有希望了，他往往连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做的是什么！

“文人”是中国中世纪的残余和“遗产”——一份很坏的遗产。我相信，再过十年八年没有这一种智识〔分〕子了。

不幸，我自己不能够否认自己正是“文人”之中的一种。

固然，中国的旧书，十三经、二十四史、子书、笔记、丛书、诗词曲等，我都看过一些，但是我是抓到就看，忽然想起就看，没有什么研究的。一些科学论文，马克思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我也看过一些，虽然很少。所以这些新新旧旧的书对于我，与其说是智识的来源，不如说是消闲的工具。究竟在那一种学问上，我有点真实的智识？我自己是回答不出的。

可笑得很，我做过所谓“杀人放火”的共产党的领袖(?)，可是，我却是一个最懦怯的，“婆婆妈妈的”，杀一只老鼠都不会的，不敢的。

但是，真正的懦怯不在这里。首先是差不多完全没有自信力，每一个见解都是动摇的，站不稳的。总希望有一个依靠，记得布哈林初次和我谈话的时候，说过这么一句俏皮话：“你怎么同三层楼的小姐〔一样〕，总那么客气，说起话来，不是‘或是’，就是‘也许’，‘也难说’……等。”其实，这倒是真心话。可惜的是人家往往把我的坦白当作“客气”或者“狡猾”。

我向来没有为着自己的见解而奋斗的勇气，同时，也很久没有承认自己错误的勇气。当一种意见发表之后，看看没有有力的赞助，立刻就会怀疑起来，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另外的意见来代替，那就只会照着这个连自己也怀疑的意见做去。看见一种不大好的现象，或是不正确的见解，却还没有人出来指责，甚至其势凶凶〔汹汹〕的大家认为这是很好的事情，我也始终没有勇气说出自己的怀疑来。优柔寡断，随波逐流，是这种“文人”必然的性格。

虽然人家看见我参加过几次大的辩论，有时候仿佛很急〔激〕烈，其实我是最怕争论的。我向来觉得对方说的话“也对”，“也有几分理由”，“站在对方的观点上他当然是对的”。我似乎很懂得孔夫子忠恕之道。所以我毕竟做了“调和派”的领袖。假使我急〔激〕烈的辩论，那么，不是认为“既然站在布尔塞维克的队伍里就不应当调和”，因此勉强着自己，就是没有抛开“体面”立刻承认错误的勇气，或者是对方的话太幼稚了，使我“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其实最理想的世界是大家不要争论，“和和气气的过日子”。

我有许多标本的“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讲和气，希望大家安静些仁慈些等等。固然从〔少〕年时候起，我就憎恶贪污、卑鄙……以至一切恶浊的社会现象，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做

侠客。我只愿意自己不做那些罪恶，有可能呢，去劝劝他们不要再那样做；没有可能呢，让他们去罢，他们也有他们的不得已的苦衷罢？

我的根本性格，我想，不但不足以锻炼成布尔塞维克的战士，甚至不配做一个起码的革命者。仅仅为着“体面”，所以既然卷进了这个队伍，也就没有勇气自己认识自己，而请他们把我洗刷出去。

但是我想，如果叫我做一个“戏子”——舞台上的演员，倒很会有些成绩，因为十几年我一直觉得自己一直在扮演一定的角色。扮觉〔着〕大学教授，扮着政治家，也会真正忘记自己而完全成为“剧中人”。虽然这对于我很苦，得每天盼望着散会，盼望同我谈政治的朋友走开，让我卸下戏装，还我本来面目——躺在床上去极疲乏的念着“回‘家’去罢，回‘家’去罢”，这的确是很苦的。然而在舞台上的时候，大致总还扮得不差，像煞有介事的。

为甚么？因为青年精力比较旺盛的时候，一点游戏和做事的兴会总有的。即使不是你自己的事，当你把它做好的时候，你也感觉到一时的愉快。譬如你有点小聪明，你会摆好几幅“七巧版〔板〕图”或者“益智图”，你当时一定觉得痛快；正像在中学校的时候，你算出了几个代数难题似的，虽则你并不预备做数学家。

不过扮演舞台上的角色究竟不是“自己的生活”，精力消耗有〔在〕这里甚至完全用尽，始终是后悔也来不及的事情。等到精力衰惫的时候，对于政治舞台，实在是十分厌倦了。

庞杂而无秩序的一些书本上的智识和累坠〔赘〕而反乎自己兴趣的政治生活，使我麻木起来，感觉生活的乏味。

本来，书生对于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都不会有亲切的了解。往往会把自己变成一大堆抽象名词的化身。一切都有一个“名

词”，但是没有实感。譬如说，劳动者的生活，剥削，斗争精神，土地革命，政权等……一直到春花秋月，崦嵫，委蛇，一切种种名词，概念，词藻，说是会说的，等到追问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就会感觉到模糊起来。

对于实际生活，总像雾里看花似的，隔着一层膜。

文人和书生大致没有任何一种具体的智识。他样样都懂得一点，其实样样都是外行。要他开口议论一些“国家大事”，在不太复杂和具体的时候，他也许会。但是，叫他修理一辆汽车，或者配一剂药方，办一个合作社，买一批货物，或是清理一本账目，再不然，叫他办好一个学校……总之，无论那一件具体而切实的事情，他都会觉得没有把握的。

例如，最近一年来，叫我办苏维埃的教育。固然，在瑞金、宁都、兴国这一带的所谓“中央苏区”，原本是文化非常落后的地方，譬如一张白纸，在刚刚着手办教育的时候，只是创办义务小学校，开办几个师范学校，这些都做了。但是，自己仔细想一想，对于这些小学校和师范学校，小学教育和儿童教育的特殊问题，尤其是国内战争中工农群众教育的特殊问题，都实在没有相当的智识，甚至普通常识都不够！

近年来感觉到这一切种种，很愿意“回过去再生活一遍”。

雾里看花的隔膜的感觉，使人觉得异常的苦闷、寂寞和孤独，很想仔细的亲切的尝试一下实际生活的味道。譬如“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已经有三四年，农民的私人日常生活究竟有了怎样的具体变化，他们究竟是怎样的感觉。我曾经去考察过一两次。一开口就没有“共同的言语”，而且自己也懒惰得很，所以终于一无所得。

可是，自然而然的，我学着比较精细的考察人物，领会一切“现象”。我近年来重新来读一些中国和西欧的文学名著，觉得有

些新的印象。你从这些著作中间，可以相当亲切的了解人生和社会，了解各种不同的个性，而不是笼统的“好人”、“坏人”，或是“官僚”、“平民”、“工人”、“富农”等等。摆在你面前的是有血有肉有个性的人，虽则这些人都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一定的阶级之中。

我想，这也许是从“文人”进到真正了解文艺的初步了。

是不是太迟了呢？太迟了！

徒然抱着对文艺的爱好和怀念，起先是自己的头脑，和身体被“外物”所占领了，后来是非常的疲乏笼罩了我三四年，始终没有在文艺方面认真的用力。书是乱七八糟着〔看〕了一些，也许走进了现代文艺水平线以上的境界，不致于辨别不出趣味的高低。我曾经发表的一些文艺方面的意见，都驳杂得很，也是一知半解的。

时候过得很快。一切都荒疏了。眼高手低是这必然的结果。自己写的东西——类似于文艺的东西是不能使自己满意的，我至多不过是一个“读者”。

讲到我仅有的一点具体智识，那就只有俄国文罢。假使能够仔细而郑重的，极忠实的翻译几本俄国文学名著，在汉文方面每字每句的斟酌着也许不会“误人子弟”的。这一个最愉快的梦想，也比在创作和评论方面再来开始求得什么成就，要实际得多。可惜，恐怕现在这个可能已经“过时”了。

告 别

一出滑稽剧就此闭幕了！

我家乡有句俗话，叫做“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窠”。这窠是始终做不成的。一个平凡甚至无聊的“文人”，却要他担负几年的“政治领袖”的职务。这虽然可笑，却是事实。这期间，一切

好事都不是由于他的功劳——实在是由于当时几位负责同志的实际工作，他的空谈不过是表面的点缀，甚至早就埋伏了后来的祸害。这历史的功罪，现在到了最终结算的时候了。

你们去算账罢，你们在斗争中勇猛精进着，我可以羡慕你们，祝贺你们，但是已经不能够跟随你们了。我不觉得可惜，同样我也不觉得后悔，虽然我枉费一生心力在我所不感兴味的政治上。过去的是已经过去了，懊悔徒然增加现在的烦恼。应当清洗出队伍的，终究应当清洗出去，而且愈好〔快〕愈好，更用不着可惜。

我已经退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的队伍，已经停止了政治斗争，放下了武器，假使你们——共产党的同志们——能够早些听到我这里写的一切，那我想早就应当开除我的党籍。像我这样脆弱的人物，敷衍、消极、怠惰的分子，尤其重要的是空洞的承认自己错误而根本不能够转变自己的阶级意识和情绪，而且，因为“历史的偶然”，这并不是一个普通党员，而是曾经当过政治局委员的——这样的人，如何还不要开除呢！

现在，我已经是国民党的俘虏，再来说起这些似乎多余的了。但是，其实不是一样吗？我自由不自由，同样是不能够继续斗争的了。虽然我现在才快要结束我的生命，可是我早已结束了我的政治生活。严格的讲，不论我自由不自由，你们早就有权利认为我也是叛徒的一种。如果不幸而我没有机会告诉你们我的最坦白最真实的态度而骤然死了，那你们也许还把我当做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记得一九三二年讹传我死的时候，有地方替我开了追悼会，当然还念起我的“好处”，我到苏区听到这个消息，真叫我不寒而栗，以叛徒而冒充烈士，实在太那么个了。因此，虽然我现在已经囚在监狱里，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做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我骗着我一个人的身后不要紧，叫革命同志误认叛徒为烈士却是大大不应该的。所以虽然反正是一死，同样是结束我的生命，而我决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

永别了，亲爱的同志们！——这是我最后叫你们“同志”的一次。我是不配再叫你们“同志”的了，告诉你们：我实质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很久了。

唉！历史的误会叫我这“文人”勉强在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混了好些年。我的脱离队伍，不简单的因为我要结束我的生命，结束这一出滑稽剧，也不简单的因为我的痼疾和衰惫，而是因为我始终不能够克服自己的绅士意识，我终究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

永别了，亲爱的朋友们！七八年来，我早已感觉到万分的厌倦。这种疲乏的感觉，有时候例如一九三〇年初或是一九三四年八九月间，简直厉害到无可形容，无可忍受的地步。我当时觉着，不管全宇宙的毁灭不毁灭，不管革命还是反革命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好了，现在已经有了“永久休息”的机会。

我留下这几页给你们——我的最后的最坦白的老实话，永别了！判断一切的，当然是你们，而不是我。我只要休息。

一生没有什么朋友，亲爱的人是很少的几个。而且除开我的之华以外，我对你们也始终不是完全坦白的。就是对于之华，我也只露一点口风。我始终戴着假面具。我早已说过：揭穿假面具是最痛快的事情，不但对于动手去揭穿别人的痛快，就是对于被揭穿的也很痛快，尤其是自己能够揭穿。现在我丢掉了最后一层假面具。你们应当祝贺我。我去休息了，永久休息了，你们更应当祝贺我。

我时常说：感觉到十年二十年没有睡觉似的疲劳，现在可以得到永久的“伟大的”可爱的睡眠了。

从我的一生，也许可以得到一个教训：要磨炼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种种“异己的”意识以至最微细的“异己的”情感，然后才能从“异己的”阶级里完全跳出来，而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里站稳自己的脚步。否则，不免是“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窠”，不免是一出滑稽剧。

我这滑稽剧是要闭幕了。

我留恋什么？我最亲爱的人，我曾经依傍着她度过了这十年的生命。是的，我不能没有依傍。不但在政治生活里，我其实从没有做过一切斗争的先锋，每次总要先找着某种依傍。不但如此，就是在私生活里，我也没有“生存竞争”的勇气，我不会组织自己的生活，我不会做极简单极平常的琐事。我一直是依傍着我的亲人，我唯一的亲人。我如何不留恋？我只觉得十分的难受，因为我许多次对不起我这个亲人，尤其是我的精神上的懦弱，使我对于她也终究没有彻底的坦白，但愿她从此厌恶我，忘记我，使我心安罢。

我还留恋什么？这美丽世界的欣欣向荣的儿童。“我的”女儿，以及一切幸福的孩子们。我替他们祝福。

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那么雄伟的工厂和烟囱，月亮的光似乎也比从前更光明了。

但是，永别了，美丽的世界！

一生的精力已经用尽。剩下的一个躯壳。

如果我还有可能支配我的躯壳，我愿意把它交给医学校的解剖室〔室〕。听说中国的医学校和医院的实习室很缺乏这种科学实验用具。而且我是多年的肺结核者（从一九一九年到现在），时好时坏，也曾经到〔照〕过几次 X 光的照片，一九三一年春的那一次，我看见我的肺部有许多瘢痕，可是医生也说不出精确的判断。假定先照过一张，然后把这躯壳解剖开来，对着照片研究肺部的状态那一定可以发见一些什么。这对于肺结核的诊断也许有些帮助。虽然，我对医学是完全外行。这话说得或许是很可笑的。

总之，滑稽剧始终是闭幕了。舞台上空空洞洞的。有什么留恋也是枉然的了。好在得到的是“伟大的”休息。至于躯壳，也许不由我自己作主了。

告别了，这世界的一切。

最后……

俄国高尔基的《四十年》、《克里摩·萨摩京的生活》，屠格涅夫的《鲁定》，托尔斯泰的《安娜·卡里宁娜》，中国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动摇》，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很可以再读一读。

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

永别了！

一九三五·五·二二。



乱 弹（代序）

中国绅士的黄金时代，曾经有过自己的艺术。譬如“乾嘉之世”，或者更神秘些，“唐虞三代”。可是，要说咱们末世还记得“流风余韵”的，那还是说得近些罢。三代的“韶乐”，现在即使没有失传，至多也不过给吃租阶级的大魔王做做“配享”，例如上海第一名大市民哈同大出丧的时候，曾经用过“韶乐”；至于小市民，那是轮不到的了。倒是三代而下的乾嘉之世的“昆曲”，却跑到了上海的无线电里。这一个中国的“国粹”居然也发扬而光大起来了。不但第一名市民，就是第五六名等等，也可以偶然的欣赏欣赏。

“市民”（citizen）是所谓自由的公民，这是和“奴隶”对待的名称。中国现在，只有所谓“绅商”才配叫做市民。但是，绅商和绅士已经不同了。商与士一字之差，在时间上至少隔了一世纪。而昆曲却不是绅商的艺术，而正是绅士等级的艺术。这老老实实在中国旧式绅士等级的艺术，而不仅是地主阶级的艺术。固然，乾嘉之世的绅士之中已经搀杂了些盐商“狙侏”，——郑板桥之类的名士所瞧不起的；然而，他们始终也是盐官儿，至少也是类似于官的“准官儿”，他们也总要弄些身份，——例如：屁股可以不挨打，见官可以用大红名片的身份。总之，一定要加入那个绅士等级。当时，绅士等级的艺术，什么诗古文词，什么昆曲，都是和平民等级的艺术截然的分开的。昆曲原本是平民等级的歌曲里发展出来的。最早的元曲几乎都是“下流的俗话”。可是，到了乾嘉之世，昆曲里面，早就给贵族绅士的文人，填塞了

一大堆一大堆牛屎似的“恒钉”进去！这还是戏台上的歌剧吗？对不起，先要问一问：这所谓戏台是个什么样的戏台？这已经绝对不是草台班的戏台！昆曲已经被贵族绅士霸占了去，成了绅士等级的艺术。

听罢！昆曲的声调是多么细腻，多么悠扬，多么转仄，多么深奥。其实，那样的猥琐，那样的低微，真象它的主人的身份。昆曲的唱工是要拗转了嗓子，分辨着声母介母韵母，咬准那平上去入，甚至于阴上阳上阴去阳去……中国的四方块之谜画似的汉字，在这里用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去束缚音乐和歌曲的发展，弄得简直不象活人嗓子里唱出来的东西。这的确确是所谓“红氍毹上”的歌曲。在绅士的第宅——“状元及第”之第——里面有这么三开间或者五开间的花厅，一头铺上两丈开阔的红地毯，这就算戏台了。“戏台”前面三四步路的光景，就是听戏的大人老爷的座位，再后去十几步，二十步光景，是太太小姐“垂帘听曲”的地方。自然，这里可以听得清平上去入。而且唱昆曲的戏子，在当时还有许多和幕友一样，豢养在绅士的第宅或者衙门里面。他们本来和“倡优所畜”的文人清客是差不多的东西，同样是“主上所戏弄，流俗之所轻”的。这种昆曲，当然不是给公馆衙门之外的平民小百姓听的。现在，“治于人的小人”，要想在无线电的播音里去听清楚昆曲的平上去入，自然是牛听弹琴，一窍不通了。

“乾嘉以降”不久，昆曲的清歌曼舞的绮梦，给红巾长毛的“叛贼”捣乱了，给他们的喧天动地的鼙鼓震破了。是的！乾嘉之世和同光之世之间，夹着这么一段“可怕可恨”的回忆。不知怎么一来，在同光之世，我们就渐渐，渐渐的听着那昆曲的笙笛声离得远了，远了，一直到差不多听不见。而“不登大雅之堂的”乱弹——皮簧，居然登了大雅之堂。这本来是草台班上的东西。高高的戏台搭在旷场上，四周围是没遮拦的，不但锣鼓要喧天，而且歌曲也要直着嗓子叫，才敌得过台底下打架相骂的吵闹，也配得上“乱弹”的别名。满腿牛屎满背汗的奴隶们，仰着头张着嘴的看着台上。歌词文雅不得，也用不着文雅，因为禁不

起那唱戏的直着嗓子一叫，叫到临了：不押韵的也押韵了，平仄不调的也就调了！这是，这曾经是别一个等级的艺术。当然是平民等级的了。

然而，统治阶级不但利用这种原始的艺术，来施行奴隶教育；他们还要采取这些平民艺术的自由的形式，去挽救自己艺术的没落。于是乎请乱弹登大雅之堂。可惜，没有出息的绅士，始终是没有出息的；俗不可耐的商人市侩，始终是俗不可耐的。因此，乱弹就在绅士等级蜕化出来的绅商阶级的手里，重新走上所谓“雅化”的道路。樊樊山制军，袁寒云世子，王晓籟先生，某某老板等等，都来“爱美”一下，说句直译的俗话，就是客串一下，串得个珠圆玉润满纸琳琅，不但如此，连唱皮簧的戏子，尤其是以“做女人为职业”的男戏子，都一个个“绅商化”起来，做了院长副院长的大官，例如梅兰芳老板，现在居然是美国文学博士梅兰芳梅大人了。

这样，皮簧的乱弹又被绅商阶级霸占了去，成了绅商阶级的艺术。

这世界上的一切，其实都是这样的！尤其是在中国——中国的绅商阶级虽然已经是现代式的阶级，却仍旧带着等级的气味。他们连自己大吹大擂鼓吹着的所谓白话，都会变成一种新文言，写出许多新式的诗古文词——所谓欧化的新文艺。中国的商人必须变成绅士，正因为中国绅士保存着绅士的身份而来做商人了。所以乱弹已经不乱，白话也应当不白，欧化应当等于贵族化。一切都要套上马勒口，不准乱来；一切都要分出等级：用文雅的规律表示绅士的尊严，用奴才主义的内容放进平民艺术里去，帮助束缚平民的愚民政策。

然而这个年头，总有一天什么都要“乱”。咱们“非绅士”的“乱”不但应当发展，而且要“乱”出个道理来。

于是乎，咱们不肖的下等人重新再乱弹起来，这虽然不是机关枪的乱弹，却至少是反抗束缚的乱谈。

史铁儿^①一九三一·九·七。

一种云

天总是皱着眉头。太阳光如果还射到地面上，那也总是稀微的淡薄的。至于月亮，那更不必说，他只是偶然露出半面，用他那惨淡的眼光看一看这罪孽的人间，这是孤儿寡妇的眼光，眼睛里含着总算还没有流完的眼泪。受过不止一次封禅大典的山岳，至少有大截是上了天，只留一点山脚给人看。黄河、长江……据说是中国文明的父母，也不知道怎么变了心，对于他们的亲生骨肉，都摆出一副冷酷的面孔。从春天到夏天，从秋天到冬天，这样一年年的过去，淫虐的雨，凄厉的风和肃杀的霜雪更番的来去，一点儿光明也没有。这样的漫漫长夜，已经二十年了。这都是一种云在作祟。那云为什么这样屡次三番的摧残光明？那云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这是太平洋上的大风暴吹过来的，这是大西洋上的狂飚吹过来的。还有那些模糊的血肉——榨床底下淌着的模糊的血肉蒸发出来的。那些会画符的人——会写借据会写当票的人，就用这些符箓在呼召。那些吃田地的土蜘蛛，——虽然死了也不过只要六尺土地葬他的贵体，可是活着总要吃住这么二三百亩田地，——这些土蜘蛛就用屁股在吐着。那些肚里装着铁心肝铁肚肠的怪物，又竖起了一根根的烟囱在喷着。狂飚风暴吹过来的，血肉蒸发出来的，符箓呼召来的，屁股吐出来的，烟囱喷出来的，都是这种云。这是战云。

难怪总是漫漫的长夜了！

什么时候才黎明呢？

看那刚刚发现的虹。祈祷是没有用的了。只有自己去做雷公

公电闪娘娘。那虹发现的地方，已经有了小小的雷电，打开了层层乌云，让太阳重新照到紫铜色的脸。如果是惊天动地的霹雳，那才拨得满天的愁云惨雾。这可只有自己做了雷公公电闪娘娘才办得到。要使小小的雷电变成惊天动地的霹雳！

九，三。

吉河德的时代

据说中国识字的人很少。然而咱们没有统计过，如果说中国的识字人只有一万，或者两万，大概你总要摇头罢？可是，事实上所谓新文学——以及“五四式”的一切种种新体白话书，至多的充其量的销路只有两万。例外是很少的。

其余的“读者社会”在读些什么？如果这一两万人的小团体——在这四万万的人人海之中，还把其余的人当人看待的话，我们就不能够不说中国还在吉河德的时代。“中国！”——我是说那极大的大多数人的中国，与欧化的“文学青年”无关。

欧洲的中世纪，充满了西洋武士道的文学。中国的中世纪，也就充满着国术的武侠小说。中国人的脑筋里是剑仙在统治着。西班牙中世纪末的西万谛斯写了一部《董吉河德传》，把西洋武士道笑尽了。中国的西万谛斯难道还在摇篮里？！或者没有进娘胎？！

不错，中国的《水浒》是一部名贵的文学典籍。但是，恐怕就一部罢。模仿《水浒》的可以有一万部，然而模仿到什么地方去了呢？草泽的英雄，结果即使不是做皇帝，至多也不过劫富济贫罢了。梦想着青天大老爷的青天白日主义者，甚至于把这种强盗当做青天大老爷，当做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我们可以想得到：是有那种“过屠门而大嚼”的人！——这个年头，这个世界，不但贪官污吏豪强绅商要多少有多少，而且，怨恨的对象又新添了贪工头，污那摩温，大小买办，×国新贵。——恨得真正切齿，你可以看到他们眼睛的凶光，可以看见他们紧张的神经在

那里抖动，你可以看到他们吃烧饼的时候咬得特别起劲，这是他们在咬“仇人”的心肝，刚刚他们脑筋里的剑仙替他们杀死了挖出来的。然而，既然这样恨那些贪官污吏，以及新式的贪什么，污什么的，那么，他们要干什么，他们打算怎么干？他们吗？相信武侠的他们是各不相问的，各不相顾的。虽然他们是很多，可是多得象沙尘一样，每一粒都是分离的，这不仅是一盘的散沙，而且是一片戈壁沙漠似的散沙。他们各自等待着英雄，他们各自坐着，垂下了一双手。为什么？因为：“济贫自有飞仙剑，尔且安心做奴才。”“欲知后事如何”？那么“请听来生分解”罢。

至于那些十五六岁的小孩子，偷偷的跑到峨眉山五台山去学道修仙炼剑，——这样的事，最近一年来单是报纸上登出来的，就有六七次，——这已经算是有志气的好汉，总算不在等待英雄，而是自己想做英雄了。究竟想做的和等待的是些什么样的英雄？那你不用问，请自己去想一想：这些英雄所侍候的主人，例如包公，彭公，施公之类，是些什么样的人物，——那么，英雄的本身也就可想而知的了。英雄所侍候的主人，充其量只是一个青天大老爷，英雄的本身又会高明到什么地方去呢？

武侠小说连环图画满天飞的中国里面，那中国的西万谛斯……还是在摇篮里呢，还是没有进娘胎？！不是的，这些西万谛斯根本就不把几万万“欧化之外的读者”当人看待。你或者说：这几万万人差不多都不读书。那么，我反问你一句：你看不见小茶馆里有人在听书？

九，八。

世纪末的悲哀

时代也是有主人的。对于有些人这是世纪末；对于另外一些人这也许是世纪初——黄金时代的开始呢。然而，黄金时代虽然不远，却不是这么容易达到的。这要经过血污池，奈何桥，刀山，油锅，以及……一切种种这类的东西。这条路上——到黄金时代的路上，究竟是悲哀，是痛快，是兴奋，是快乐，是痛快？这都是又当别论，不在乱谈之列。

只说世纪末的人们确实充满着悲哀，实在可怜！

世纪末的人原本是都有“怕血症”的，一见着这么几点儿血渍，他就战栗着，痉挛着……吓得个半死不活。呵！神经衰弱的时代呵！但是，神经衰弱的人之中，有些因为得病的病根来得特别，他们会一跳起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突然变成空前的，而且一定绝后的勇敢。怕血症会变成渴血症。天在旋转着，地在震荡着，洪水泛滥着，火山爆裂着，牛马怒吼着……这是什么？是世界的末日到了？驾驭这个世界的上帝，就雇用那些神经衰弱而又勇敢得空前绝后的人，来支持这个世界。也许正因为受着上帝的雇用，所以变得这么勇敢。他们张大了吃人的血口，他们实在口渴得很，他们专门要吃奴隶牛马的血，他们想把黄河扬子江似的血都喝干净。他们正在哼哈着，叱咤着，叫喊着，要叫出古代的英雄，要叫出三代的道统，要叫出民族的精魂，来救命，来……叫着的是：“天下孰能一之？曰：唯有嗜杀人者能一之！”这样的叫喊，真象黑夜里小孩子的叫喊，越是叫得响，越是因为他们的胆怯，这是自欺欺人的叫喊，不过想要掩饰自己的害怕，盖

住内心的悲哀，世纪末的悲哀。这是悲哀得发狂了。

同时，世纪末的人们之中，有些却很忠实于自己的怕血症。他们象兔子一样的“聪明”：把自己的头和美丽的血红的眼睛，躲在自己的脚爪底下，就自以为别人不看不见它了，因为它看不见别人了。他们死也不肯走出“象牙之塔”，也许走出了“象牙之塔”，又走进了“水晶之宫”。象牙塔和水晶宫还不是一样的建筑在血肉模糊的骷髅场上？但是你不知道，在象牙塔和水晶宫的里面，始终是别有天地非人间的。这里有肉感，有爱神，有……这里是多么清闲，又多么孤寂，这里多么潇洒，又多么怅惘！即使不幸滴出了象牙塔和水晶宫，也还会吹箫吴市，做个风雅乞丐。一样可以有牢骚，有落拓……等等的诗境和灵感。所有这些上帝御选的人们，总不免要口中念念有词，哼哼唧唧。这是些什么神秘的咒语，还是白天说梦话？不是的。这是仙人传授的口诀，念着可以解救世界末日的劫数。如果奴隶牛马也会这样高尚，也会学着哼哼唧唧，那么，天下的一切怨气都可以宣泄净尽，再也不会会有什么天崩地陷的灾祸。是的，这并不是无病的呻吟。病就在于世纪末，病就在于世纪末的悲哀，那是衷心不可救药的无穷无尽的悲哀。这也是悲哀得发狂了。

发狂的病是有好些种，上面讲的，就是武痴和文痴的分别。如果豺狼猫狗的万牲园看厌了的话，那么，不妨看看这文痴武痴的疯人院，倒也怪有趣的。

九，十。

民族的灵魂

黄昏之后。新月已经上来了，连无限好的夕阳都已经落山了。只有阴森森的鬼气。大门口的石狮子都皱着眉头，它们的真正厚到万分的脸皮上淌着冰冷的眼泪。

昏暗的黑魑魑的大门口，先发现两星红火，——这是两枝香；跟着，一盏灯笼出现了，灯笼的火光是那么摇荡着，禁不起风似的缩头缩脑，可是，因为周围是乌黑的，所以还勉强看得出那油纸灯笼上印着的三个红字：“×国府”。

听罢：那些打着灯笼捧着香的人一递一声的叫应着：

“阿狗！回来罢！阿狗，……快快儿的回来……罢！”

“回来了！回……来了！”

这是读者先生家乡的一种……一种什么呢？——一种“宗教仪式”。据说，人病了，是他的灵魂儿落掉了，落在街上，甚至于落在荒山野地。所以要这样叫他，而且还要有一个人装着病人的灵魂答应着。又据说，这样一叫一应，病人的病就会好的。这种宗教仪式，叫做叫魂。自然，这种叫魂的公式，不一定是阿狗可以用，阿猫也可以用，阿牛阿马都可以用。

听说所谓民族也有灵魂。因此很自然的，这位民族先生生了病，也非得实行叫魂不可。

民族先生的病的确不轻。读者先生的贵处有一种传说，说阴间有刀山，有油锅，有奈何桥，有血污池；甚至于人的“生魂”

也会到这种精致而巧妙的地狱里去受罪。譬如说，阴间的阎王把你用一只钩子吊住脊骨挂在梁上，那你在阳间就要“疽发背死”。现在这位民族先生的“生魂”，大概是被某一殿的阎王割掉了一只手臂。他在哀求着其他的九殿阎王救命；可是，这些阎王也正在准备着刀锯斧钺，油锅炮烙，大家商量着怎样来瓜分裔割。因此，民族先生的病状就来得格外奇特。

于是乎叫魂也就不能够不格外奇特的去叫。听着：七张八嘴一声叫两声应的，把千年百代的十八代祖宗的魂都叫了出来，把半死不活的行尸走肉的魂也叫了出来，甚至于把洪水以前的猢猻精的魂也叫了出来。什么岳飞，诸葛亮，曾国藩，吴大澂，邓世昌等……这些千奇百怪的魂，据说，都是民族的灵魂；又据说，这些灵魂叫回来之后，民族的病就会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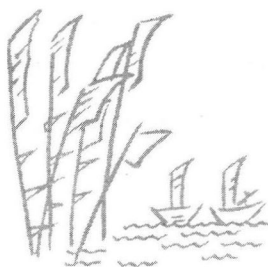
民族的灵魂，——就是民族的意识。这民族的意识是什么？民族先生的生魂马占山回答得最清楚：

奴耕婢织各有专职，
保国御侮责在军人。

换句话说，叫醒民族的灵魂是为着巩固奴婢制度。的的确确不错，如果我们把上面所叫的那些灵魂审查一下，那一批不是为着拥护奴婢制度而斗争的！？好个“伟大的”岳武穆，他死了还会显圣，叫牛皋等不准抵抗秦桧，不准犯上作乱，他自己宁可遵守无抵抗主义的十二道金牌，把中国的领土让给金国，而不肯违背奴隶主的命令（见《岳传》）。现在抵抗不抵抗日本阎王的问题，不过是一个“把中国小百姓送给日本做奴婢，还是留着他们做自己的奴婢”的问题。其实，中国小百姓做“自己人”的奴婢，也还是英美法德日等等的奴婢的奴婢，因为“自己人”的岳武穆之流原本是那么奴隶性的。岳武穆之流的灵魂和精神就在于要想保持他们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这种灵魂和精神，必须叫回来：

“岳武穆……回来罢！”

“回来了！”



暴风雨之前

宇宙都变态了！

一阵阵的浓云；天色是奇怪的黑暗，如果它还是青的，那简直是鬼脸似的靛青的颜色。是烟雾，是灰沙，还是云翳把太阳蒙住了？为什么太阳会是这么惨白的脸色？还露出了恶鬼似的雪白的十几根牙齿？

这青面獠牙的天日是多么鬼气阴森，多么凄惨，多么凶狠！

山上的岩石渐渐的蒙上一层面罩，沙滩上的沙泥簌簌的响着。远远近近的树林呼啸着，一忽儿低些，一忽儿高些，互相唱和着，呼啦呼啦……噤噤啁啁……——宇宙的呼吸都急促起来了。

一阵一阵的成群的水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受着了惊吓，慌慌张张的飞过来。它们想往那儿去躲？躲不了的！起初是偶然的，后来简直是时时刻刻发见在海面上的铄亮的，真所谓飞剑似的，一道道的毫光闪过去。这是飞鱼。它们生着翅膀，现在是在抱怨自己的爷娘没有给它们再生几只腿。它们往高处跳。跳到那儿去？始终还是落在海里的！

海水快沸腾了。宇宙在颠簸着。

一股腥气扑到鼻子里来。据说是龙的腥气。极大的暴风雨和霹雳已经在天空里盘旋着，这是要“挂龙”了。隐隐的雷声一阵紧一阵松的滚着，雪亮的电闪扫着。一切都低下了头，闭住了呼吸，很慌乱的躲藏起来。只有成千成万的蜻蜓，一群群的哄动着，随着风飞来飞去。它们是奇形怪状的，各种颜色都有：有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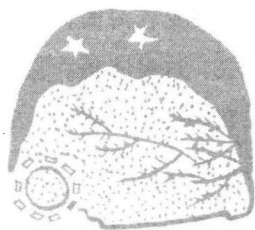
白紫黑的，象人身上的伤痕，也有鲜丽的通红的，象人的鲜血。它们都很年青，勇敢，居然反抗着青面獠牙的天日。

据说蜻蜓是“龙的苍蝇”。将要“挂龙”——就是暴风雨之前，这些“苍蝇”闻着了龙的腥气，就成群结队的出现。

暴风雨快要来了。暴风雨之中的雷霆，将要辟开黑幕重重的靛青色的天。海翻了个身似的泼天的大雨，将要洗干净太阳上的白翳。没有暴风雨的发动，不经过暴风雨的冲洗，是不会重见光明的。暴风雨呵，只有你能够把光华灿烂的宇宙还给我们！只有你！

但是，暂时还只在暴风雨之前。“龙的苍蝇”始终只是些苍蝇，还并不是龙的本身。龙固然已经出现了，可是，还没有扫清整个的天空呢。

一九三一，一二，二七。



财神的神通

“谁的胳膊粗，拳头大，谁是主子。”有人这样说。

这句话仿佛是对的。自从状元老爷倒了运，轮着军官大人出风头了。军官大人不但胳膊粗拳头大，而且还有洋枪洋炮，飞机毒瓦斯，坦克车……！

然而，武侠小说上的飞剑和拳术，始终只能够在梦里安慰安慰穷人。而洋枪洋炮，也不过是财神菩萨的法宝。没有财神菩萨的保佑，不但胳膊粗拳头大的武士只配当个把保镖的，就是该着洋枪洋炮的英雄也还做不成主子。

中国的国货财神，向来就分做五路——所谓五路财神是也。可是，现在世界，样样欧化；固然化不彻底，然而至少财神也变成了半吊子的欧化财神了。因此，中国现在的财神是五代同堂多子多孙，至少总有十七八路。这都是些英国种，美国种，法国种，日本种的……杂种财神。他们各霸一方，做着真正的主子。现在读者诸君的贵国，早就是：“谁的洋钱多，神通大，谁是主子”了！

不过还要添一句话，就是这些主子还有自己的主子。中国主子的主子就是英美法日的大财神，此其一。其二，中国的许多财神主子，三四路一帮，八九路一帮，互相勾结着，——为着要互相吵架打仗，抢码头，夺地盘。中国的各帮小财神的打架，也是听着外国的各帮大财神的指使的。

这样，一切种种中外大小的财神菩萨才是中国的主子。财神菩萨保佑谁，谁就可以雇用指挥洋枪洋炮的军官大人，谁就可以

喂养吹吹打打的状元老爷，——从会写四六文章的书启起，一直到会做印象主义的欧化文艺为止。

话已经说明白了。现在的状元老爷，就是一切种种新式的旧式的政客。军官大人，就是那些坐飞机吃大菜，以至于穿青布棉大氅的军阀。而财神菩萨是一切种种帮口的绅商。

绅商之中，首先要说到的就是地主，他们是当然的绅士，同时，他们一定要做生意；中国农民的汗和血，中国的米麦豆和棉花，丝和茶叶，中国手工工人的一切种种生产品，逃不了地主绅士的商行；中国一切穷人的生命都在地主绅士的掌握里面：那许多当铺钱庄……以至于税收机关，收租法庭，象天罗地网似的布满了全中国。其次，就是那些绅士化的资本家，他们的花花绿绿的商店里，贩卖着乱七八糟的西洋货和东洋货，他们的乌烟瘴气的堆栈里，收罗着许多外国大财神需要的货色。这些资本家中，固然也有些开着工厂，和外国财神“竞争”。你知道他们竞争些什么？他们和外国财神竞争的是：谁剥削工人剥削得凶些。自然哪！他们是在“提倡国货”，更加有理由叫工人“增加生产效能”！于是乎男男女女大大小小的工人，从五六十岁到五六岁，从天亮六点钟到天黑六点钟，甚至于从鸡叫到三更，都在天天挤出自己的血汗来，替中外财神“造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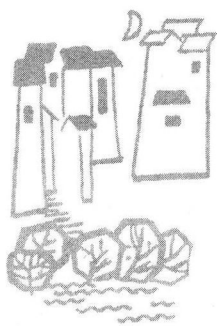
可是，因为世界上的大财神——国际的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垄断着中国的市场，支配着中国的经济命脉，所以中国的小财神无论怎样压榨，自己总还不能够满足。他们因此十分谦虚，对人说：我们并不是财神，不过是“小贫”而已。他们也就非常之驯服，对着外国大财神总是“镇静而无抵抗”，想多得几个赏钱。可是，他们还很勇敢——时时刻刻要互相决斗，为的是要抢赏钱。

为着抢赏钱的缘故，中国的绅商领袖在上海就分成两大帮：江浙帮（又叫做阿拉帮）和广东帮。至于其余的小码头，每一省，甚至于每一县，都分成许多小帮口。你抢我夺，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军阀制度的基础就在这里。

最近，一九三二年的一月，江浙帮和广东帮又大大的斗了一阵法宝。虽然还没有动刀动枪，这出滑稽戏也就够好看的了。结果暂时仿佛是讲和了。于是乎长着翅膀会飞的皇帝又飞回了金銮宝座；于是乎梦想正位的太子仍旧只能够稍微委屈一些。飞行皇帝为什么腰把硬？因为江浙帮的财神保佑他。太子为什么不能够得意？因为他的财神要想“接收”上海市商会而没有成功。

谁说：“胳膊粗拳头大的就是主子”？

自然，中国的财神没有洋枪洋炮也是做不成功的。但是，单有洋枪洋炮的，单有青龙偃月刀丈八蛇矛的，单有粗胳膊大拳头的，——始终只配做大大小小的保镖的。这些保镖的用处，就是打架抢码头，就是屠杀反抗财神的一切人。看罢：现在各帮的财神联合着屠杀，屠杀一切反抗财神的群众，屠杀一切反抗日本大财神的群众。看罢：现在各帮的财神又正在互相勾结，互相排挤，这些讲和，那些又吵嘴，——不久又要自伙儿里大大的打起来！



狗道主义

最近有人说：“只有人道主义的文学，没有狗道主义的文学。”

然而，我想：中国只有狗道主义的文学，而没有人道主义的文学。中国文人最爱讲究国粹，而国粹之中又是越古越好。因此，要问读者诸君贵国的文学是什么，最好请最古的太史公来回答。他说，这是“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

人道主义的文学，据说是“被压迫者苦难者的朋友”。可是，请问中国现在除了“被压迫者苦难者”自己之外，还有什么“朋友”？“苦难者”的文学和“苦难者朋友”的文学，现在差不多都在万重的压迫之下。这种文学不能够是人道主义的，因为“被压迫者”自己没有资格对自己讲仁爱，没有可能也没有理由对压迫者去讲什么仁爱的人道主义。

于是乎狗道主义的文学就耀武扬威了。

固然，十八世纪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文学之中，曾经有过人道主义。然而二十世纪的中国资产阶级，尤其是一九二七年之后，根本不能够有那种人道主义。中国资产阶级始终和封建地主联系着，最近更和他们混合生长着。帝国主义支配之下的“关余万能”主义，外国资本的垄断市场，租田制度和高利贷商业资本的畸形发展，……使榨取民众血汗所形成的最初积累的资本，总在流转到一种特殊的“货币银行资本”里去，而且从所谓民族工业里逃出来。中国资产阶级之中的领导阶层，现在难道不是那些中国式的大大小的的银行银号钱庄吗？这些“货币银行资本”的最

主要的投资，除出做进出口生意的垫款和高利贷的放账以外，就是公债生意。而在公债等类的生意里面，利率比那种破产衰落的工业至少要高二三十倍。这种资产阶级会有什么人道主义？！他们要戴起民族的大帽子，不是诓骗民众去争什么自由平等。不是的。远东第一大伟人，比卢梭等类要直爽而公开得多。这大约是因为中国有一座万里长城做他的脸皮。他就爽爽快快的说：不准要什么自由平等，国民应该牺牲自由维持不平等，而去争“国家的自由和平等”。所以这顶民族的大帽子，是用来诓骗民众安心做奴隶的。欧洲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要诓骗民众去争自由平等，为的是多多少少要利用民众反对贵族地主，要叫民众“自由平等的”来做自己的奴隶，而不再做贵族僧侣的奴隶。中国现在的资产阶级又要诓骗民众“为着民族和国家”安心些，更加镇静些做绅士地主和自己的共同奴隶。

所以很自然的只会有狗道主义的文学。这是猎狗，这是走狗的文学，因为这些地主资产阶级的走狗的主人，本身又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这种走狗的走狗，自然是狗气十足，狗有狗道，此之谓狗道主义。

狗道主义的精义：第一是狗的英雄主义，第二是羊的奴才主义，第三是动物的吞噬主义。

英雄主义的用处是很明显的：一切都有英雄，例如诸葛亮等类的人物，来包办，省得阿斗群众操心！英雄的鼓吹总算是“独一无二的”诓骗手段了。这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另外还有些诓骗的西洋景，早已拆穿了；只有那狗似的英勇，见着叫化子拼命的咬，见着财神老爷忠顺的摇尾巴——仿佛还可以叫主人称赞一句：“好狗子！”至于羊的奴才主义，那就是说：对着主人，以及主人的主人要驯服得象小绵羊一样。

话说元朝时候，汉族的绅商做了蒙古王公的走狗和奴才，其中有一位将军叫做宋大西，他对于元朝皇帝十分忠顺。他跟着蒙古军队去打俄罗斯，居然是个“勇士”。元朝的帝国主义打平了中国，又去打俄国，——他是到处都很出力的，到处都要开锣喝

道的喊着：“万岁哟，马上的鞑靼！永久哟，神武的大元！”有一天，他忽然间诗兴勃发，念出一首诗来：

外表赛过勇士，心里已如失望的小羊。
无家可归的小羊哟，何处是你的故乡？

这首诗的确高明，尤其是那“赛过”两个字用得“奇妙不堪言喻”。真是天才的诗人呀！“赛过”！一只驯服的亡国奴的小羊，居然赛过勇士和英雄！

这些狗呀羊呀的动物，有什么用处？嘿，你不要看轻了这些动物！天神还借用它们来惩罚不安分的罪孽深重的人类呢。

原来某年月日，外国的天父上帝和中国的财神菩萨开了一个方桌会议，决定叫这些动物，张开吃人的血口，大大的吞噬一番，为的是要征服那些不肯安分的人，那些敢于反抗的人，那些不愿意被“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的人。

有诗为证：

天父和菩萨在神国开会相逢，
选定了沙漠的动物拿来借用；
于是米加勒高举火剑，爱普鲁拉着银弓：
一刹那便刀光血影，青天白日满地红！

萧伯纳并非西洋唐伯虎

萧伯纳在上海——不过半天多功夫。但是，满城传遍了萧的“幽默”，“讽刺”，“名言”，“轶事”。仿佛他是西洋唐伯虎似的。他说真话，一定要传做笑话。他正正经经的回答你的问题，却又说他“只会讽刺而已”。中国的低能儿们连笑话都不会自己说，定要装点在唐伯虎徐文长之类的名人身上。而萧的不幸，就是几乎在上海被人家弄成这么一个“戏台上的老头儿”。

但是，真正欢迎他的，不是这些低能儿。事前的“欢迎者”，各自怀着鬼胎，大家都想他说几句于自己有益而刺着别人的话。而事后一些“欢送者”，就大半瘟头瘟脑——大失所望。“和平老翁”，变成了“借主义成大名……挂羊头卖狗肉的”了。

可是，又舍不得他这个“老头儿”，偏偏还要借重他。于是乎关于他的记载，就在中英俄日各报上，互相参差矛盾得出奇。原本是大家都想把他当做凹凸镜，在他之中，看一看自己的“伟大”而粗壮，歪曲而圆转的影子；而事实上，各人自己做了凹凸镜，把萧的影子，按照各人自己的模型，拗掇得像一副脸谱似的：村的俏的样样俱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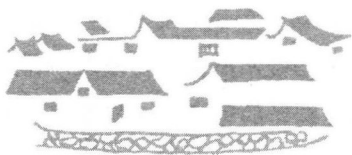
然而萧的伟大并没有受着损失，倒是那些人自己现了原形。萧伯纳是个激进的文学家，戏剧家。他反对那些干文字游戏的虚伪“作家”，他把大人先生圣贤豪杰都剥掉了衣装，赤裸裸的搬上舞台。他从资产阶级社会里出来，而揭穿这个社会的内幕。他真正为着光明奋斗。他战胜着自己身上的旧社会的玷辱和污点。他并不吊住在自己的迷误的“主义”和“思想”上，而昧着良心

来诅咒新社会的产生。他只见到过“改良”，而事实却是“革命”，他没有因此就恼羞成怒；相反的，他立刻向着“革命”开步走。于是乎那些卖人头的，都噓噓的“欢送”他。

所以真正欢迎他的，只有中国的民众，以及站在民众方面的文艺界。中国的民众并不当他是什么“革命的领袖”，“完全的社会主义作家”，更不会当他是偶像。他们认识他现在是世界的和中国的被压迫民众的忠实朋友。

我们收集“萧伯纳在上海”的文件，并不要代表什么全中国来对他“致敬”——“代表”全中国和全上海的，自有那些九四老人，白俄公主，洋文的和汉文的当局机关报；我们只不过要把萧的真话，和欢迎真正的萧或者欢迎西洋唐伯虎的萧，以及借重或者歪曲这个“萧伯虎”的种种文件，收罗一些在这里，当做一面平面的镜子，在这里，可以看看真的萧伯纳和各种人物自己的原形。

一九三三，二，二二。



最艺术的国家

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这艺术的可贵，是在于两面光，或谓之“中庸”：——男人看见“扮女人”，而女人看见“男人扮”。表面上是中性的，骨子里当然还是男性。然而如果不扮，还成艺术吗？

譬如说，中国民族的固有文化是科举制度，外加捐班之类。当初说这太不象民权，不合时代潮流，于是扮成了中华民国。然而这民国年久失修，仿佛花旦脸上的脂粉，连招牌都已经剥落殆尽，同时，老实的民众，想要革掉一切科甲出身和捐班出身的参政权，以便实现反动的民权。这对于民族是不忠，对于祖宗是不孝。现在早已回到固有文化的“时代潮流”，那能放任这种不忠不孝！因此，又得重新扮过一次。草案如下：第一，谁有代表国民的资格，须由考试决定。第二，考出了举人之后，然后再挑选一下，此之谓选（动词）举人；而被挑选的举人，就作为被选举人。照文法说，这样的国民大会的选举人，应称为“选举人者”，而被选举人，应称为“被选之举人”。然而如果不扮，还成艺术么？因此，他们扮成宪政国家的选举人和被选举人，虽则实质上还是秀才和举人。这草案的深意正在这里：叫民众看见是民权，而民族祖宗看见是忠孝——忠于固有科举的民族，孝于制定科举之祖宗。此外，象上海已经实行的民权，是纳税的就有选举和被选，使偌大上海只剩四千四百六十五个大市民。这虽是捐班——有钱的为主，然而他们一定会考中举人，甚至不补考也会赐同进士出身的，因为洋大人膝下的榜样，理应遵照，何况这也是

《最艺术的国家》一九三三年四月二日初刊于《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本文和后面的《内外》《透底》《人才易得》《关于女人》《真假董吉河德》《中国文与中国人》《儿时》等文章都是瞿秋白在上海时所作，其中有的是根据鲁迅的意见或与鲁迅交换意见后写成的。鲁迅对这些文章曾作过文字上的改动（个别篇改换了题目），并请人誊抄后，以鲁迅使用的笔名发表，后来又将它们（《儿时》除外）收入自己的杂文集。这里所收文章是根据鲁迅保存的瞿秋白的手稿，文末日期为鲁迅所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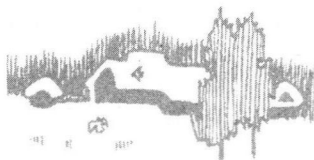
一面并不违背固有文化，一面扮得很象宪政民权呢。此其一。

其二，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从这一面看过去是抵抗？从那一面看过来是交涉。其三，一面做实业家银行家，一面自称“小贫而已”。其四，一面是日货销路复旺，一面对人说是“国货年”……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而大都是扮演得十分巧妙两面光滑的。

中国真是最艺术的国家，最中庸的民族。

而小百姓还要不满意，呜呼，君子之中庸，小人之反中庸也！

一九三三，三，三十。



内 外

古人说内外有别，道理各各不同。丈夫叫“外子”，妻叫“贱内”。伤兵在医院之内，而慰劳品在医院之外，非经查明，不准接收。对外要安，对内就要攘，或者嚷。

何香凝先生叹气：“当年唯恐其不起者，今日唯恐其不死。”然而死的道理也是内外不同的。

庄子曰：“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次之者，两害取其轻也。所以外面的身体要它死，而内心要它活；或者，正因为要那心活，所以把身体治死。此之谓治心。

治心的道理很玄妙：心固然要活，但不可过于活。

心死了，就明明白白地不抵抗，结果，反而弄得大家不镇静。心过于活了，就胡思乱想，要瞎抵抗。这种人，“绝对不能抗日”。

为要镇静大家，心死的应该出洋，留学是到外国去治心的方法。

而心过于活的，是有罪，应该严厉处置，这才是在国内治心的方法。

何香凝先生以为“谁为罪犯是很成问题的”——这就因为她不懂得内外有别的道理。

一九三三，四，十一。

——《内外》
家干。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七日初刊于《申报·自由谈》，署名何

透 底

凡事彻底都好，而“透底”就不见得高明。因为连续的向左转，结果却碰见了向右转的朋友，那时候彼此点头会意，脸上会要辣辣的。就象要自由的人，忽然要保障复辟的自由，或者屠杀大众的自由——透底是透底的了，却连自由的本身都漏掉了，原来只剩了通体透明一丝不挂。

反对八股是应该的。八股原是蠢笨的产物。最初是考官嫌麻烦，——他们的头脑大半是用阴沉木做的——什么代圣贤立言，什么起承转合，文章气韵，都没有一定的标准，难以捉摸，因此，一股一股地定出来，算是格式；拿这格式来“衡文”，一眼就看得出多少轻重。随后应试的人也觉得又省力又不费事。这样的八股，无论新旧，都应当扫荡。但是这原是为着要聪明，不是要更蠢笨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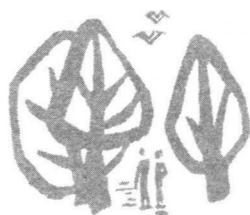
不过要保存蠢笨的人，却有一种策略。他们说：“我不行，而 he 和我一样。”——大家活不成，拉倒大吉！而等“他”拉倒之后，旧的蠢笨的“我”却总是偷偷地又站起来，实惠是属于蠢笨的。好比要打倒偶像，偶像急了，就指着一切活人说：“他们都象我。”于是你跑去把貌似偶像的人统统打倒；回来，偶像还奖励你，说打倒“打倒偶像”者，透底之至。这样，世界上就剩得偶像和打倒“打倒”者。

开口诗云子曰，算老八股；而有人把“达尔文说，蒲力汗诺夫曰”也算做新八股。于是要知道地球是圆的，就要人人都要自己去环游地球一周；要制造汽机的，也要先坐在开水壶前格一通

物。……这自然透底之至。其实，从前说反对卫道文学，原是反对那道，说那样吃人的“道”不应当卫，而有人要透底，就说什么道也不卫；这“什么道也不卫”难道不也是一种“道”吗？所以，真正最透底的，还有下列一个故事：

古时候，有一个国度里革命了，旧的政府倒下去，新的站上来。旁人说，你这革命党，原先是反对有政府的，怎么自己又来做政府？！那革命党立刻拔出剑来，割下了自己的头，但是，他的僵尸直立着，喉管透出一股气来，仿佛是在说：这主义的实现原本要等三千年之后。

一九三三，四，十一。



人才易得

前几年，大观园里的压轴戏是刘姥姥骂山门。那是要老旦出场的，老气横秋的大“放”一通，直到裤子后穿而后止。当时指着手无寸铁或者已经缴械的小百姓，大喊“杀，杀，杀！”那呼声是多么雄壮呵。所以它——男角扮的老婆婆，也可以算是一个人才。

现在时世大不同了，手里杀杀杀，而嘴里却需要“自由，自由，自由”，“开放政权”云云。压轴戏要换了。

于是人才辈出，各有巧妙不同。出场的不是老旦，而是花旦了，而且这不是平常的花旦；而是海派戏广告上所说的“玩笑旦”。这是一种特殊的人物，他（她）要会媚笑，又要会撒泼，要会打情骂俏，又要会油腔滑调。总之，这是花旦而兼小丑的角色。不知道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说“美人”妥当些），还是美人儿多年阅历的结果，练出了这一套拿手好戏？

美人儿而说“多年”，自然是阅人多矣的徐娘了，她早已从窑姐儿升任了老鸨婆；然而她丰韵犹存，虽在卖人，还兼自卖。自卖容易，卖人就难些。现在不但有手无寸铁的小百姓，不但！况且又遇见了太露骨的强奸……要会应付这种非常之变，就非有非常之才不可。你想想：现在压轴戏是要似战似和，又战又和，不降不守，亦降亦守——这是多么难做的戏。没有半推半就，假作娇痴的手段是做不好的。孟子说：“以天下与人易。”其实，能够简单地双手捧着“天下”去“与人”，倒不为难了。问题就在于不能如此。所以就要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哭哭啼啼而又刁声

《人才易得》曾由鲁迅改题为《大观园的人才》，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初刊于《申报·自由谈》，署名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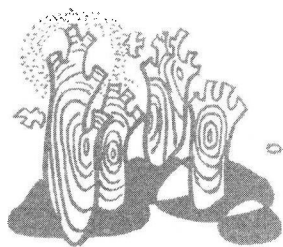
浪气的诉苦说：“我不入火坑，谁入火坑？”

然而娼妓说她落在火坑里，还是想人家去救她出来；老鸨婆哭火坑，就没有人相信她，何况她已经申明：她是敞开了怀抱，准备把一切人都拖进火坑去的。虽然，这玩笑却开得不差，不是非常之才，就使挖空了心思也想不出的。

老旦进场，玩笑旦出场，大观园的人才着实不少！

呜呼，以天下与人虽然大不易，而为天下得人，却似乎不难。

一九三三，四，二十四。



关于女人

国难期间女人似乎也特别受难些。一些正人君子责备女人爱奢侈，不肯光顾国货。就是跳舞，肉感等等，凡是和女性有关的，都成了罪状。仿佛男人都成了苦行和尚，女人都进了修道院，国难就得救了似的。

其实那不是她的罪状，正是她的可怜。这社会制度，把她挤成了各种各式的奴隶，还要把种种罪名加在她头上。西汉末年，女人的眉毛画得歪歪斜斜，也说是败亡的预兆。其实亡汉的何尝是女人！总之，只要看有人出来唉声叹气的不满意女人，我们就知道高等阶级的地位有些不妙了。

奢侈和淫靡只是一种社会崩溃腐化的现象，决不是原因。私有制度的社会本来把女人也当做私产，当做商品。一切国家，一切宗教，都有许多稀奇古怪的规条，把女人当做什么不吉利的动物，威吓她，要她奴隶般的服从；同时又要她做高等阶级的玩具。正像正人君子骂女人奢侈，板着面孔维持风化，而同时正在偷偷的欣赏肉感的大腿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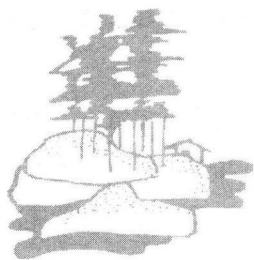
阿拉伯一个古诗人说：“地上的天堂是在圣贤的经典里，在马背上，在女人的胸脯上。”这句话倒是老实的供状。

自然，各种各式的卖淫总有女人的份。然而买卖是双方的。没有买淫的嫖男，那里会有卖淫的娼女。所以问题还在卖淫的社会根源。这根源存在一天，淫靡和奢侈就一天不会消灭。女人的奢侈是怎么回事？男人是私有主，女人自己也不过是男人的所有品。她也许因此而变成了“败家精”。她爱惜家财的心要比较的

差些。而现在，卖淫的机会那么多，家庭里的女人直觉地感觉到自己地位的危险。民国初年就听说上海的时髦总是从长三堂子传到姨太太之流，从姨太太之流再传到少奶奶，太太，小姐。这些“人家人”要和娼妓竞争——极大多数是不自觉的，——自然，她们就要竭力的修饰自己的身体，修饰拉得住男子的心的一切。这修饰的代价是很贵的，而且一天天的贵起来，不但是物质的代价，还有精神上的。

美国的一个百万富翁说：“我们不怕……我们的老婆就要使我们破产，较工人来没收我们的财产要早得多呢，工人他们是来不及的了。”而中国也许是为着要使工人“来不及”，所以高等华人的男女这样赶紧的浪费着，享用着，畅快着，那里还管得到国货不国货，风化不风化。然而口头上是必须维持风化，提倡节俭的。

一九三三，四，十一。



真假董吉诃德

西洋中古时期的武士道的没落，产生了董吉诃德那样的蠢大。他其实是个十分老实的书呆子。看他在黑夜里仗着宝剑和风车开仗，的确傻相可掬，也只觉得他可怜可笑。

然而这是真吉诃德。中国的江湖派和流氓种子，却会愚弄吉诃德式的老实人，而自己又假装着吉诃德的姿态。《儒林外史》上的几位公子，慕游侠剑仙之为人，结果是被这种假吉诃德骗去了几百两银子，换来了一颗血淋的猪头，——那猪算是侠客的“君父之仇”了。

真吉诃德的做傻相是由于自己的愚蠢，而假吉诃德是故意做些傻相给别人看，想要剥削别人的愚蠢。

可是，中国的老百姓未必都是这么蠢笨，连这点儿手法也看不出来。

现在的假吉诃德们何尝不知道大刀不能救国，他们却偏要舞弄着，每天“杀敌几百几千”乱嚷，还有人“特制钢刀九十九柄赠送前敌将士”。可是为着要杀“猪”起见，又舍不得飞机捐。于是乎“武器不精良”的宣传，一面变成了节节退却或者“诱敌深入”的注解，一面又借此搜括一些杀猪经费。可惜前有慈禧太后，后有袁世凯！——清末的兴复海军捐变成了颐和园，民四的“反日”爱国储金变成了征讨当时的革命军的军需。现在这套把戏实在太欠新鲜，谁不知道。——不然的话，还可以算是新发明。

现在的假吉诃德们，何尝不知道“国货运动”振兴不了什么

民族工业，国际的财神老爷扼住了中国的喉咙，连气也透不出，什么“国货”都跳不出这些财神的手掌心。然而“国货年”是宣布了，国货商场是成立了，像煞有介事的，仿佛抗日救国全靠一些戴着假面具的买办多赚几个钱。这钱还是牛马猪狗身上去剥削来的。不听见增加生产力，劳资合作，共赴国难的呼声么？原本是不把小百姓当人看待，而小百姓做了牛马猪狗仍旧要负“救国”责任。结果自然应当拼命供给自己身上的肉给假吉诃德们吃，而猪头还是要斫下了（挂出去）示众，以为“捣乱后方”者戒。

现在的假吉诃德们，何尝不知道什么“中国固有文化”咒不死帝国主义，无论念几万遍“不仁不义”或是金光明咒，也不会触发日本三岛的地震，使它陆沉大海。然而他们偏要高喊“民族精神”，仿佛得了什么秘诀。意思其实很明白，是要小百姓埋头治心，多读修身教科书。这固有文化本来毫无疑义：是岳飞式的奉旨不抵抗的忠，是朗诵“唤起民众”而杀之的孝，是斫猪头吃猪肉而又远庖厨的仁爱，是遵守卖身契的信义，是“诱敌深入”的和平。其实“固有文化”之外又提倡什么“学术救国”，引证西哲菲希德之言等类的居心，又何尝不是如此。

假吉诃德的这些傻相，真教人笑不出哭不出；你要认真和他辩驳，当真认为可笑可怜，那就未免傻到不可救药了。

一九三三，四，十一。

中国文与中国人

最近出版了一本很好的书：高本汉著的《中国语和中国文》。高本汉先生是个瑞典人，他的真姓是珂罗倔伦（Karl—gren）。他为什么“贵姓”高？那无疑的是因为中国化了。他的确是个了不得的“支那学家”——中国语文学的权威。

但是，他对于中国人，却似乎也有深刻的研究。

他说：“近来某几种报纸，曾经试用白话，——按高氏此书是一九二三年在伦敦出版的，——可是并没有多大的成功；因此，也许还要触怒了多数定报的人，以为这样，就是讽示着他们不能看懂文言报呢！”

“西洋各国里有许多伶人，在他们表演中，他们几乎随时可以插入许多“打诨”，也有许多作者，滥引文书；但是大家都认这种是劣等的风味。这在中国恰好相反，正认为高妙文雅而表示绝艺的地方。”

中国文的“含混的地方，中国人不但不因之感受了困难，反而愿意养成它……”

于是这位“支那学专家”就不免要“中国化”起来。他在中国大概受够了侮辱。“本书的著者和亲爱的中国人谈话，所说给他的，很能完全了解；可是，他们彼此谈话的时候，他几乎一句话也不懂。”这自然是那些“亲爱的中国人”在“讽示”他不懂“上流社会的”话。因为“外国人到了中国去，只要注意一点，他就可以觉得：他自己虽然已经熟悉了普通人的语言，而对于上流社会的谈话，仍是莫名其妙的”。（例如“一个中国的雅人”回

答高先生问他多大年纪，就说了一句“而立”。幸而高先生在《论语》上查着这个古典。)

于是“支那学专家”就说：“中国文字好像一个美丽可爱的贵妇，西洋文字好像一个有用而不美的贱婢。”

美丽可爱而无用的贵妇的“绝艺”就在于“插诨”的含混。这使得西洋第一等的大学者至多也不过抵得上中国的普通人。这样，我们“精神上胜利了”。为要保持这种胜利，必须有高妙文雅的词汇，而且要丰富！五四白话运动的“没有多大成功”，原因大概就在上流社会怕人讽示他们不懂文言了。

虽然，“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我们还是含混些好了，否则反而要感受困难的。

十，二十五。



“儿时”

狂牖文献耗中年，亦是今生后起缘；
猛忆儿时心力异：一灯红接混茫前。

——定盦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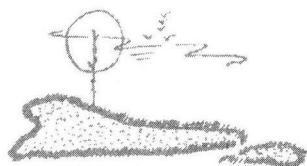
生命没有寄托的人，青年时代和“儿时”对他格外宝贵。这种浪漫谛克的回忆其实并不是发见了“儿时”的真正了不得，而是感觉到“中年”以后的衰退。本来，生命只有一次，对于谁都是宝贵的。但是，假使他的生命溶化在大众的里面，假使他天天在为这世界干些什么，那末，他总在生长，虽然衰老病死仍旧是逃避不了，然而他的事业——大众的事业是不死的，他会领略到“永久的青年”。而“浮生如梦”的人，从这世界里拿去的很多，而给这世界的却很少，——他总有一天会觉得疲乏的死亡：他连拿都没有力量了。衰老和无能的悲哀，像铅一样的沉重，压在他的心头。青春是多么短呵！

“儿时”的可爱是无知。那时候，件件都是“知”，你每天可以做大科学家和大哲学家，每天在发见什么新的现象，新的真理。现在呢？“什么”都已经知道了，熟悉了，每一个人的脸都已经看厌了。宇宙和社会是那么陈旧，无味，虽则它们其实比“儿时”新鲜得多了。我于是想念“儿时”，祷告“儿时”。

不能够前进的时候，就愿意退后几步，替自己恢复已经走过的前途。请求“无知”回来，给我求知的快乐。可怕呵，这生命的“停止”。

过去的始终过去了，未来的还是未来。究竟感慨些什么——
我问自己。

一九三三，九，二八。



画狗罢

张天翼的《鬼土日记》，替我们画了一顿鬼神世界。天翼的小说，例如《二十一个》之类，的确有他自己的作风，他能够在短篇的创作里面，很紧张的表现人生，能够抓住斗争的焦点。他的言语，也的确是“人话”，很少文言的搀杂。不过魄力是比较的不大。如果他尽力于活的现实的反映，那么，一定能够胜任愉快的发展他的才力。可是，最近出版的《鬼土日记》却有点使我们失望。这是因为我们不能够没有“苛求责备”的心。

第一讲到题材方面，这是鬼神世界。问题不仅仅在于“鬼神”，而主要的还在于“世界”。你想：你的题材是六分之五的地球，这未免太大了罢？六分之五的世界，是小说所不能够写的。结果，只能把世界缩小，放到科学试验室里去。而科学试验室里，陈列着小飞机，小潜艇，小电车……外加活鬼若干，是终究不真切的，免不了所谓“图式化”（schema）的。这种题材，它本身是很不适宜于文艺的表现。六分之五的世界虽然有共同的社会公律和历史过程，可是，这里的现实生活是复杂到万分，发展上是有许多方面的不平衡的。这些共同规律的意义，正在于适应着最繁杂最变动的现象，而能够给我们一个了解社会现象的线索。如果把这些公律机械的表演在文艺的形象里，那么，自然要走到庸俗的简单化方面去。作者的《鬼土日记》恰好走上了这条路。自然，当做社会科学的参考材料看，这未始不是一本“发松的”好书。而当做文艺创作来看，那就不能够不说是失败的了。

第二，这篇小说的名称已经告诉我们：这里面是“鬼话连

篇”的。这并没有什么。这是无可奈何的鬼话！与其说了人话去做鬼，倒不如说着鬼话做人。但是，这里可暴露了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作者自己给自己的自由太大了。“鬼土”里面没有一个真鬼。幻想的可能没有任何范围。这固然是偷巧的办法，然而也是常常容易吃力不讨好的。古话说得好：“画鬼容易画狗难”。如果是画狗，随便什么人一看就知道象不象。现在画的是鬼，那就只有鬼知道了。

其实，鬼并不是不可以画的，大家不要以为鬼没有作用。法国人有句俗话，叫做：“Le mort saisit le vif”——“死人抓住了活人”。中国的情形，现在特别来得凑巧——简直是完全应了这句话。袁世凯的鬼，梁启超的鬼，……的鬼，一切种种的鬼，都还统治着中国。尤其是孔夫子的鬼，他还梦想统治全世界。礼拜六的鬼统治着真正国货的文艺界。……这样说下去，简直说不尽。我们要画鬼，为什么不画这些鬼呢？

说到画狗，那是更好了。说广泛些：与其画鬼神世界，不如画禽兽世界。本来，中国自然也在六分之五的地球之内。而中国有的只是走狗和牛马。可是《鬼土日记》里面只见人的鬼，而没有见狗的鬼，没有见牛马的鬼；即使有牛马的鬼，也只是影子。

所以我说：还是画狗罢！

八，十。

哑巴文学

中国文学有一个小小的问题。这个问题虽然小，其实是很严重的。任何一个先进国家的文字和言语，固然都有相当的区别，但是书本上写着的文字，读出来是可以懂得的。只有在中国，“国语的文学”口号叫了十二年，而这些“国语文学”的作品，却极大多数是可以看而不可以读的。可以说是过渡时期的现象，但是，这过渡过到什么时候才了？

中国的象形文字，使古文的腔调完全和言语脱离。象形字是野蛮人的把戏。他们总算从结绳而治的程度进了一步，会画画了。结绳时期的每个结，固然不发生读音的问题，野蛮人看着每一个结，只有他们自己“肚里有数”：懂得这是记的什么事。而象形文字的初期，其实也是这种情形。每一个字的形体有作用，而读音却仍旧只有附带的作用。看着字形可以懂得，至于读着不懂，那就不管的了。中国古文的读法，因此只是读的人自己懂得的念咒，而中国文字的形体（象形，半象形，猜谜子的会意，夹二缠的假借）也简直等于画符。两千多年中国绅士的画符念咒，保持象形文字，垄断着智识，这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绝妙工具。

古文的这种“流风余韵”，现在还保存在新文学里面。这样，大多数的作品，都是可看不可读的。

但是我们应当知道：中国历史上假使还有一些文学，那么，恰好都是给民众听的作品里流传发展出来的。敦煌发见的唐五代俗文学是讲佛经讲故事的纪录，宋人平话和明朝的说书等等，都

是章回小说的祖宗。而现在的新式小说，据说是白话，其实大半是听不懂的鬼话。这些作品的祖宗显然是古文而不是“平话”。这样是不能够创造出文学的言语的。自然，用这种文字，也可以做出内容很好的作品来。可是诗古文词里面，未始没有这样好的东西，只是这些东西，只能够给看得懂的人消遣消遣。只看不听，只看不读，——所能够造出来的：不是文学的言语，而是哑巴的言语；这种文学也只是哑巴的文学。

其实，新式白话能不能够成为一种听得懂的言语呢？这绝对是可能的。科学的，政治的，文学的演讲里面，一样用着“新名词”，一样用着新的句法。因此，新文学界必须发起一种朗诵运动。朗诵之中能够听得懂的，方才是通顺的中国现代文写的作品！此外……中国虽然没有所谓“文学的咖啡馆”，可是，有的是茶馆，固然那是很肮脏的。然而茶馆里朗诵的作品，才是民众的文艺。这种“茶馆文学”总比哑巴文学好些——因为哑巴文学尽让《三笑姻缘》之类占着茶馆。

八，十五。



《鲁迅杂感选集》序

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鲁迅：《坟》

象牙塔里的绅士总会假清高的笑骂：“政治家，政治家，你算得什么艺术家呢！你的艺术是有倾向的！”对于这种嘲笑，革命文学家只有一个回答：

你想用什么来骂倒我呢？难道因为我要改造世界的那种热诚的巨大火焰，它在我的艺术里也在燃烧着么？

——卢纳察尔斯基：《高尔基作品选集序》

革命的作家总是公开地表示他们和社会斗争的联系；他们不但在自己的作品里表现一定的思想，而且时常用一个公民的资格出来对社会说话，为着自己的理想而战斗，暴露那些假清高的绅士艺术家的虚伪。高尔基在小说戏剧之外，写了很多的公开书信和“社会论文”（Publicist article），尤其在最近几年——社会的政治的斗争十分紧张的时期。也有人笑他做不成艺术家了，因为“他只会写些社会论文”。但是，谁都知道这些讥笑高尔基的，是些什么样的蚊子和苍蝇！

鲁迅在最近十五年来，断断续续的写过许多论文和杂感，尤其是杂感来得多。于是有人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做“杂感专

《鲁迅杂感选集》序 初刊于一九三三年七月青光书局出版的《鲁迅杂感选集》，署名何凝。

家”。“专”在“杂”里者，显然含有鄙视的意思。可是，正因为一些蚊子苍蝇讨厌他的杂感，这种文体就证明了自己的战斗的意义。鲁迅的杂感其实是一种“社会论文”——战斗的“阜利通”，(feuilleton)。谁要是想一想这将近二十年的情形，他就可以懂得这种文体发生的原因。急速的剧烈的社会斗争，使作家不能够从容的把他的思想和情感熔铸到创作里去，表现在具体的形象和典型里；同时，残酷的强暴的压力，又不容许作家的言论采取通常的形式。作家的幽默才能，就帮助他用艺术的形式来表现他的政治立场，他的深刻的对于社会的观察，他的热烈的对于民众斗争的同情。不但这样，这里反映着“五四”以来中国的思想斗争的历史。杂感这种文体，将要因为鲁迅而变成文艺性的论文（阜利通——feuilleton）的代名词。自然，这不能够代替创作，然而它的特点是更直接的更迅速的反映社会上的日常事变。

现在选集鲁迅的杂感，不但因为这里有中国思想斗争史上的宝贵的成绩，而且也为了着现时的战斗：要知道形势虽然会大不相同，而那种吸血的苍蝇蚊子，却总是那么多！

鲁迅是谁？我们先来说一通神话罢。

神话里有这么一段故事：亚尔霸·龙迦的公主莱亚·西尔维亚被战神马尔斯强奸了，生下一胎双生儿子：一个是罗谟鲁斯，一个是莱谟斯；他们俩兄弟一出娘胎就丢在荒山里，如果不是一只母狼喂他们奶吃，也许早就饿死了；后来罗谟鲁斯居然创造了罗马城，并且乘着大雷雨飞上了天，做了军神；而莱谟斯却被他的兄弟杀了，因为他敢于蔑视那庄严的罗马城，他只一脚就跨过那可笑的城墙。莱谟斯的命运比鲁迅悲惨多了。这也许因为那时代还是虚伪统治的时代。而现在，吃过狼奶的罗谟鲁斯未必再去建筑那种可笑的象煞有介事的罗马城，更不愿意飞上天去高高的供在天神的宝座上，而完全忘记了自己的乳母是野兽。虽然现代的罗谟鲁斯也曾经做过一些这类的傻事情，可是，他终于屈服在“时代精神”的面前，而同着莱谟斯双双的回到狼的怀抱里来。

莱谟斯是永久没有忘记自己的乳母的，虽然他也很久在“孤独的战斗”之中找寻着那回到“故乡”的道路。他憎恶着天神和公主的黑暗世界，他也不能够不轻蔑那虚伪的自欺的纸糊罗马城，这样一直到他回到“故乡”的荒野，在这里找着了群众的野兽性，找着了扫除奴才式的家畜性的铁扫帚，找着了真实的光明的建筑，——这不是什么可笑的猥琐的城墙，而是伟大的簇新的星球。

是的，鲁迅是莱谟斯，是野兽的奶汁所喂养大的，是封建宗法社会的逆子，是绅士阶级的贰臣，而同时也是一些浪漫帝克的革命家的诤友！他从他自己的道路回到了狼的怀抱。

俄国的贵族地主之间，“也发展了十二月十四日的人物，这是英雄的队伍，他们象罗谟鲁斯和莱谟斯似的，是野兽的奶汁所喂养大的。这是些勇将，从头到脚都是纯钢打成的，他们是活泼的战士，自觉地走上明显的灭亡的道路，为的要惊醒下一辈的青年去取得新的生活，为的要洗清那些生长在刽子手主义和奴才主义环境里的孩子们。”（赫尔岑）

辛亥革命前的这些勇将们，现在还剩得几个？说近一些，五四时期的思想革命的战士，现在又剩得几个呢？“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历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不久还是会这么变化。”（鲁迅：《自选集序言》）

鲁迅说“又经历了一回”！他对于辛亥革命的那一回，现在已经不敢说，也真的不忍说了。那时候的“纯钢打成的”人物，现在不但变成了烂铁，而且……真金不怕火烧，到现在，才知道真正的纯钢是谁呵！辛亥革命前的士大夫的子弟，也有一些维新主义的老新党，革命主义的英雄，富国强兵的幻想家。他们之中，客观上领导了民权主义的群众革命运动的人，也并不是没有，而且，似乎也做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鲁迅也是士大夫阶级的子弟，也是早期的民权主义的革命党人。不过别人都有点儿惭愧自己是失节的公主的亲属。本来帝国主义的战神强奸了东方

文明的公主，这是世界史上的大事变，谁还能够否认？这种强奸的结果，中国的旧社会急遽的崩溃解体，这样，出现了华侨式的商业资本，候补的国货实业家，出现了市侩化的绅董，也产生了现代式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阶层。从维新改良的保皇主义到革命光复的排满主义，虽然有改良和革命的不同，而士大夫的气质总是很浓厚的。文明商人和维新绅董之间的区别，只在于绅董希望满清的第二次中兴，用康梁去继承曾左李的事业，而商人的意识代表（也是士大夫），却想到了另外一条出路：自己来做专权的诸葛亮，而叫四万万阿斗做名义上的主人。在这种根本倾向之下，当时的思想界，多多少少都早已埋伏着复古和反动的种子，要想恢复什么“固有文化”。独有现代式的小资产阶级知识阶层的萌芽，能够用对于科学文明的坚决信仰，来反对这种复古和反动的预兆。鲁迅和当时的早期革命家，同样背着士大夫阶级和宗法社会的过去。但是，他不但很早就研究过自然科学和当时科学上的最高发展阶段。而且他和农民群众有比较巩固的联系。他的士大夫家庭的败落，使他在儿童时代就混进了野孩子的群里，呼吸着小百姓的空气。这使得他真象吃了狼的奶汁似的，得到了那种“野兽性”。他能够真正斩断“过去”的葛藤，深刻地憎恶天神和贵族的宫殿，他从来没有摆过诸葛亮的臭架子。他从绅士阶级出来，他深刻地感觉到一切种种士大夫的卑劣，丑恶和虚伪。他不惭愧自己是私生子，他诅咒自己的过去，他竭力的要肃清这个肮脏的旧茅厕。

现代最伟大的革命政治家说过：“吃人经济的存在，剥削的存在永远要产生反对这种制度的理想，在被剥削的群众自己之中是如此，在所谓知识阶层的个别代表之中也是如此。这些理想对于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很宝贵的。”辛亥革命之前，譬如一九〇七年的时候，除出富国强兵和立宪民治之外，还有什么理想呢？不是伟大的天才，有敏锐的感觉和真正的世界的眼光，就不能够跳过“时代的限制”；就算只是容纳和接受外国的学说，也要有些容纳和接受的能力。而鲁迅在一九〇七年说：

轻才小慧之徒，于是竞言武事。……谓钩爪锯牙，为国家首事，又引文明之语，用以自文，……虽兜牟深隐其面，威武若不可陵，而干禄之色，固灼然现于外矣！计其次者，乃复有制造商估立宪国会之说。前二者素见重于中国青年间，纵不主张，治之者亦将不可缕数。盖国若一日存，固足以假力图富强之名，博志士之誉；即有不幸，宗社为墟，而广有金资，大能温饱……若夫后二，可无论已。……将事权言议，悉归奔走干进之徒，或至愚屯之富人，否亦善垄断之市侩……呜呼，古之临民者，一独夫也；由今之道，且顿变而为千万无赖之尤，民不堪命矣，于兴国究何与焉。（《坟·文化偏至论》）

这在现在看来，几乎全是预言！中国的资产阶级，经过了短期间的革命，而现在，那些一九〇七年时候的青年，热心于提倡而实行“制造商估”的青年，正在一面做“志士”，一面预备亡国，而且更进一步，积极的巧妙的卖国了。至于千万无赖之尤的假民权，也正在粉刷着新的立宪招牌。自然，鲁迅当时的思想基础，是尼采的“重个人非物质”的学说。这种学说在欧洲已经是资产阶级反动的反映，他们要用超人的名义，最“先进”的英雄和贤哲的名义，去抵制新兴阶级的群众的集体的进取和改革，说一切群众其实都是守旧的，阻碍进步的“庸众”。可是，鲁迅在当时的倾向尼采主义，却反映着别一种社会关系。固然，这种个性主义，是一般的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性的幻想。然而在当时的中国，城市的工人阶级还没有成为巨大的自觉的政治力量，而农村的农民群众只有自发的不自觉的反抗斗争。大部分的市侩和守旧的庸众，替统治阶级保守着奴才主义，的确是改革进取的阻碍。为着要光明，为着要征服自然界和旧社会的盲目力量，这种发展个性，思想自由，打破传统的呼声，客观上在当时还有相当的革命意义。只要看鲁迅当时的《摩罗诗力说》，他是要“举一

切诗人中，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摩罗是梵文，欧洲人说“撒但”，意思是天魔。鲁迅的叙说这些天魔诗人（裴伦等等），目的正在于号召反抗，推翻一切传统的重压的“东方文化”的国故僵尸。他是真正介绍欧洲文艺思想的第一个人。

在那时候——一九〇七年——他的这些呼声差不多完全沉没在浮光掠影的粗浅的排满论调之中，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响。如果不是《坟》里保存了这几篇历史文献，也许同中国的许多“革命档案”一样，就这么失散了。这些文献的意义，在于回答当时思想界的一个严重问题：群众这样落后怎么办？对于这个问题，当时革命思想界里有一个现成的答复，就是说，群众落后是天生的，因此，不要他们起来革命，等编练了革命军队来替他们革命，而革命成功之后也还不能够给民众自由，而要好好的教训他们几年。而鲁迅所给的答案却有些不同，他是说，因为民众落后，所以更要解放个性，更要思想的自由，要有“自觉的声音”，使它“每响必中于人心，清晰昭明，不同凡响”。这虽然也不是正确的立场，然而比“革命的愚民政策”总有点儿不同罢。问题是在于当时中国“亦颇思历举前有之耿光，特未能言，则姑曰左邻已奴，右邻且死，择亡国而较量之，冀自显其佳胜”，有了这种阿Q式的自譬自解，大家正在飘飘然的得意得很，所以始终是诸葛亮式的革命理论“胜利”，而对于科学艺术的努力进取的呼声反而沉没了。

鲁迅在当时不能够不感觉到非常之孤独和寂寞，他问：“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他说俄国文学家科罗连珂的《末光》里，叙述一个老人在西伯利亚教书，书上有黄莺，而那地方却冷得什么也没有，他的学生听说这黄莺会在樱花里唱出美妙的歌声，就只能够侧着头想象那黄莺叫的声音。这种想望多么使人感动呵。“吾人其亦沉思而已夫，其亦惟沉思而已夫！”（《坟·摩罗诗力说》）

然而鲁迅其实并不孤独的。辛亥革命的怒潮，不在于一些革命新贵的风起云涌，而在于“农人野老的不明大义”；他们以为“革命之后从此自由”（《总理全集》；《民元杭州欢迎会上演说辞》）。不明大义的贫民群众的骚动，固然是给革命新贵白白当了一番苦力，固然有时候只表现了一些阿Q的“白铠白甲”的梦想，然而他们是真的光明斗争的基础。精神界的战士只有同他们一路，才有真正的前途。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思想界就不可避免的完成了第一次的“伟大的分裂”；反映着群众的革命情绪和阶级关系的转变，中国的士大夫式的知识阶层就显然的划分了两个阵营：国故派和欧化派。这是在“五四”的前夜，《新青年》早期的新文化运动的开始时期。当时德谟克拉西先生和赛因思先生的联盟，继续开展了革命的斗争；这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深入，也就是现代式的知识阶层生长发展的结果。鲁迅的参加“思想革命”是在这时候就开始的。我们说他的“参加”开始，是因为在这之前，还没有什么可以参加的，他还只能够孤独的“沉思”。而在《新青年》发动了“新文化斗争”之后，反国故派方才成为整个的队伍。

辛亥之后，大家都可以懂得革命是失败了。但是，并不是个个人都得到继续统治的是谁。鲁迅说，这是些“现在的屠杀者，”“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而杀“现在”的自然是一些僵尸。那时候，还是完全的僵尸统治阿。

这些僵尸，封建性的军阀，官僚式的买办，自然要竭力维持一切种种的国故：宗法社会的旧道德，忠孝节义和腐烂发臭的古文化。他们——好比“妻女极多的阔人，婢妾成行的富翁，乱离时候，照顾不到，一遇‘逆兵’（或是‘天兵’），就无法可想。只得救了自己，请别人都做烈女；变成烈女，‘逆兵’便不要了。他便待事定以后，慢慢回来，称赞几句。”（《坟》：《我的节烈观》）这些将到“被征服的地位”的人，一定要提倡守节，一定要称赞烈女。而且为着保持自己的统治，自然更要提倡忠孝，因为活人总

要想前进，青年总想活动，只有死人可以拖住活的，老人可以管住小孩子，这样就天下太平了。

我想：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愚民（应当说是僵尸）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大家渐渐死下去，而自己反以为卫道有效……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华盖集·忽然想到之五》）

这固然是黎明期的新文化运动的一般精神，然而鲁迅在这时代已经表现了他的特点。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大家都不免想做青年的新的导师；而诚实的愿意做一个“革命军马前卒”的，却是鲁迅。他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他没有自己造一座宝塔，把自己高高供在里面，他却砌了一座“坟”，埋葬他的过去，热烈的希望着这可诅咒的时代——这过渡的时代也快些过去。他这种为着将来和大众而牺牲的精神，贯穿着他的各个时期，一直到现在，在一切问题上都是如此。举一个例说罢。白话运动初起的时候，钱玄同之流不久就开倒车，说《三国演义》那样的文言白话夹杂的“言语”就是“合于实际的”模范，理想不可以过高。而另一方面，也有人着重的说明文章的好坏不在于文言白话的分别，而都靠天才，或者要白话好还应该懂古文。这样，每一个新文学家，都在运用“天才”创造新白话文的模范。鲁迅说：“这实在使我打了一个寒噤。……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而“许多青年作者又在古文，诗词中摘些好看而难懂的字面，作为变戏法的手巾，来装潢自己的作品了”。（《坟》：《写在“坟”后面》，“新文学兴起以来，未忘积习而常用成语如我的和故意作怪而乱用谁也不懂的生语如创造社一流的文字，都使文艺和大众隔离。”（《三闲集·“小小十年”小引》）我自己以为只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应该和光

阴偕逝，逐渐销亡”（《写在“坟”后面》）。然而正因为如此，他这“桥梁”才是真正通达到彼岸的桥梁，他的作品才成了中国新文学的第一座纪念碑；也正因为如此，他的确成了“青年叛徒的领袖”。

“五四”前后，《新青年》的领导作用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当时反对宗法礼教，反对国故，主张妇女和青年的解放，主张白话文学，——“理想”的浪潮又激动起来，革命的知识青年开始寻找新的出路，新的前途。然而大家都应该记得，这时期之前不久，正是辛亥革命之后的反动，——横梗在思想界前面的重要问题，是理想没有用处，革命的乱闹就是由于一味理想。当时的反动派，的确“提高了他的喉咙含含糊胡说：‘狗有狗道理，鬼有鬼道理，中国与众不同，也自有中国的道理。道理各各不同，而一味理想，殊堪痛恨，’”（《热风》：《随感录》三十九）。对于这个问题的答复，却是新文化运动内部分化的开始。不用说，那些治国平天下的老革命党其实是被反动派难倒了，他们赶紧悔过，说以前我们只会破坏，现在要考究建设了；至于理想过高，民众理会不到，那么，革命党本来就不要民众理会，民众总是不知不觉的，叫他们“一味去行”，让我们替他们建设理想好了！这是老革命党的投降。而新革命党呢？“五四”之后不久，“新青年”之中的胡适之派，也就投降了；反动派说一味理想不行，胡适之也赶着大叫“少研究主义，多研究问题”。这种美国市侩式的实际主义，是要预防新兴阶级的伟大理想取得思想界的威权。而鲁迅对于这个问题——革命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分水岭的问题，——是站在革命主义方面的。他揭穿那些反理想重经验的人的假面具，指出他们的所谓“经验”正是皇帝和奴才的经验！

鲁迅在“五四”前的思想，进化论和个性主义还是他的基本。他热烈的希望着青年，他勇猛的袭击着宗法社会的僵尸统治，要求个性的解放。可是，不久他就渐渐了解到封建的等级制度和中国社会里的层层压榨。一九二四——二五年，他的《春

末闲谈》，《灯下漫笔》，《杂忆》（《坟》），以及整部的《华盖集》，尤其是一九二六的《华盖集续编》，都包含着猛烈的攻击阶级统治的火焰。自然，这不是社会科学的论文，这只是直感的生活经验。但是他的神圣的憎恶和讽刺的锋芒，都集中在军阀官僚和他们的叭儿狗。“五四”到“五卅”前后，中国思想界里逐步的准备着第二次的“伟大的分裂”。这一次已经不是国故和新文化的分裂，而是新文化内部的分裂：一方面是工农民众的阵营，别方面是依附封建残余的资产阶级。这新的反动思想，已经披了欧化，或所谓五四化的新衣服。这个分裂直到一九二七年下半年方才完成，而在一九二五——二六的时候，却已经准备着，只要看当时段祺瑞、章士钊的走狗“现代评论”派，在一九二七年之后是怎样的得其所哉，就可以知道这中间的奥妙。而鲁迅当时的《语丝》，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和批评，正是针对着这些未来的“官场学者”的。现在的读者往往以为《华盖集》正续编里的杂感，不过是攻击个人的文章，或者有些青年已经不大知道陈西滢等类人物的履历，所以不觉得很大的兴趣。其实，不但陈西滢，就是章士钊（孤桐）等类的姓名，在鲁迅的杂感里，简直可以当做普通名词读，就是认做社会上的某种典型。他们个人的履历倒可以不必多加考究，重要的是他们这种“媚态的猫”，“比它主人更严厉的狗”，“吸人的血还要预先哼哼地发一通议论的蚊子”，“嗡嗡地闹了半天，停下来舐一点油汗，还要拉上一点蝇矢的苍蝇”……到现在还活着，活着！揭穿这些卑劣，懦怯，无耻，虚伪而又残酷的刽子手和奴才的假面具，是战斗之中不可少的阵线。

的确，旧的卫道先生们渐渐的没落了，于是需要在他们这些僵尸的血管里，注射一些“欧化”的西洋国故和牛津剑桥哥伦比亚的学究主义，再加上一些洋场流氓的把戏，然后僵尸可以暂时“复活”，或者多留恋几年“死尸的生命”。这些欧化绅士和洋场市侩，后来就和“革命军人”结合了新的帮口，于是僵尸统治，变成了戏子统治。僵尸还要做戏，自然是再可怕也没有了。

“中国的原始积累式的商业资本，在乡村之中和封建统治的地主有一种特别形式的结合。中国的军阀和一切残酷无情抢劫民众的文武官僚，都是中国这种特别形式的结合的上层建筑。帝国主义和他们所有的一切财政上军事上的力量，就在中国维持并且推动这些封建残余以及它们的全部军阀官僚的上层建筑，使它们欧化，又使它们守旧。”（约瑟夫）这就是中国僵尸欧化的原因。袁世凯以来的北洋军阀要想稳定这种新的统治，但是，他们只会运用一些“六君子”之类“开国元勋”，“后来的武人可更蠢了，……除了残虐百姓之外，还加上轻视学问，荒废教育的恶名”（《华盖集续编·一点比喻》）。问题是在于要统治奴隶就要有一定的奴隶规则（《坟·灯下漫笔》），而新的奴隶规则，要新的“山羊”来帮忙才定得出来。这样的山羊，“脖子上还挂着一个铃铎，作为知识阶级的徽章。……能领了群众稳妥平静地走去，直到他们应该走到的所在。……这是说：虽死也应该如羊，使天下太平，彼此省力”（《华盖集续编·一点比喻》）。段祺瑞章士钊时代——五卅时代的陈西滢们，就企图做成这样的“山羊”。虽然这企图延长了若干年，而他们现在是做“成功”了！新的朝代，有了新的“帮忙文人”，而且已经象生殖力最强的猪猡和臭虫似的，生出了许许多多各种各式的徒子徒孙。当时——一九二五，二六年——他们的努力，例如剿杀“学匪”，或者请出西哲勋本霍尔来痛打女师大的“毛丫头”之类，总算不是枉费的。

鲁迅当时反对这些欧化绅士的战斗，虽然隐蔽在个别的甚至私人的问题之下，然而这种战斗的原则上的意义，越到后来就越明显了。统治者不能够完全只靠大炮机关枪，一定需要某种“意识代表”。这些代表们的虚伪和戏法是无穷的。暴露这些“做戏的虚无主义者”（《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也就必须有持久的韧性的斗争。

他们在“五卅”的时候，说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是“分裂与猜忌的现象”（徐志摩），说中国人的“打，打，宣战，宣战”，是“这样的中国人，呸！”——这意思是中国人该被打而不做声

(陈西滢)。他们在“三一八”之后，立刻就说“执政府前原是‘死地’，……群众领袖应负道义上的责任”。这些“墨写的谎说”难道掩得住“血写的事实吗”！？然而鲁迅在这一次做了一个“错误”：“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华盖集续编·纪念刘和珍君》）他在当时已经说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然而他更不料一两年后的黑暗会超越“三一八”屠杀的几百千倍。鲁迅如果有“错误”，那么，我们不能够不同意他自己的批评：“我还欠刻毒！”地主官僚和资产阶级社会的丑恶，实在远超出于文学家最深刻的“构陷别人的罪状”！而文饰这种丑恶的，正是那些山羊式的文人。

所以当“五卅”时期，一般人，甚至革命者的思想，都在“一致对外”的口号之下，多多少少忽略了国内的阶级战斗的同时开展；这又是新的阶段的更加严重的问题。而鲁迅就提出这样的质问：“然而中国有枪阶级的焚掠平民，屠杀平民，却向来不很有人抗议。”（《华盖集》：《忽然想到之十一》）回答这个问题的，是“五卅”之后的巨大的群众革命浪潮。革命是在进到新的阶段，“死者的遗给后来的功德，是在撕去了许多东西的人相，露出那出于意料之外的阴毒的心，教给继续战斗者以别种方法的战斗”（《华盖集续编·空谈》）。这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就必须打倒这些阴毒“东西”——动物！就不再是请愿，不只是“和平宣传”，不是合法主义，而是……

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之二》）

此后的“血债”是越拖越多了。

泪揩了，血消了；
屠伯们逍遥复逍遥，

用钢刀的，用软刀的。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而已集·题辞》）

僵尸的统治转变成戏子的统治，这个转变完成之后不善于做戏的僵尸虽然退了位，而会变戏法的僵尸就更加猖獗起来。活人和死人的斗争，灭亡路上的阶级的挣扎和新兴阶级领导的群众的反抗，经过一番暴风雨的剧变而进到了新的阶段。鲁迅说：“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那些吞吞吐吐没有胆子直说的话，都载在《而已集》里。”就是以后的《三闲集》（一九二八——二九），《二心集》（一九三〇——三一），又何尝不是哭笑不得的“而已”！可是，正是这期间鲁迅的思想反映着一般被蹂躏被侮辱被欺骗的人们的彷徨和愤激，他才从进化论最终的走到了阶级论，从进取的争求解放的个性主义进到了战斗的改造世界的集体主义。如果在以前，鲁迅早就感觉到中国社会里的科举式的贵族阶级和租佃官僚制度之下的农奴阶级之间的对抗，那么，现在他就更清楚的见到那种封建式的阶级对抗之外，正在发展着资本和劳动的对抗。他“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然而他“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他的“思路因此轰毁”（《三闲集·序言》）。是的，以前“父与子”的辈分斗争只是前一阶段的阶级斗争的外套，现在——封建宗法残余的统治搀杂了一些流氓资本的魔术，——不但更明显的露出劳动和资本的阶级战斗，而且反封建残余的斗争也不再是纯粹的“父与子”斗争的形式。同时，新兴阶级的领导展开了真正推翻帝国主义和僵尸，推翻流氓资本和地主官僚的新结合的远景。贫民小资产阶级和革命知识阶层，终于发见了他们反对剥削制度的朦胧的理想，只有同着新兴的社会主义的先进阶级前进，才能够实现，才能够在伟大的斗争的集体之中达到真正的“个性解放”。

这样，当时革命“过程”在思想界的反映，就是五四式的知识阶层的最终的分化：一些所谓欧化青年完全暴露了自己是“丧

家的”或者“不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替新的反动去装点一下摩登化的东洋国故和西洋国故。而另外一些革命的知识青年却更确定更明显地走到劳动民众方面来，围绕着革命的营垒。最优秀的最真诚的不肯自己背叛自己的光明理想的分子，始终是要坚决的走上真正革命的道路的。

最早期的真正革命文学运动——五四式的新文学分化之后的革命文学运动，——不能够不首先反对摩登化的遗老遗少，反对重新摆上的“吃人的筵宴”，以及这种筵宴旁边的鼓乐队。蹂躏革命“战士的精神和血肉……赏玩，攀折这花，摘食这果实的人们”，这些流氓式的戏子，扶着几乎断送“死尸的生命”的僵尸，“稳定了”他们的新的统治。于是乎他们的鼓乐队里，就搀和了些“意大利的唐南遮，德国的霍普德曼（冤枉！），西班牙的伊本纳兹，中国的吴某某”等等，而偏偏还要说这是革命文学！这其实是“在指挥刀的掩护之下斥骂他的敌手的”低能儿（《而已集·革命文学》），这其实是段政府之下的陈西滢们的徒子徒孙。据说是段祺瑞等投降了“革命”，陈西滢们“转变了”方向，然而就社会的意义上来说，究竟是谁投降了谁，谁转变了方向，是大成问题的。这时候的新鲜戏法，只在于：“‘命’自然还是要革的，然而又不宜太革……剩了一条‘革命文学’的独木小桥，所以外来的许多刊物，便通不过，扑通！扑通！都掉下去了。”（《而已集·扣丝杂感》）

“独木小桥”始终只是独木小桥。那些“扑通，扑通”掉下去的却学会了游水。真正的革命文艺思想正在这一时期开始深入的发展。在这新阶段上，革命文艺思想经过内部的斗争而逐渐的形成新的阵营。这种不可避免的斗争提出了新的问题，这已经不是父与子的问题，也不仅是暴露指挥刀后的屠伯们的问题。这是关于革命队伍的战略的争论。

新兴阶级的文艺思想，往往经过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作家的转变，而开始形成起来，然后逐渐的动员劳动民众和工人之中的新

的力量。集中新的队伍，克服过去的“因袭的重担”，同时，扩大同路人的阵线。这不但在日本，美国，德国，甚至于在苏联，也经过波格唐诺夫式的幼稚病。关于这种幼稚病，德国的皮哈曾经说过：一些小集团居然自以为独得了“工人阶级的文化代表的委任状”——包办代表事务。这大概是“历史的误会”。创造社的转变，太阳社的出现，只在这方面讲来，是有客观上的革命意义的。

然而革命军进行的时候，“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二心集·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无产阶级和周围的各种小资产阶级之间本来就没有一座万里长城隔离着。何况小资产阶级又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阶层和集团呢。

小资产阶级的知识阶层之中，有些是和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受尽了欺骗压榨束缚愚弄的农民群众联系着。这些农民从几千百年的痛苦经验之中学会了痛恨老爷和田主，但是没有学会，也不能够学会怎样去回答这些问题，怎样去解除这种痛苦。“旧社会将近崩坏之际，是常常会有近似带革命性的文学作品出现的。然而其实并非真的革命文学。例如：或者憎恶旧社会，而只是憎恶，更没有对于将来的理想；或者也大呼改造社会，而问他要怎样的社会，却是不能实现的乌托邦。”（《三闲集·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然而，宽泛些说，这种文艺当然也是革命的文学，因为它至少还能够反映社会真相的一方面，暗示改革所应当注意的方向。而同时，这些早期的革命作家，反映着封建宗法社会崩溃的过程，时常不是立刻就能够脱离个性主义——怀疑群众的倾向的；他们看得见群众——农民小私有者的群众的自私，盲目，迷信，自欺，甚至于驯服的奴隶性，可是，往往看不见这种群众的“革命可能性”，看不见他们的笨拙的守旧的口号背后隐藏着革命的价值。鲁迅的一些杂感里面，往往有这一类的缺点，引起他对于革命失败的一时的失望和悲观。

另一方面，“五四”到“五卅”之间中国城市里迅速的积聚

着各种“薄海民”（Bohemian）——小资产阶级的流浪人的知识青年。这种知识阶层和早期的士大夫阶级的“逆子贰臣”，同样是中国封建宗法社会崩溃的结果，同样是帝国主义以及军阀官僚的牺牲品，同样是被中国畸形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过程所“挤出轨道”的孤儿。但是，他们的都市化和摩登化更深刻了，他们和农村的联系更稀薄了，他们没有前一辈的黎明期的清醒的现实主义，——也可以说是老实的农民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反而传染了欧洲的世纪末的气质。这种新起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的“热度”关系，往往首先卷进革命的怒潮，但是，也会首先“落荒”或者“颓废”，甚至“叛变”，——如果不坚决的克服自己的浪漫谛克主义。“这种典型最会轻蔑地点着鼻子说：‘我不是那种唱些有机的工作，实际主义和渐进主义的赞美歌的人。’这种典型的社会根源是小资产者，他受着战争的恐怖，突然的破产，空前的饥荒和破坏的打击而发疯了，他歇斯替利地乱撞，寻找着出路和挽救，一方面信仰无产阶级而赞助它，别方面又绝望地狂跳，在这两方面之间动摇着。（乌梁诺夫）这种人在文艺上自然是“才子”，自然不肯做“培养天才的泥土”，而很早“便恨恨地磨墨，立刻写出很高明的结论道：‘唉，幼稚得很。中国要天才！’”（《坟·未有天才之前》革命的怒潮到了，他们一定是革命的；革命的暂时失败了，他们之中也一定有些消极，有些叛变，有些狂跳，而表示一些“令人‘知道点革命的厉害’，只图自己说得畅快的态度，也还是中了才子+流氓的毒”（《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于是“包办”工人阶级文艺代表的“事务”。

《三闲集》以及其他杂感集之中所保留着的鲁迅批评创造社的文章，反映着二七年以后中国文艺界之中这两种态度，两种倾向的争论。自然，鲁迅杂感的特点，在那时特别显露那种经过私人问题去照耀社会思想和社会现象的笔调。然而创造社等类的文学家，单说真有革命志愿的（象叶灵凤之流的投机分子，我们不屑去说到了），也大半扭缠着私人的态度，年纪，气量以至酒量的问题。至少，这里都表现着文人的小集团主义。

这时期的争论和纠葛转变到原则和理论的研究，真正革命文艺学说的介绍，那正是革命普罗文学的新的生命的产生。而还有人说：那是鲁迅“投降”了。现在看来，这种小市民的虚荣心，这种“剥削别人的自尊心”的态度，实在天真得可笑。

这是已经过去的问题了，也应当是过去的了。

鲁迅现在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三闲集·序言》）“我时时说些自己的事情，怎样地在‘碰壁’，怎样地在做蜗牛，好象全世界的苦恼，萃于一身，在替大众受罪似的：也正是中产的知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二心集·序言》）

鲁迅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友人，以至于战士，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历和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他终于宣言：“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二心集·序言》）关于最近期间，“九一八”以后的杂感，我们不用多说，他是站在战斗的前线，站在自己的哨位上。他在以前，就痛切的指出来：“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坟·灯下漫笔》），而现在，这句话里的“青年”两个字上面已经加上了新的形容词，甚至于完全换了几个字，——他在日本帝国主义动手瓜分，英美国联进行着共管，而中国的绅商统治阶级耍着各种各样的戏法零夏发卖中国的时候，——忍不住要指着那些“民族主义文学家”说：“他们将只尽些送丧的任务，永含着恋主的哀愁，须到……阶级

革命的风涛怒吼起来，刷洗山河的时候，这才能脱出这沉滞猥劣和腐烂的命运。”（《二心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命运》）

然而鲁迅杂感的价值决不止此。他自己说：“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坟·写在〈坟〉后面》）从满清末期的士大夫，老新党，陈西滢们……一直到最近期的洋场无赖式的文学青年，都是他所亲身领教过的。刽子手主义和僵尸主义的黑暗，小私有者的庸俗，自欺，自私，愚笨，流浪赖皮的冒充虚无主义，无耻，卑劣，虚伪的戏子们的把戏，不能够逃过他的锐利的眼光。历年的战斗和剧烈的转变给他许多经验和感觉，经过精炼和融化之后，流露在他的笔端。这些革命传统（revolutionary tradition）对于我们是非常之宝贵的，尤其是在集体主义的照耀之下：

第一，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悟。”（《坟·论睁了眼》）这种思想其实反映着中国的最黑暗的压迫和剥削制度，反映着当时的经济政治关系。科举式的封建等级制度，给每一个“田舍郎”以“暮登天子堂”的幻想；租佃式的农奴制度给每一个农民以“独立经济”的幻影和“爬上社会的上层”的迷梦。这都是几百年来“空前伟大的”烟幕弹。而另一方面，在极端重压的没有出路的情形之下，散漫的剥夺了取得知识文化的可能的小百姓，只有一相情愿的找些“巧妙”的方法去骗骗皇帝官僚甚至于鬼神。大家在欺人和自欺之中讨生活。统治阶级的这种“文化遗产”甚至于象沉重的死尸一样，压在革命队伍的头上，使他们不能够迅速的摆脱。即使“到处听不见歌吟花月的声音了，代之而起的是铁和血的赞颂。然后倘以欺瞒的心，用欺瞒的嘴，则无论说A和O，或Y和Z，一样是虚假的”（同上）。鲁迅是竭力暴露黑暗的，他的讽刺和幽默，是最热烈最严正的对于人生的态度。那些笑他“三个冷静”的人，固然只是些嗡嗡嗡的苍蝇。就是嫌他冷嘲热讽的“不庄严”的，也还是不了解他，同

时，也不了解自己的“空城计”式的夸张并不是真正的战斗。可是，鲁迅的现实主义决不是第三种人的超然的旁观的所谓“科学”态度。善于读他的杂感的人，都可感觉到他的燃烧着的猛烈的火焰在扫射着猥劣腐烂的黑暗世界。“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同上）

第二，是“韧”的战斗。“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我们急于要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但同时，在文学战线上的人还要‘韧’。”（《二心集》五六页）“野牛成为家牛，野猪成为猪，狼成为狗，野性是消失了，但只足使牧人喜欢，于本身并无好处。……我以为还不如带些兽性，如果合于下列的算式倒是不很有趣的：人+家畜性=某一种人。”（《而已集·略论中国人的脸》）而兽性就在于有“咬筋”，一口咬住就不放，拼命的刻苦的干去，这才是韧的战斗。牧人们看见小猪忽然发一阵野性，等忽儿可驯服了，他们是不忧愁的。所以这种兽性和韧的战斗决不是歇死替利地可以干得来的。一忽儿“绝望的狂跳”，一忽儿又“萎靡而颓伤”，一忽儿是嚣张的狂热，一忽儿又捶着胸脯忏悔，那有什么用处。打仗就要象个打仗。这不是小孩子赌气，要结实的立定自己的脚跟，躲在壕沟里，沉着的作战，一步步的前进，一这是鲁迅所谓“壕堑战”的战术。这是非合法主义的战术。如果敌人用“激将”的办法说：“你敢走出来”，而你居然走了出去，那么，这就象许褚的赤膊上前阵，中了箭是活该。而笨到会中敌人的这一类的奸计的人，总是不肯，也不会韧战的。

第三，是反自由主义。鲁迅的著名的“打落水狗”（《坟·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真正是反自由主义，反妥协主义的宣言。旧势力的虚伪的中庸，说些鬼话来混杂在科学里，调和一下，鬼混一下，这正是它的诡计。其实这斗争的世界，有些原则上的对抗事实上是决不会有调和的。所谓调和只是敌人的缓兵之计。狗可怜

到落水，可是它爬出来仍旧是狗，仍旧要咬你一口，只要有可能的话。所以“要打就得打到底”——对于一切种种黑暗的旧势力都应当这样。但是死气沉沉的市侩，——其实他们对于在自己手下讨生活的人一点儿也不死气沉沉，——表面上往往会对所谓弱者“表同情”，事实上他们有意的无意的总在维持着剥削制度。市侩，这是一种狭隘的浅薄的东西，它们的头脑（如果说这是头脑的话），被千百年来的现成习惯和思想圈住了，而在这个圈子里自动机似的“思想”着。家庭，私塾，学校，中西“人道主义”的文学的影响，一切所谓“法律精神”和“中庸之道”的影响，把市侩的脑筋造成了一种简单机器，碰见什么“新奇”的，“过激”的事情，立刻就会象留声机似的“啊呀呀”的叫起来。这种“叭儿狗”“虽然是狗，又很象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唯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鲁迅这种暴露市侩的锐利的笔锋，充分的表现着他的反中庸的，反自由主义的精神。

第四，是反虚伪的精神。这是鲁迅——文学家的鲁迅，思想家的鲁迅的最主要的精神。他的现实主义，他的打硬仗，他的反中庸的主张，都是用这种真实，这种反虚伪做基础。他的神圣的憎恶就是针对着这个地主资产阶级的虚伪社会，这个帝国主义的虚伪世界的。他的杂感简直可以说全是反虚伪的战书，譬如别人不大注意的《华盖集续编》就有许多猛烈而锐利的攻击虚伪的文字，久不再版的《坟》里的好些长篇也是这样。而中国的统治阶级特别善于虚伪，他们有意无意的要把虚伪笼罩群众的意识；他们的虚伪是超越了全世界的记录了。“中国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们的对于神，宗教，传统的权威，是‘信’和‘从’呢，还是怕‘怕’和‘利用’？只要看他们的善于变化，毫无持操，是什么也不信从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要寻虚无党，在中国实在很不少；……”他们什么都不信，但是他们“虽然这样想，却是那么说，在后台这么做，到前台可那么做”……这叫做“做戏的虚无党”（《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虚伪到这

地步，其实是顶老实了。西洋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者或者民权主义者，或者改良妥协的所谓社会主义者，至少在最初黎明期的时候，自己也还蒙在鼓里，一本正经的信仰着什么，或者理论，或者宗教，或者道德——这种客观上的欺骗作用比较的强些。——而中国的是明明知道什么都是假的，不过偏要这么说说，做做，骗骗人，或者简直武断地乱吹一通，拿来做杀人的理论。自然，自从西洋发明了法西斯主义，他们那里也开始中国化了。呜呼，“先进的”中国呵。

自然，鲁迅的杂感的意义，不是这些简单的叙述所能够完全包括得了的。我们不过为着文艺战线的新的任务，特别指出杂感的价值和鲁迅在思想斗争史上的重要地位，我们应当向他学习，我们应当同着他前进。

一九三三，四，八，北平。

关于整理中国文学史的问题

T. ИлчHH:

承你送我一本《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的书，谢谢。单是看看这书上引证的一些古书的名称，就使得我想起十五六岁时候的景象。什么《廿二史札记》等等的书，我还是在那时候翻过的——十几年来简直忘掉了它们的存在。整理这“乙部”的国故，其实是很重要的工作。中国的历史还只是一大堆“档案”，其中关于经济条件的材料又是非常之少。中国的“社会的历史”，真不容易写。因此文学史的根据也就难于把握。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

但是，大致的一个轮廓还是容易寻找到的。自然，譬如杨筠如做的这本《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只不过汇集一些材料，不但没有经济的分析，并且没有一点儿最低限度的社会的政治的情形底描写。

中国的封建制度的命运是有些“别致”。通常总想在中国创造一些特殊的学说，比方说中国没有封建制度，说中国是商业资本“主义”的社会，说中国没有贵族等等。那些“学者”预先把欧洲的封建制度作为一个政治上形式上的模范，然后再把中国的历史事实去比较，就“发明”了这些“新奇的学说”。其实，同样生产方法，生产力的一定程度，决定的是一般的封建制度的基础，而每个时期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尤其是阶级关系，阶级力量的对比，历史上的习惯，宗教哲学思想……的“反过来影响”社会生活等等——都可以使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时期的封建制度带

《关于整理中国文学史的问题》是瞿秋白写给鲁迅的信，当时未发表。一九五三年十一月根据瞿秋白手稿编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瞿秋白文集》第二卷，题目为《文集》编者所加。

着一些特殊的形式，特殊的色彩。

其实，就是意大利，法兰西，英国……的 Aristocracy 何尝是相同的，中世纪的日耳曼民族的贵族，奥国大帝国时代的 Junker，古代俄国的 Boyar，后来的 Boyarin，彼得大帝时代的 Droryanin，波兰，保加利亚，以及回教民族里的所谓 Mufa 等等，都是互相不同的。

西欧式的封建制度也有一千多年；每二三百年来，每一个区域，也有些特殊的互相不同的形式，以及逐渐的“形态上的变化”。但是，一般欧洲的历史记载和通俗的对于“贵族”的解释把中国的学者弄糊涂了。中国的特点就在于：封建制度的崩坏和复活，复活和崩坏的“循环”的过程，曾经经过三四次（最古代的战国时期还不算在内）。这样的转变过程往往使得

旧时王谢堂前燕，
飞入寻常百姓家。

而一般“屠沽市侩”，“舆台隶卒”利用农民暴动的没有真正的领导，反而爬到了社会的上层，变成了新的贵族。汉朝和明朝是最显著的例子。其他的“丧乱的季世”也有无数的个别的事实。“六朝门阀”这本书里就描写着东汉“孝廉茂才制度”的堕落和转变，以及陈群大人的苦心——恢复典章文物的努力。现在的潘光旦先生一定要“发见”陈群是三国时代的“不自觉的优生学家”了，一笑！其实“民国”以来的张宗昌等类的新贵族不过“命运”不好罢了。他们假使生在明清时代的环境，甚至于象太平天国的“封王”的情形之下，给他们几十年的镇静功夫，他们一样会复兴一种“九品中正”“八比文章”“考试院”的制造贵族的制度，然后重新规定一些“士族”，“大夫族”……等类的门阀。那时候，也许姓张的老祖宗虽然是张宗昌，面子孙却算是世族大家呢。欧洲的贵族史之中也有不少记载，可以证明这种贵族最早的出身是简单的“保镖的”（象四川的“护商队”）。

自然可以说欧洲贵族大半是“武士道”而中国的却是“文士道”。

然而这是形式上的分别，这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国的“深入的”小农经济，促成了一种特殊的佃农制度，同时，中国的最大的旧式工商业的枢纽（例如盐，铁，铜，锡，磁器，顾绣，河工……）事实上握在官僚贵族的手里；最主要的高利贷资本和货币资本也是这样，以前当铺钱庄银号是货币资本（money capital）就是现在的新式银行也还是这种资本的变相，不过它们直接变成了帝国主义的财政（金融）资本的附庸。这样，表面上贵族和地主两个“身分”不象西欧那么混合得紧凑，而是官僚和贵族的“两位一体”。而实际上仍旧是贵族地主官僚的三位一体制度。做官的在衙门里是官，在本地是绅士（贵族），也就是地主。在汉朝到六朝的时代，已经有绅士互推头脑（所谓中正）的制度。前清末年——我的年纪还是很轻，只够得上记得光绪末年和宣统年间的一些模糊的影象，——地方上的绅士的势力，象苏常一带，就很大的。那时事实上的“中正”还是有的。每一县里的绅士都有事实上的头脑。因为几帮钱庄当铺的竞争也就发生几派首领不断的排挤倾轧斗争的现象。这些绅士早就是当铺钱庄的后台老板，后来象盛宣怀等类的子弟的“欧化”绅士就居然公开的做前台老板了。我这一辈人已经只看见一些“市侩”迅速的变成绅士的过程，因为我有知识的时候，正是“商会时代”的开始和捐官时代的末日了。现在不是简单的绅士“中正”了，现在早已是“绅商”“中正”了。——商会就是现在的中正。贵族的每个阶层，每个派别，在朝的和在野的之间的关系等等，自然是极端繁杂的一种现象。如果，我们能够研究出从汉朝到清末的这个问题的历史，那实在是很有趣的。文学上的贵族和市侩的“矛盾”或者冲突，混合或者搀杂各种各式的“风雅”，“俗物”的概念，以及你说过的“帮忙”和“帮闲”的问题，都和这门阀史有密切的关系。

所谓门阀，就是封建式的阶级。你说起刑不上大夫的古话，

我想起直到清朝末年还是保存着这个门阀的分别。是不是以前“有功名的人”，第一，见着“父母官”是不要跪的，第二，有了小的过失要交给“学老师”去打手心，第三，犯了重罪必须先革去了秀才举人的头衔，然后才能够打他的“屁股”？这很可以写一篇“脚膝，屁股，手心的故事”，你不是有一篇《头发的故事》吗？——一笑。

不但如此，这些“士族”不但有“屁股不挨打”的特权，而且有“打别人屁股”的特权。

我小时候最强烈的印象和记忆，就和这打屁股问题有些关系。我们完全是城里人，真正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但是，是个“乡绅”人家。记得大概是十岁那年，大年初一，爸爸买了一部《三国演义》给我，我在走廊里翻着那书上的“绣象”看，正在看得得劲的时候，听见哗朗朗的一声响，象是整桌的碗盏都打翻在地下了，接着就是父亲的骂声：

“混账东西，办他！拿我的片子，送他到衙门里去！”

后来，我打听，那被“送去”的人是打了二十下屁股。为着什么事情——我记不得了。但是，随便拿一张大红名片可以打人家的屁股，这使得我非常的奇怪。而且衙门究竟是什么东西，我也是那时候打听清楚的。因此，张飞大打督邮那一回书，我看得特别有滋味；而尤其有意思的是张角他们的造反。我想：“你们要打人家的屁股，人家自然要造反，为什么又要叫人家是黄巾贼呢？”

“门阀”——我们现在翻译外国文的时候，通常总译做等级，这是和阶级不同的。俄文叫做“Сословие”，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叫做 état（记不大清），英文字典里总是写 rank——但是我想在历史上也许有专门名词的，我以前曾经查过，总没有查着。

列宁曾经说过：

大家知道的——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阶级（Класс）的分别是把人民镟定在几种等级（Сословие）里面，

这就是对于每个阶级在国家里的地位都有法律上的特殊的规定。因此，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农奴社会）里的阶级同时也是特殊的等级。

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社会，却是相反的，一切公民在法律上是平等的，等级的分别已经取消了（至少在原则上），所以这里的阶级已经不是等级。阶级的分别，在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里，是同样都有的，不过在头两种社会里（指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有等级式的阶级（Класс—сословие）而在后一种社会里——只有非等级的阶级（Классбессословный）。

中国的等级制度既然有这样长期的历史和转变，有这样复杂的变动的过程，它在文学上是不会没有反映的。文言文学和白话文学的划分，显然带着等级的痕迹。所以：

第一，文学史的整理，首先要看清中国的高文典籍，一切文言的文学，都是贵族的文学（或者叫它士族文学，“君子”文学）。这里，有些典籍是“士君子”用自己的文字，或者标音符号（形声字和假借字）记载的一些民歌，——当时的一些平民的口头文学。但是这是极少数的。他们的记载也是极不准确的，他们的阶级立场常常不容许他们正确的去了解平民的意思，而且他们这些“远东古文化的代表”采用了一种最笨拙的“象形文字”（马克思曾经说古代文明的民族之中希腊人是“活泼的小孩子”，而有些东方古代民族是“老头子似的小孩子”，没有生气的呆笨的，甚至于是“低能儿”。中国的古代礼教，什么走上东边的阶沿一定要走几步，走上西边的阶沿又一定要踱几步等等，很使我们想起马克思的这个形容词“老头子似的”！而中国的文字比起古希腊文来，也教人发生这种感想。这是世界一切混蛋文字之中的最混蛋的文字）。中国的贵族不会演说，没有印度的“辩才无碍”的演说术。中国的贵族文学却反而变成了“梵呗”之类的咒语——和实际说话脱离了的一种特别腔调，也许可以叫做“古腔

今调”（甚至于教育部最近公布的国音字汇的说明书上，还顾虑着“故国三千里……”的“国”字不能够读做阳平声，因此〔!〕，必须保存入声的一种读法）。这些原因，使得文言文更加和平民等级隔离。

第二，索性单独的提出贵族文学史。这是和整个“远东古国史”的整理联系着的。希腊罗马的文学史可以研究，因为希腊罗马的一般社会史已经有了比较清楚的研究。而古代中国的历史——直到清朝为止，还只有一些杂乱的材料。因此，我们要来研究中国的文学史，就格外困难。其实，文言文学史的价值，只有希腊罗马文学史的那样价值。

第三，中国贵族文学史之中：一，要注意等级制度在文学内容上的反映；二，要注意它受着平民生活和口头文学的影响；三，要注意它企图影响平民，客观上的宣传作用，安慰，欺骗，挑拨，离间的手段；四，要注意它每一时期的衰落，堕落，甚至于几乎根本消灭的过程（例如元朝的所谓戏曲兴起的时候，古文学，诗，词，等等的气焰低微到极点，现在一般人简直除元遗山以外，不知道还有什么元朝的文学家）；以及它跟新贵族的形成而又复活起来，适应着当时许多特殊条件而发生“形态上的变化”。

第四，中国贵族的文学，和其他各国的封建时代一样，承接着古代的封建以前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等类的古代文化，文学和宗教上，哲学上，科学上，政治上的一般实用“文章”还没有完全分化。所以历史的歌诀（《书经》之类其实和《汤头歌诀》，等韵歌诀，江湖口诀是同一题材），记载，诏令，论文，都作为文学。而且因为文字的拙劣，文法的形成非常困难，所以一般只在讲究一句话怎样说，一件事怎样记载的技术。这些仅仅是文法学，修辞学上的问题，几乎占领了“文学”的全部。金圣叹那样的才子也只会用批八股的方法去批评《西厢》《水浒》。直到五四时期，胡适之的工作也还只限于考据版本和“发明”一些旧小说的描写方法。

我们的文学史必须注重在内容方面：每一个时代的阶级斗争的反映，各种等级，各种阶层，各种“职业”或者“集团”的人生观的变更，冲突。而贵族文学之中的纯粹文学部分——赋，诗，词，再宽泛些，包括一些小品的描写体裁的散文，笔记等等，以至于所谓正史，实在并没有多少足以做我们的研究对象的。这是说文言文发展到唐人的小说就差不多已经走到了“逻辑上的最后结局”。至于什么韩柳欧苏……的议论文章，其实不成其为文学的对象。譬如樊樊山的四六文牍，现在也和一切清朝胥吏幕友拟稿的判牍，呈文，咨文，命令，布告，奏章，以至于《曾文正公日记》一样，渐渐的沉到垃圾桶，以至于黄浦江，太平洋的海底里去。至于说文法学和修辞学的对象，那么，韩柳欧苏……桐城派的文章，和公文程式一样的有价值，也许等因奉此式的文章里所用的虚字眼，专门术语等等，还比古文派的严谨，清楚，确定。

第五，中国的白话文学的开始时期，很教人想起欧洲中世纪末期的所谓“城市新文化”。自然，韵文的“民间文学”，很早就有的了。唐五代的“俗文学”之中已经有“说书”底稿似的东西，或者大半是讲佛经的，象《维摩诘经演义》等类。然而宋朝东京的“热闹”情形，耍戏的，踢球的，说书的等等风俗，很象意大利的龙巴地，威纳齐那些商业中心的情形。在这里开始形成一种“市民文学”或者叫做平民文学，庶民文学，这“平民”不是什么劳动阶级，而正是资产阶级的前身。资产阶级革命以前的所谓平民，庶民，小人——市井小人之中，市侩商人事实上是领导阶级。现代中国，尤其是一九二七之后，“商”的地位，移到了“绅”一方面去了。而在宋元明清的长期的时代经过很多次的变化，移动……而一般的基础却是差不多的。所谓庶民之中的资产阶级逐渐的产生自己的“知识分子”，那些败落户的贵族，文人也有“堕落”到这种地步的。自然，这里还有些农民的影响，不过事实上不能够有什么发展；农民文学只限于一些歌谣，最多只有北方的犁铧（？）大鼓，或者一部分“下等戏剧”也有农民

庙会的影响；而真正散文的说书式的文学是市民的文学。从这种口头文学，变到有一定的底稿，从口头文学的底稿，变成独立的仿照说书体裁的小说。这是很复杂的过程。这里，因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发育”的过程是很畸形的，一般说起来，它从没有达到过“在文化上超过统治阶级的程度”，所以这所谓平民文学更加受了许多贵族的影响。比欧洲文艺复兴以前的“市民俗文学”更加受着贵族意识的笼罩。而且贵族对于这种文学的蹂躏更加利害。

这里，从元曲时代到五四以前，可以说是现代的（资产阶级式）文学的史前时期。

这部分的历史比较更加重要。我想要写文学史必须把这部分特别提出来，加以各方面的研究，象现代各国的文学一样，从这种文学的言语（文字），体裁，技巧的进展，一直到很细腻的内容上的分析；例如《红楼梦》上的反禄蠹主义，张飞的典型，白蛇精主义等等，分析出这里面的各种人生观的冲突，矛盾，统治阶级的道德和市侩主义的道德的混杂和“决裂”……这里时代的过程，其实已经很长的了，种类也非常之多（例如南边人的弹词，以至于各种地方的戏剧）。最初的工程，恐怕也只能限于一个大体的轮廓，再加上把五四时期对于著名的旧小说的估量，大致的“重新估量”一遍。这倒是很急需的。初步的工作实在已经比研究古文学难得多了。

老雪来了，不写了。

开始写的时候，原来是随便谈谈，只想写几句闲话，谁知道闲谈一扯扯得这么长。我的字又写得这么不清楚。实在对不起，累你看得要眼睛痛了。

CTP. 六，一〇，一九三二。



经典纸阅读丛书：

《林徽因美文》

《徐志摩诗文》

《朱自清散文》

《鲁迅文选》

《王国维文选》

《陈独秀文选》

《梁启超文选》

《瞿秋白文选》

《郁达夫文选》

《许地山文选》

《傅斯年文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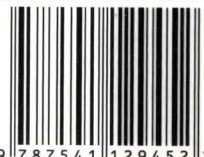
《闻一多文选》（即将推出）

《钱玄同文选》（即将推出）

《李大钊文选》（即将推出）

建议上架：文学

ISBN 978-7-5411-2945-2



9 787541 129452 >

定价：20.00元